

高 中 本 國 近 代 史

上 冊

著 者 宋 雲 彬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華 北 聯 合 出 版 社 印 行

高中本國近代史 上冊

著者 宋 雲 彬

修訂者 華北人民政府教育
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

出版者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發行者 華北聯合出版社

地址 北平西單白廟胡同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

目次

第一章 鴉片戰爭

- 第一節 鴉片戰爭前國內外情況……………一
-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起因和經過……………四
- 第三節 鴉片戰爭的繼續——英法聯軍……………一四
- 第四節 帝俄的侵入……………二四
- 第五節 鴉片戰爭的影響及其性質……………二七

第二章 太平天國

- 第一節 太平天國的興起……………三一
- 第二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三七
-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衰亡……………四〇
- 第四節 三合會和捻回的暴動……………四九

第五節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意義	五五
-----	-------------	----

第三章 中日甲午戰爭

第一節	中國藩屬的喪失	六二
第二節	中日戰爭的導火線——朝鮮問題	六八
第三節	中日戰爭的經過與馬關條約的簽訂	七三
第四節	列強對華侵略的新發展	八〇
第五節	甲午戰爭慘敗的教訓	八五

第四章 戊戌政變到庚子拳亂

第一節	從洋務到維新	九三
第二節	戊戌政變的經過	一〇三
第三節	那拉后的反動政治	一〇八
第四節	義和團的起來	一一二
第五節	八國聯軍與辛丑和約	一一五
第六節	對於維新運動與義和團的批判	一二〇

第五章 辛亥革命

- 第一節 列強在華的角逐和鬥爭……………一二六
- 第二節 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及其影響……………一三一
- 第三節 滿清政府的所謂「預備立憲」……………一三四
- 第四節 反滿勢力的大結合……………一四二
- 第五節 辛亥革命前各地的起義……………一四七
- 第六節 辛亥革命的經過……………一五五
- 第七節 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教訓……………一六四

第六章 袁世凱與北洋軍閥

- 第一節 政黨的演化與內閣的更迭……………一七一
- 第二節 宋案、大借款及討袁軍的失敗……………一七七
- 第三節 從正式大總統到洪憲皇帝……………一八五
- 第四節 雲南起義與帝制撤消……………一九六
- 第五節 黎段的鬥爭與張勳的復辟……………二〇二

第六節	西南護法與北洋軍閥的分裂	一一一
第七節	綜論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	一一九

第一章 鴉片戰爭

第一節 鴉片戰爭前國內外情況

在百年前，我們中國還是停留在封建社會階段。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縣延二千多年，雖然經過好多次換朝易代，可是因為生產方法沒有改變，地主階級的統治還是繼續維持，封建關係還是沒有打破。十七世紀滿清侵入以後，以少數滿人高壓在廣大的漢回蒙藏苗傜等族人民之上，加強了封建專制制度，製造出種種的民族壓迫方法。

1

那時候歐美各國已經用機器來生產，資本主義一天天的發達。資本主義一發達，一方面固然擴大了社會上的生產力，但另一方面社會上的購買力不能相應地增加（因為勞動者受資本家的剝削，永遠過着貧窮的生活，許多小有產者也越來越貧窮下去，損失了原有的購買力）。資本主義制度既然自行破壞了他們的國內市場，就竭力向外以侵略手段爭取國外市場來作補償，於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我們中國，就被

歐美列強看中了，大家要來跟我們通商。在我們這方面，主要的還是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就是以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做經濟活動的主體。當時一般人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一種新勢力，只是模模胡胡地感覺到工業品和農業品的交換關係會影響到我們的自給自足的安閒生活，因此而發生一種排外的念頭。同時那個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很怕讓外國人來通商，日子久了，他們或者會幫助大多數的被征服於滿族的漢人起來推翻清朝，所以也採取了排外政策。方法是關大門，而且把門鎖起來，禁止外人和中國人通商。這種政策有人叫它作『鎖國政策』。然而這大門是關不住，鎖不牢的。在歐美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十分發達以前，海外市場的尋求，也不十分迫切，你把大門關着，他們也只好在門外徘徊，或者輕輕地敲幾下；但到了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時候，他們就不客氣，要來打開你的大門了。所以當十八世紀末葉正是歐洲產業革命的時候，英國曾再三派使節到我國來要求自由通商。清朝那個自負而又愚蠢的所謂乾隆皇帝，回答他們說：『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他們也無可奈何；但不到五十年，英國的資本案，竟爲了要在中國販賣鴉片，用兵艦大砲來打開我們的深閉嚴鎖的大門了。

經過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資本主義迅速地發展起來。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他們在海外的商業資本，十六世紀以來已大見活躍。當時與英國作商業競爭的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法蘭西等；而富藏天然資源的印度，實爲歐洲資本主義所重視的對象。十七世紀初葉，英國和荷蘭先後在印度設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以販賣東方諸國的商品與黑奴及銷售工業製造品爲目的。到了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已戰勝了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以及其他的競爭者，獲得優越地位。法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六四年，繼荷蘭之後，與英國爭霸，但當時法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競爭不過英國，所以結果就讓英國東印度公司獨霸印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僅是獨佔的貿易公司，還取得稅權、兵權，逐漸收併諸王侯領土，盡革舊時政治制度，概括說一句，就是併吞了印度！

英國商人最初以販運中國茶葉爲主要的獨佔貿易。十七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我國廈門設立代理公司，以後茶市中心移到廣州，而印度鴉片的輸入也就漸漸多起來了。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看見中國吸鴉片的人很多，銷路大暢，就在印度大種鴉片，就近販運，每年吸去我國的現銀不少，同時英國的勢力也

漸漸伸入我國。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起因和經過

鴉片舊稱罌粟或波畢，亦稱阿芙蓉，實爲阿剌伯語 (Afion) 的音譯。十二世紀初葉，阿剌伯商人把它帶到我國來，當時只作藥材用。十七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壟斷東方貿易，從印度販鴉片來我國，民間漸漸吸食，以代烟草。後來英國東印度公司勢力擴張，鴉片的輸入就與年俱增。在清朝初年，每年輸入不過二百箱（每箱一百二十斤）左右，到嘉慶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一七）增加到三千六百多箱，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竟增到二萬八千多箱。從道光十四年到十八年，我國每年漏卮銀三千萬兩（注一）。

鴉片多吸幾次會上癮，上癮以後很難戒絕，從此精神萎靡，身體衰弱，臉色發青，兩肩高聳，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當時有不少人喜歡吸食鴉片，一吸就上了癮。特別是在過着寄生、腐敗生活的官僚集團中，鴉片成爲流行的新嗜好，因此鴉片輸入越來越多。因爲鴉片輸入的激增，紋銀外溢，銀價就暴漲起來。原來紋銀每

兩只換制錢七八百文，到道光十八年，每兩可換到制錢一千六百有零，平民的生活感到很大的影響，並且由此而加強了商人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小手工業者的剝削。

鴉片輸入之足以危害國民健康，國家經濟，滿清政府不是不知道，所以一七二九年雍正帝曾下詔嚴禁販賣熟烟，乾隆帝亦會定制重罰內地販商，但都無效果。一七九六年嘉慶帝又下詔禁鴉片，但鴉片的輸入反激增。到道光時候，朝臣紛紛上疏請嚴禁鴉片（但也有主張自己種鴉片以塞漏卮的），尤以鴻臚寺卿黃爵滋最爲激烈，他主張用死刑來懲治吸食鴉片者。道光帝把他的奏章交中外大臣議復，就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的復奏說得最愷切。他說：『煙不禁，則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並條陳禁煙辦法。道光帝詔授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港事宜，兼節制廣東水師，實行禁止鴉片貿易。那是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冬天的事情。次年三月，林則徐到了廣東，立即傳訊行商（注二），並諭知外商，將所存鴉片全部交出，一而具結聲明，嗣後來船不准帶鴉片，否則一經查出，『船貨入官，人即正法』。那時候英領事義律（Charles Elliot）在澳門，得到欽差諭帖，便命

令虎門外英船駛往香港，以便由軍艦保護，自己乘船赴廣州，向林則徐請求發給英船牌照，以便離開廣東。林則徐要他先交出鴉片，一面傳諭洋商，限三日內回稟；毋得觀望諉延，並派兵包圍英領事館，斷絕蔬菜及婢僕的供應。義律被迫，交出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價值六百多萬元，但具結問題尙未解決。當時衛美諸國的商人，都已簽字承認，獨義律抗不遵從，率英商離開廣州，前赴澳門。林則徐旋奉諭旨，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將所收繳的鴉片，悉數銷燬。這是那年六月三日的事。

義律不肯具結，林則徐就設法迫令英人離開澳門。義律不得已，率同英船，避居香港對岸尖沙嘴的貨船中，挽葡商出來說項，聲明須除去「人即正法」字樣，才肯具結，但林則徐不許可。於是義律一面製造糾紛事件，以便有所藉口；一面向英政府報告，說中國官員侮辱英領及英國臣民，一般英商受暴力壓迫而蒙損害，非出兵不足以使中國政府賠償損害。

那年七月七日，英國水兵在九龍的尖沙村酗酒滋事，殺死村人林維喜。林則徐一再責令義律交出兇犯，並禁海岸鴉片貿易。義律諉稱非其職權，一味延宕。九月四日，義律又帶船到九龍口岸，開槍射擊，擊死六個中國兵，強購食物而去。義律又與

英艦長斯密斯 (H. Smith) 率軍艦兩艘，駛向虎門，十一月二日抵川鼻島，要求取消焚燬英船的命令，准許英人登岸居住。三日午前，水師提督關天培率兵船二十九艘前向英艦，令其後退，遂發生武裝衝突。我兵船四艘被擊沉或破裂，餘多受傷逃入虎門，英艦則損失極微。事後林則徐奏稱與英夷小戰六次，無不勝利。清廷詔授林則徐爲兩廣總督，調鄧廷楨爲閩浙總督。清廷更加決心禁鴉片，制定法律，嚴懲販烟、種烟及吸烟者。林則徐在粵大修砲臺，嚴密防守；但沿海諸省，毫無戒備。

義律的報告，到九月間纔到達倫敦。代表資本家的國會議員大爲叫囂，倡言宣戰。他們的藉口是：『侮辱英國國旗，妨礙商業，強取財產』。他們經過三天三夜的辯論，通過了對中國宣戰案。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二月，英政府下令動員印度及好望角屯兵一萬五千餘人，軍艦十六艘，武裝汽船四艘，運輸艦二十七艘，大砲百門，以喬治義律 (G. Elliot) 統率陸軍，伯麥 (Colonel Sir Gordon Bremer) 統率海軍，向廣東進發。英軍到澳門，探知林則徐已經備戰，防守甚嚴，無隙可乘，便向北攻福建浙江的沿海。英軍攻廈門，金廈道劉耀椿率兵抵抗，擊沉英運輸艦一艘。英艦隊直駛舟山羣島，到定海，定海毫無防備，遂被攻陷。英軍又進攻乍浦（在浙江平湖

縣東南，是一個海口）、寧波，擊收我國水師，封鎖錢塘江口。後來知道此地並非要害，就移兵向渤海，進白河，直逼天津，清廷大震。英人向直隸總督琦善提出和議條件：（一）償還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涉用平等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夾帶鴉片株連居留英商；（六）廢除華人經手洋商經費。這是那年八月間的事情。那時候，沿海各地承平日久，毫無戰備，那些負責守土的疆吏都怕英軍來攻，紛紛向朝廷攻擊琦善，說他孟浪操切，激成事變。清廷見英軍勢盛，不敢繼續抵抗，便罷免琦善，改派琦善爲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一面命令浙江總督伊里布在浙江先與英軍談判。英人見和議有望，便撤兵回澳門。

琦善到了廣東，辦法與琦善完全相反。他把海口的防禦工事撤廢，算是與英人開誠相見。談判初開，他就允許賠償鴉片價七百萬元，但英國又提新條件，要求割讓香港，琦善不敢允許，英軍便攻佔虎門外的沙角、大角兩砲臺。琦善大起恐慌，派人請求英軍繼續談判，允許於賠償鴉片之外，開放廣州，割讓香港。雙方簽定草約，英軍即行交還沙角、大角兩砲臺；一面在香港出示安民，起造房屋埠頭，開始經營。這

是一八四一年一月間的事情。

當英軍佔領沙角、大角兩砲臺的消息傳到北京時，道光帝大爲震怒，居然要御駕親征，以伸張國威，經羣臣勸阻，遂下了一道宣戰的上諭，罷免琦善，先後命御前大臣奕山、提督楊芳等帶兵赴廣東。英軍探知清廷變計主戰，便先下手，攻陷橫當、虎門諸砲臺，提督關天培陣亡。等到楊芳帶兵到廣州，英國的駐印度陸軍少將臥烏古（General Sir Hugh Gough）已率印度駐兵增援，長驅直入，盡佔珠江各要隘。英軍進擊廣州，佔奪了城西北的天字砲臺及城北山頂的四方砲臺。奕山等束手無策，只好向英軍求和，遂議定休戰條約：（一）中國於賠償鴉片價之外，先償還英國軍費六百萬元，五日內交付；（二）中國軍隊退城外六十里；（三）以香港割讓爲未定問題，俟日後再商；（四）英軍退出虎門。這是四月間的事情。

條約簽定後，奕山爲要繳付英國六百萬元軍費，大肆搜刮。他以爲這六百萬元賠款，是廣州住民的生命財產的代價，所以由藩司、運司、海關三庫發給四百萬，其餘二百萬要廣東行商分擔，日夜催繳，跡近敲索，已引起人民的極大反感；英軍又復橫行無忌，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更使民衆憤不可遏。七月間，英兵千餘從四方砲臺回

泥城，三元里村民突然樹起『平英團』的旗子，鳴鑼聚衆，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把英軍包圍。義律聞訊趕往援救，亦陷入重圍。鄉民愈聚愈衆，頃刻間增至數萬人，英軍突圍未成，死者二百餘人。義律向知府余保純告急，保純以奕山的命令前往解救，纔把義律和英軍救出。英軍見我民氣激昂，不敢輕敵，遂於得到六百萬賠款後，退出廣州。而佛山的民衆義勇隊，又從陸路在龜岡砲臺襲擊英軍，殲滅幾千名，還擊破了應援的英船。南海、番禺兩縣的民衆，也自組義勇隊，晝夜操練。當時義律既不敢與我民衆爲敵，還老羞臉出告示，說：『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勿再犯。』廣東民衆也回他一道檄文說：『爾自謂船砲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槍砲，截爾首尾，火爾船隻，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平英團是我國民衆第一次自發的反侵略與民族自衛運動，同時也表現了民衆力量的偉大。然而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不但不知道運用民衆力量，反害怕民衆，竭力鎮壓。當時的廣州知府余保純居然向臥烏古行三跪九叩首禮！清廷亦追究林則徐開釁之罪。嗣他充軍

伊犁。

清廷雖然這樣屈服，但英政府對於琦善與義律所訂草約，還不肯承認，以為英國所得賠償，不敷損失；以後英人居留的安全保證，尚無着落；而香港割讓，尚附有交納賦稅的條件；即舟山撤兵，亦嫌過早。旋經閣議決定向我國要求更多的賠償，並切實保證將來關於通商的種種權利，並令海軍再佔舟山，為要挾地步；撤義律職，而以璞鼎查 (Sir Henry Pottinger) 代之。在奕山與英人所訂休戰條約裏面，對於上年英人在天津向琦善所提的六項條款全未提及，割讓香港之約，也未得清廷的確認。英人催促奕山訂立正約，但奕山並沒有把休戰條約的內容奏聞清廷，對於訂立正約，非但不敢作主，且不敢奏聞皇帝，只得一味延宕。因此英軍一方面退出虎門，經營香港，規復廣東貿易；一方面規劃移兵北上，威嚇清廷，非達到要求目的不止。伯麥特從印度續調戰艦來粵，與義律等聯合北犯，恰巧遇到颶風，英艦受損，兩廣總督祁項以為有神助，奏報清廷，清廷大為興奮，祭謝海神，布告全國，並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官員，加官陞級。然而那時候英國派來代義律的璞鼎查偕同海軍少將巴爾克 (Barker)，已帶了兵艦大砲來了。

璞鼎查於八月十日抵澳門，義律回國。璞鼎查又帶來了軍艦十艘、汽船四隻，陸軍二千五百餘人，並配備了大砲。這次英國人決心進攻，但不攻廣東而攻廈門。八月二十六日廈門失守。九月六日英艦駛往定海，留船守鼓浪嶼。二十六日英艦攻定海，守將力戰而死，定海再遭淪陷。十月十日，英軍攻下鎮海。十四日佔領寧波。清廷至是忍無可忍，乃下詔以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都統特依順爲參贊，進軍浙江，籌恢復之策。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移駐福建；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防禦之責。一八四二年二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援軍到達浙江，但連戰敗退，英軍進陷慈谿。五月，英國援軍開到，進攻乍浦，乍浦即告失陷。六月八日英艦駛近吳淞，老將陳化龍戰死。十九日英軍攻下上海。那時候，英國援軍大集，聲勢甚盛，計有兵艦二十五艘，汽船十四隻，陸軍一萬餘人，大砲數百門。七月二十日英艦進攻鎮江，守軍敗退，城被攻破。八月九日英艦隊直抵南京，清廷知道無法抵抗，便指派耆英、伊里布、牛鑑與璞鼎查議和。二十九日（陰曆七月二十四日）雙方議定條款，在英國兵艦上簽字：這就是有名的中英江寧和約（Treaty of Nanking）亦稱南京條約或江寧條約。條約共十三款，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繳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鴉片賠償六百萬，共計二千一百萬元，先交六百萬元，餘限四年交清。

二 中國政府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給英國。

三 中國政府將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准立領事館，並許英國商人帶同家眷自由居住及往來。

四 五口應納進口貨稅款，均宜秉公議定稅則，由部頒示，以便英商按照交納。英商貨物自在某港口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運運內地，不得加重課稅。

五 以後兩國往來公文，用平等款式。

六 釋放各地英國俘虜與罪犯。凡戰役中爲英國服務之華人，一律免罪。

上述第四點中所謂「五口應納進出口貨稅款，均宜秉公議定稅則」，實際上就是說，中國海關上對於進出口貨稅的規定，應該先與外國人商量好，因此到了下一年八、十兩月，兩廣總督耆英與璦琿先後在香港、虎門訂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中英五口通商善後條約，作爲南京條約的附錄。其中有幾點頗關重要：（一）五處通商口岸既准英人自由居住，中國地方官須具英領事就各地情形劃定一區域，准英人租賃。

這是所謂『租界』的起原。(二)凡未列入稅則表內的貨物，概照貨價納值百抽五之稅。這就開了『關稅協定』的惡例。(三)英國人與中國人涉訟，由英國領事與中國官員共同查明，共同來處斷，至於英國商人如何定罪，則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領事照辦。這是『領事裁判權』的開端。

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於十月初交付六百萬賠款，英軍退出南京、鎮江、上海，還屯定海。臥烏古自香港返印度，璞鼎查以功升任香港總督兼陸軍大將。到一八四六年，賠款已全數交清，各商埠也已次第開放（惟廣州因民氣激昂，嚴拒英人入城，所以延期兩年開放）；但英人仍據舟山、鼓浪嶼，背約不交還。這時候香港總督璞鼎查已返國，代之者爲德維斯（Francis Daves）。兩廣總督耆英向德維斯據理交涉，德維斯以舟山列島永不割讓給他國爲交換條件，雙方在虎門簽訂條約。然而舟山到了一八四八年六月纔正式交還我國，英人且在鼓浪嶼起蓋房屋，作久住之計。

第三節 鴉片戰爭的繼續——英法聯軍

南京條約公布後，歐美的資本家大爲高興，他們已經看穿了這個神秘的所謂『天

朝上國』，原來是一隻紙糊老虎！便紛紛向清廷要求訂約通商。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普魯士諸國，紛紛請求派遣領事或公使來華；而美法兩國且特派全權公使，要求訂立條約。一八四四年春，美公使古新（Caled Cushing）以大總統國書通意清廷，並以威脅手段逼訂商約。古新給廣東巡撫護理兩廣總督程喬彩的照會中，甚至說，『本國政府或有使中國人民再嘗戰禍之必要』。清廷命著英主持訂約事宜。遂於是年七月間訂立中美通商條約。法國也接着要求訂約，在同年十月間訂立中法五口通商條約。在這些條約裏面，都規定了最惠條款，而領事裁判權及居留地制度，也都包括在內。可憐愚蠢而又自大的滿清政府，過去以天朝上國自居，到那時候想與英法美等爭國際平等地位而不可得！更不可寬恕的，戰爭的直接原因既爲鴉片問題，那麼訂立和約時可以站在名譽和道德的立場上譴責英國，要求英政府協同禁止鴉片的販賣，即使被英國拒絕，也可以借此剝下英國紳士的『文明』外衣，讓全世界看看所謂『文明國家』的醜惡內容。然而滿清政府不敢這樣做，在南京條約裏竟沒有一字一句關涉到禁鴉片的事情。戰後滿清政府對於煙禁也毫不注意，眼看着鴉片源源而來，白銀滾滾而去，吸食者日漸增多，鴉片流毒遍中國，不必等到『數十年後』，林則徐所說的

『國日貧，民日弱，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練之兵』，已經應驗了。加以五口通商以來，洋貨壓倒了本地的製造品；而中國農村由於外國商品的侵入，與由此而加强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活躍，更加深了它的破壞與衰落程度。同時因鉅額賠款的負擔，統治者更加緊其對平民的剝削。馬克思（Karl Marx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曾經這樣說過：『中國在一八四〇年的不幸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鉅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產生的貴金屬的流出，外貨競爭對於本地製造品的破壞的影響，公共行政的腐敗情形，產生了兩件事情：舊稅益加繁累，新稅又見增設。』再加上到中國來的洋商和傳教士，倚仗他們的國家的威勢，成了天之驕子，勾結貪官污吏，奸商巨猾，欺壓平民，無所不至。在這種情形之下，客觀上不能不喚起民族的覺醒，遂有種種自發的民族自救運動，這表現在太平天國的起義和廣東民衆不斷的反英示威。

廣東人和洋人接觸最早，受欺凌榨取也最甚，所以廣東人的排外心理特別強。一八四一年『平英團』的示威運動，收到了效果，廣東人民便自己組織團練，堅決拒絕洋人進廣州城。一九四六年各口都已依約開放，只有廣州因爲人民不允許，不得不再

延期兩年。到了一九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英國的香港總督派軍艦開入省河，脅迫我履行條約。那時候的兩廣總督是徐廣縉，廣東巡撫是葉名琛。徐廣縉秘密召集各鄉團練十多萬人到省城示威；英艦雖有大砲，但見兩岸練勇呼聲震天，就不敢開放，悄悄地開回去了。後來香港總督致函徐廣縉，請重定廣東通商條約。徐廣縉先與地方士紳接洽，教他們出面要求訂明『嚴禁入城』一條。港督見我民氣激昂，恐影響英國人做買賣，只得勉強承認。徐廣縉因此受封爲一等子爵，調任湖廣總督，葉名琛受封爲一等男爵，升任兩廣總督。英國方面也另派寶林（Sir. T. Bowring）爲香港總督。過了幾年，英政府派巴夏禮（Henry Parkes）爲廣州領事。寶林與巴夏禮都是十分頑強的英國紳士；然而葉名琛也是一位頑固的封建官僚，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裏。寶林屢次向他交涉事件，他都置之不理。巴夏禮屢次向他要求准許英人入城，他都斷然拒絕。

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有中國船亞羅號（Arrow）從廈門開廣州，船上掛的是英國旗，船裏裝的是違禁品，所載乘客是兩個英國人，十三個中國人。剛碰到水師千總梁國定巡河，見該船形跡可疑，就上船檢查，把十三個中國人全部逮捕，據說還拔去船上的英國國旗。西洋各國對國旗原很重視，這回被我國水兵從船上拔下來，可

以藉口說是侮辱英國（其實這完全是借端開釁，假使中國強盛，即使侮辱了英國的國旗，至多只是道歉了事；而況亞羅號是中國船，就不該掛英國旗；究竟當時有否掛了旗子，也還是問題）。巴夏禮見有機可乘，就小題大做，向葉名琛提出嚴重抗議，要求送還被逮捕的人，並對侮辱國旗事道歉。但葉名琛只派一個職位不大的官員，把所捕的奸商送交領事館。巴夏禮認爲不能滿意，與港督寶林密謀，想乘機推翻前約，脅迫葉名琛准許英人入廣州城，就向葉名琛投下哀的美敦書，要他具狀謝罪，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葉名琛置之不理，但也沒有備戰。英軍遂發砲攻黃埔砲臺，進擊廣州。葉名琛逃走，廣州失守。但這次英軍的舉動，並未奉本國政府的命令，並且廣州民氣激昂，英軍常受襲擊，而印度亦發生抗英運動，需要大兵去鎮壓，因此不打算久佔廣州，不久就自行退去。廣州民衆見英軍退去，實行報復，把英法美的領事館及十三商行盡行焚燬。英軍也在城外縱火，焚燒沿濠民房數千家。

廣州事變的消息傳到倫敦，英首相巴墨斯頓（Palmerston）竭力主戰。一八五七年春，巴氏向國會歷舉中國自一八四二年起侮辱外人事件凡十八起，要求增加軍費援助遠東英軍，但遭下議院之反對。巴氏解散國會，召集新國會，結果議決對中國備

戰，先派公使向滿清政府要求改訂條約，賠償損失，否則即以武力解決；一面慫恿法、美、俄共同參加，組織聯軍，進攻中國。美、俄都不贊同。法國剛剛是拿破崙第三當國，頗有侵略野心，願與英國聯合，恰好有個法國教士乍伯倫（Chapdelain）在廣西被害，就引爲口實，與英國聯軍。是年冬，英國的全權大使額爾金（Elgin）和法國的全權大使葛羅，先後率海軍抵香港，向葉名琛提最後通牒，限於四十八小時內獻城投降。葉名琛既不答覆，又不佈防，英軍遂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咸豐七年陰曆十一月十二日）進攻廣州。左右都勸葉名琛趕緊佈防，設法抵抗，他却很自信地說：「過了十五，就沒有事了。」原來他接到最後通牒的時候，向品壇請示，品語「過十五日必無事」，所以他有恃無恐，既不備戰，且不許水師應戰。但廣州城於二十九日被英法聯軍攻下了。那是陰曆的十一月十四，沒有過十五。廣州城被英法聯軍佔領了三年，到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纔交還。那位男爵兩廣總督葉名琛，於城陷時被俘，英人把他押送到香港。他還天天應洋人的請求，寫字畫畫，自署「海上詩武」，後來被送到印度的孟加臘，差不多當作博物院標本一樣，給人家觀看，他還是天天做詩，唸呂祖經。一八九九年葉氏病死於印度，英人把他的遺骸和他所作詩文送還中國。當時大

家痛恨他玩敵誤國，有人造韻語譏笑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其實當時的封疆大吏，不僅是葉名琛這樣愚昧無知，像廣東巡撫柏貴，於城陷後被俘，天天在囚室裏起課，有人訪得他被囚時寫給人家的信，有『今日起一課，係大安』的話，其愚昧昏庸，並不在葉名琛之下。

英法聯軍的目的，不在佔領城市，而是要強迫清廷改訂條約，承認賠款，增開商埠。那時候俄美兩國也想改訂商約。英法聯軍攻下廣州的下一年，英法俄美四國會共同向清廷提出要求，但沒有結果。於是英法聯軍北上，進攻大沽砲臺，軍艦直抵天津。清廷大爲震恐，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爲媾和全權大臣，與英法商訂條約。桂良花沙納到天津，英公使提出新約五十六款，法公使提出四十二款，要求照簽，並無商量餘地，二人向清廷請示，清廷也不敢拒絕，遂於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先後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其主要條款如下：

- 一 除五口外，再開營口、煙臺、臺灣、汕頭、瓊州五處爲通商口岸。又，長江一帶，待太平軍平定之後，再選擇三處爲通商口岸（後來開了鎮江、九江、漢口三處）。

二 允許教士入內地傳教。英法人民得入內地遊歷，英法商船得在內河航行。

三 中英或中法人民發生交涉時，由中國官吏會同英法領事審理。

四 減低關稅，由雙方派員另訂新稅則。

五 賠償英法軍費各二百萬兩，賠償英商損失二百萬兩。

這個條約簽訂後，不但內河航行權喪失殆盡，且擴大了輕稅、免稅的範圍，國權損失殆盡，可以說是集不平等條約之大成了。

條約簽字時，決定於次年在北京批准換約，英法軍艦退出白河，駛抵上海。到了下一年，英國派卜魯斯（Bruce），法國派布爾布隆（Bourboulon）為公使，來中國換約。那時候清廷已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防守天津。僧格林沁在白河口建築砲臺，嚴密布防。英法兩公使到北京換約，是經海道並由軍艦護送的；駛抵白河口時，僧格林沁派人通知他們改由北塘入口。但英使原已奉有政府訓令，教他取強硬態度，如遇任何障礙，須不顧一切，以期達到目的，所以他們就不顧一切，闖入大沽口。僧格林沁命令開砲，擊燬英國砲艦四隻，英法兩公使狼狽回上海，各向他的本國請示。

英艦在白河失利的消息傳到倫敦巴黎，明白事理的人士都認為英法兵艦並無航行

白河之權，卜魯斯等輕舉妄動、自招損害，不能由中國負責。列如馬克思（那時候他正在倫敦）就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政府當時並不反對外交使節前往北京，可是反對英國軍艦護送公使由白河西進。中國政府曾請卜魯斯由陸路入京，無須兵艦護送。中國人民因為清清楚楚地記得不久以前砲擊廣州的事件，所以認為這種兵力是實行侵略的工具。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與法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侵入太晤士河的權利嗎？所以英國這樣解釋英國公使前往北京的權利，是極其奇怪的。在上一次對華戰爭發生時，英人曾有一個發明，說砲擊中國的一個城市，這不是與中國本身作戰，而祇是與中國一個省分發生地方性質的衝突。前一種解釋與後一種發明，是同樣奇怪的。據英國人自己的記載，英人曾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必要時用武力進攻北京，就是統率威武十足的艦隊，由白河西進，那麼華人抵抗英人的武裝遠征，毫無疑義是有理由的。華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祇是破壞了英人的侵略企圖。』

然而英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早已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顧不得名譽（販賣鴉片是

不名譽的），更不講什麼道理，一意要用武力來征服中國。英國政府的機關報每日電訊會說過許多蠻橫無理的話。它說：「大不列顛應該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佔領京城，並應該在奪取北京之後永遠佔領廣州。」又說：「我們英國應該鞭笞每一個穿蟒袍而敢於侮辱我國國徽的官吏。應該把這些抗英的華人都當作海盜（他們不想想那時候英國的行爲纔是海盜的行爲）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的桅桿上。應該教訓華人重視英人。英人高出於華人之上，英人應爲華人的主人翁。」當然，英法兩國的政府是竭力主戰的，於是英國以額爾金爲全權公使，克隆特（Cant）爲海陸軍總督，法國以葛羅爲全權公使，蒙達朋（Mondaubon）爲海陸軍總督，重組英法聯軍，浩浩蕩蕩地開向中國來了。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陷定海。那年夏天聯軍全部北上，由北塘攻大沽，進陷天津。清廷派桂良爲全權大臣，赴津談和議。英法要求開天津爲通商口岸，英法公使各帶兵數千入京挽約，清廷不接受。英法聯軍就於九月間佔領通州。清軍屢次戰敗，京師震動，咸豐帝北奔熱河，遣使向聯軍求和，被拒絕。聯軍攻陷北京時，巴夏禮已先皮虜，關至北京刊郭半里。聯軍既陷北京，巴夏禮被釋出，他爲了洩憤，引兵焚燒有

名的圓明園，並大掠金銀財寶，作為戰利品，由英法軍平分。清廷派親王奕訢向英法請和，俄國公使伊格拉地也夫（Ieratic）出任調停，遂於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兩日，與英法續訂條約，就是所謂北京條約。其重要條款為：（一）實行天津條約；（二）增開天津為商埠；（三）割九龍半島與英國；（四）賠款增至英法各八百萬兩。這條約經咸豐帝批准，公佈京師通衢，並電令各省督撫遵照辦理，英法聯軍纔退去。

英法聯軍之役，分明是鴉片戰爭的繼續，所以西洋史家常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時候，鴉片已公然開禁（起於咸豐九年），稱之為『洋藥』，征收關稅。因此吸食者愈衆，而英國的紳士們回頭來譏笑我們，說我們是『東亞病夫國』。吸鴉片的『煙具』常常被送到外國去，伴着小脚、紅繡鞋一起陳列起來，借以說明中國人的愚昧和落後，而把他們自己那種侵略罪行掩蓋起來。

第四節 帝俄的侵入

在鴉片戰爭以後，俄羅斯帝國也乘機向我們的東北及西北邊境侵略。

西歐各國，從海道首先通中國的是葡萄牙，從陸路首先通中國的是俄羅斯。俄國

在十五世紀的末期（明憲宗成化時），屢次派遣遠征隊，由西伯利亞越過外興安嶺，直達黑龍江下游。清朝初年（十七世紀上半期），更乘滿州向關內進兵，無暇北顧的機會，在雅克薩河（黑龍江的左面）口築城駐兵，企圖久佔。清康熙帝既平三藩之亂，便出兵北伐，攻陷羅刹，破雅克薩城。那時候是清朝強盛時期，俄人未敢頑抗，於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向清廷請和，在尼布楚（Nerchinsk）訂立劃界條約：東以外興安嶺，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毀去雅克薩城。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俄國又派遣使臣，與清廷訂立恰克圖條約（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地點，故名。訂約地點在波爾河邊，所以又稱波爾條約）；一七九二年又續訂恰克圖市約。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爲中國與外國訂立條約的開端。但尼布楚條約僅限於劃定兩國國界，並且那時候清朝正在強盛時期，並無喪權失地之虞。恰克圖條約是商約性質，所開放的祇限於恰克圖，對於中國並無什麼壞的影響。有人說，恰布圖市約第五條有「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民，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字樣，開後來領事裁判的先例。其實此約全由滿清政府裁定，令俄國遵守，約文用筋諭形式，所謂「會同審

訊，各照本國法律治罪」云云，在當時原是各君其國，各治其民之意，與後來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性質並不相同。

鴉片戰爭以後，情形可大不相同了。那時候俄皇尼古拉一世當國，見中國軟弱易欺，積極圖謀侵略。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俄國向清廷要求派代表劃界，一面出兵入黑龍江，過雅克薩，到愛琿，派人向愛琿都統申明俄國軍隊航行黑龍江的緣由，愛琿都統無法抵制，只得任其通過。此後又於一八五六、五七兩年，由黑龍江強行輪送軍隊兩次，並在黑龍江左岸扼要地點建設屯營四所，置兵防禦。那時候清廷方全力對付太平軍，無暇北顧，於是黑龍江下游地方完全被俄國佔領。一八五八年俄國移哥薩克兵一萬二千駐黑龍江口，並派人通知黑龍江將軍奕山，要求重議兩國疆界。清廷派奕山爲全權大臣，與俄國木哩斐岳夫將軍（Nicolas Mouravien）談判。經俄方種種恫嚇，奕山不敢堅拒，遂於是年五月簽訂了愛琿條約。其重要條款爲：（一）割烏蘇里江北岸雅克薩一帶爲俄國領土；（二）烏蘇里江以東的海岸，作爲中俄兩國共管區域；（三）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的航行權，爲中俄兩國所共有。這個條約根本推翻了以前尼布楚條約及恰克圖條約的平等原則，把大興安嶺以南的廣大領土完全

割讓了，並且斷送了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的航行權。愛華條約剛簽訂，英法聯軍迫天津，訂立了天津條約，俄國也援例要求訂約，由清大臣桂良、花沙納與俄使普提雅庭（Euphinius Poutiatine）於六月初在天津訂立了中俄天津條約，其中以允許俄人由海道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汕頭七處通商為最重要的條款。到了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俄國藉口居間調停有功，強迫清廷訂約，遂於一八六〇年十一月訂立北京條約，割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河以東一帶地給俄國，作為報酬。俄國割黑龍江以北為阿穆爾省，烏蘇里河以東為東海濱省，從此我國東北的藩籬盡撤，而俄國的勢力更伸入東南沿海一帶了。

第五節 鴉片戰爭的影響及其性質

鴉片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因鴉片戰爭而有英法聯軍之役，更因此而引起帝俄的侵略，我們把這許多事情歸納在一章裏，不是沒有理由的。

中國現代史就一方面說，是一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鴉片戰爭是這種侵略的開端。有些資產階級的學者，認為這不過是西歐列強與中國爭平等地位，

促使中國覺醒。如卜舛濟（F. L. Hawks Pott）說：「這是英國與中國的首次戰爭，也是極東與西方戰爭的開端。因為中國不允許西方各國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辦外交，通商務，所以西方各國向之爭取。」又如日本齋藤奧治說：「把支那人從大夢中覺醒過來，使之承認開關港口與外人通商，全靠鴉片戰爭。」這真是無恥的狂吠！在鴉片戰爭時，英國資本主義固然還沒有發展到壟斷的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是，資本主義並不是到帝國主義時期纔開始表現出侵略性來的。事實上，歐洲的資本主義從它在十六、十七世紀萌芽後，就一貫地從事對殖民地的追求，進行殘酷的掠奪與侵略，在生產方法上落後的民族成了資本主義侵略與剝削的對象，失去獨立的地位，過着奴隸的生活；甚至於人口被大量地消滅，以至有滅種的危險（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英國用掠奪形式來販賣鴉片，開拓市場，毒害中國人民，使中國殖民地化的行爲，完全是蠻橫的侵略的行爲。鴉片戰爭，就英國方面說，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就中國方面說，是反侵略的，正義的民族自衛戰爭。當時馬克思就曾痛切地指出前後兩次的鴉片戰爭在英國「實際上是大規模的海盜搶劫」。他認爲英國「這段歷史自始至終只聽令人厭惡」。

鴉片戰爭以後，我們中國祇剩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任人侵略，降到殖民地地位；一條是打破舊的生產方式，建立新的生產方式，發憤圖強，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走後一條路，有兩個敵人須打倒。一個是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一個是內部的封建統治勢力。資本主義國家爲便利進行侵略，不願意中國發展民族資本，走上獨立自強的道路，它們用兵艦大砲來懾服滿清政府以後，又從而扶助之，使它成爲中國革新進步的障礙。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初始未嘗不想抵抗這外來的可怕的資本主義勢力，但它一方面又懼怕人民，惟恐人民力量抬頭，動搖了它的統治權。所以它始終不懂得用人民力量以抵抗外敵，始終是不堅決、不徹底的作無力的抵抗，而結果總是屈服；屈服以後，又仗外來的幫助，以維繫其封建統治。

鴉片戰爭刺戟了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覺醒起來，他們堅決地反抗外來的侵略，推翻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這開始表現在鴉片戰爭時廣東的民衆示威（平英團）以及戰爭後不久所發生的太平天國革命。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的爭取獨立與解放的鬥爭，一直沒有中斷過。所以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中國現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

(注一) 這裏鴉片輸入的數目，依據馬爾斯 (H. B. Morse) 中國外交史的附表。據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與汪榮寶清史議義所引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書及英人美特日爾斯的調查報告，頗不相同，但相差有限。至於說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每年漏銀三千萬兩，係據當時鴻臚寺卿 董誥的奏疏。近人蕭一山清代通史探劉彥說，謂五年內共漏銀三千餘萬兩，而非「歲漏銀三千萬兩」，那就相差很大了，但不知劉說有何根據。

(注二) 當時廣州有所謂十三行，是一種華洋貿易的仲買機關。洋商運貨物來中國，須經過十三行，再發賣給一般中國商人。洋商與中國有什麼交涉，也要由行商轉，不能直接向中國官廳講話。這些行商，就是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起原。十三行之名，起原甚早。屈大均 (?——一六九六) 廣州竹枝詞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東西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可見在清初已有十三行的名稱。又，所謂十三行，不過沿襲舊稱，並非不多不少，剛剛十三家。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 (商務版)，可參考。

第二章 太平天國

第一節 太平天國的興起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第八年（一八五〇年），廣西省的東南部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個革命運動連續十五年之久，幾乎把滿清皇朝推翻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我國所受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影響前章已有論述。當時還有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土地迅速集中，使大多數農民於受層層剝削之外，更喪失了土地，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一天天嚴重起來。原來當時商業資本已大為活躍，但這些商業資本，因受到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阻礙，不能轉化為產業資本。大量的財富積累，除供揮霍與享樂之外，一部分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一部分流入南洋羣島（當時華僑在南洋羣島頗佔相當的勢力），一部分則用以購買田地，形成土地集中的現象。在乾隆年間，湖南巡撫楊錫紱已經說過：「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

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那麼在道（光）咸（豐）之間更可想而知了。而況大商人都榮爲地主與高利貸者，大地主也大都兼營商業與重利盤剝，地主、商人與高利貸者結成三位一體，向農民手工業者加緊剝削。再加上洋貨排斥土貨，使白銀外溢而引起百物騰貴，清廷爲償付鉅額賠款而加重其對人民的榨取，人民從現實的困苦生活中感到貧富不均之不合理，而有財產的再分配或竟廢止財產私有的要求。而南方各省和外國資本主義接觸最早也最頻繁，在社會經濟上所受到的震盪也比其他區域更爲嚴重。因此，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在南方爆發了。

和社會經濟矛盾相聯結的，是國內的民族矛盾與政治矛盾。滿清自入關以來，即以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壓迫漢人。無理的民族歧視，苛重的賦稅徭役，兇暴的軍事鎮壓，嚴密的思想禁錮，野蠻的刑罰制度，黑暗的吏治機構，使廣大的漢族平民，深深地感到痛苦與恥辱。二百年來，漢人的反滿運動幾乎沒停止過，祇因滿清勢盛，未能成功。鴉片戰爭以後，漢人看破滿清的統治能力削弱，自然要趁這時機起來革命了。而事實上那時候的滿清政府，也正如恩格斯在他所撰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所說：

『這個帝國（指滿清）極其衰微，極其殘破。它甚至於沒有力量來度過人民革命的危機。』

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出身中農，應試失敗，在本村當塾師。那時候民間流行着『反清復明』『替天行道』一類的思想；而基督教的宣傳也相當普遍，教會的書籍隨處可以看到。洪秀全利用民間的反清思想，又採用了基督教的教義，創立『上帝教』。他曾害過一場大病，就自稱死去七日復甦，能知未來之事。豫言世界將有大亂，惟有上帝的信徒，方可免受災難。入上帝教手續極簡單，只須納香燈銀五兩。入教後，只拜上帝，不拜其他神佛。教徒相稱爲兄弟姊妹，一律平等。他又自稱是上帝耶和華的小兒子，耶穌的小弟弟，稱上帝耶和華爲天父，耶穌基督爲天兄。不久信徒增加，他就拋棄了塾師生活，和馮雲山出外宣傳教義，廣收信徒。又跟『三點會』（注一）發生了關係，漸漸形成一種民間的秘密組織。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洪秀全馮雲山在廣西桂平武宣兩縣中間的鵬化山設立秘密機關。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定人蕭朝貴、貴縣人石達開、秦日綱等先後加入，分頭到各處宣傳教義，招收黨徒，勢力漸漸大起來了。

道光末年，兩廣連年饑荒，盜匪叢起，以廣西中部柳州、慶遠、思恩、潯州、梧州爲最嚴重。當地的有產階級見官軍不能平定盜匪，便自辦團練，防守地方。團練是保護有產階級的，因此漸與貧民集團如三點會等常常發生衝突，互相仇殺。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桂平縣燒炭工人反抗官府勒索，風潮擴大，洪秀全就乘機在桂平縣金田村起義。爲表示反清，一律留蓄長髮，改易衣冠（因此當時的官文書上稱之爲「髮匪」，而民間受其宣傳，居然稱之爲「長毛」）。貴縣人林鳳祥、揭陽人羅大綱等都聚衆起義，與洪秀全會合，聲勢一天天壯大起來。那時候咸豐帝（清文宗）初即位，派固原提督向榮、雲南提督張必祿進軍討伐。清軍不能取勝，張必祿陣亡。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春，太平軍佔領貴縣，過潯江，取武宣、象縣，陷永安州（今蒙山縣），建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秦日綱、羅亞旺、胡以晃等四十多人都做丞相、軍師等官。滿清政府調大軍圍永安。太平軍突重圍，北趨陽朔，初戰不利，既而反攻，大破清軍。進攻桂林，不克，棄去。北向攻湖南，取全州（今全縣，屬廣西）、道州（今道縣），連陷桂陽、安仁、茶陵、醴陵等縣。進圍長沙，兩月不能下，而馮

雲山、蕭朝貴先後陣亡。於是渡湘江，西取益陽、常德。由益陽浮洞庭，直破岳州（今岳陽）。進窺武漢三鎮，遂下漢陽、漢口，破武昌。這時候太平軍應有兩條路可以進取：一向北入河南，取陝西，據險要，與清軍決戰於黃河流域；一向長江東下，割據東南半壁，以抗滿清。太平軍取的是後一條路。放棄武昌，順長江而下，連佔九江、安慶、蕪湖、太平（今當塗）。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春，攻陷南京，遂定南京爲國都，改稱天京。

太平天國既定都南京，便計劃分三方面作戰：一、北出豫晉，以圖中原；二、西取皖贛，以爭長江上游；三、掃蕩南京附近的清軍，以鞏固首都。

北伐的軍隊，由林鳳翔、李開芳等率領。一八五三年夏，北伐軍入安徽，薄臨淮關，西趨鳳陽、鳳臺，入河南，取歸德（商邱），渡黃河，佔懷慶（沁陽）。與清軍戰，不利；遂繞道山西，陷平陽（臨汾）。復由平陽入直隸（今河北），取深州（深縣）。深州距北京僅六百華里，但恐北京駐有重兵，不敢輕進，便改道攻天津，駐兵靜海、獨流鎮、楊柳青，成犄角之勢，與清兵對抗。時值嚴冬，北方苦寒，南兵不習慣，又苦糧食不繼，南退阜城，爲清將僧格林沁所敗，鳳翔被擒，全軍覆沒。李開芳

先率馬步兵萬餘，南取高唐州，後受清軍夾攻，敗死，軍隊也潰散。從此黃河以北沒有太平軍。

攻取皖贛的軍隊，由胡以晃率領。自江蘇入安徽，下桐城，破集賢關，再克安慶。更由桐城進取廬州（合肥），大敗清軍，清名將安徽巡撫江忠源戰死。那時候羅大綱所部也到了廬州，遂合兵西進，攻克英霍兩縣及湖北的黃梅，大綱部渡江而南，連克九江、彭澤。西上，再克武昌。胡以晃亦攻下黃州（黃岡），清湖廣總督吳文綉戰死。旋克漢陽，湖北諸重鎮重入太平軍之手。以晃又派部隊溯江而上，取巴陵，渡洞庭湖。與曾國藩（關於曾國藩詳下節）軍戰于湘潭。旋又取華容，再克岳州，並分兵陷益陽、常德，洞庭湖沿岸的城市都入於太平軍之手。同時石達開部亦出無爲，取廬江，克舒城，下六安，再陷桐城，抵安慶。賴漢英部又出句容，取溧水、太平、蕪湖、繁昌、南陵、池州（貴池）、銅陵等地。長江南北兩岸，盡爲太平軍所有。嘗太平軍第二次佔領武昌的時候，石達開命賴漢英攻豫章，連克湖口。石本人亦率部攻克撫州、饒州、廣信、建昌、寧都等地。江西全省十三州，僅吉贛二州未被攻下。

南京外圍的清軍，有所謂『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先是向榮的部隊一直跟

在太平軍後面追擊，太平軍攻破南京後十多天，向榮的軍隊也趕到了，就在城東孝陵衛結營固守，這就是『江南大營』。琦善也率領直隸、陝西、黑龍江的馬隊和步兵，奉命自河南至揚州結營，這就是『江北大營』。但當時的八旗兵、綠營兵、暮氣已深，這兩座大營，並不能阻礙太平軍的活動。太平軍為解除首都的威脅，於一八五五年及一八五六年先後攻破『江北』『江南』兩大營。從此天京無圍師，這是太平天國的極盛時代。

第二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

參加太平天國革命的基本羣衆是農民，因之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都反映了農民的要求。

太平天國首先企圖解決土地問題。定都南京以後，就頒佈『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處。務使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把田分爲九等，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照人口分

配，凡男女年十六歲以上受田，十五歲以下減半受田（例如十六歲以上分給上上田一畝，十五歲以下就祇能分得上上田半畝）。但因爲政權沒有強固及其他種種關係，這種制度並未積極推行。不過，太平天國的土地政策既以土地國有爲基礎，自然與土地私有制不相容，所以當時大地主佔有關係被大大破壞了，例如焚毀地契借據，地主和祠堂廟宇的土地多半歸於舊日的佃農所有。

太平天國這種平分土地的政策。是由於當時農民幻想恢復原始農村公社時代的制度而來的。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等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又規定國庫爲村中的公產機關。農民多餘的農產品，須交給國庫保存，『凡嘗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此外又規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藝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在這種社會裏，買賣婚姻是被禁止的，『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同時婚娶吉期等事，祇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至例盡。除因爲太平天國是假借宗教而起義的，所以又規定每二十五家須設一教堂，『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

（當是舊約與新約）及真命詔旨書。逢禮拜日，人民均須「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聽講道理」。

但是，太平天國除建立教堂，宣傳教義外，它的那種理想的社會制度一時無法實行，只能先試行於軍隊之中。太平軍以「軍」爲作戰單位，每軍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由「軍帥」統率。其編制是：五人爲「伍」，有「伍長」；五伍長爲「兩」，有「兩司馬」；四兩爲「卒」，有「卒長」；五卒爲「旅」，有「旅帥」；五旅爲「師」，有「師帥」；五師爲「軍」，有「軍帥」。軍帥以上有監軍，由天王自任元帥。行徵兵制，凡三四口以上之家庭須出一兵，萬三千一百五十五家設一軍帥。如設軍以後人家增多，則每增五家即另設一卒長；增至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餘類推。所以太平軍一方面是軍事組織，同時又是一種羣衆組織與行政組織。軍隊中設有聖庫。洪秀全曾下詔：「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太平軍稱清兵爲妖兵）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歸天朝聖庫。」長官並無常俸，惟食肉與等級有差別。太平軍中有女兵，別設女營，規定「男營與女營有別，不得授受相親」。又設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百工技藝各有所歸，各效其職役。據一八五八年的調查，南

京有男女兵各五十萬以上云。

在工商業政策上，太平天國主張『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但事實上是無法實行的。在當時太平軍的轄境中，依然商賈往來，市肆林立。在財政政策上，一面依舊征收錢糧；一面實行募捐與打土豪；但對一般平民則並未苛擾。此外，太平天國確立男女平等原則，禁納妾，禁纏足，禁鴉片，廢除黑暗的刑法制度等等，都富有民主主義的色彩。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衰亡

洪秀全在永安的時候，頒發奉天討胡檄，歷數滿清入關以來蹂躪中國，奴役漢人的罪惡，全篇都是喚起民族思想，激勵人心的話。當時軍紀嚴肅，士氣旺盛，而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也能和衷共濟，所以起義不滿三年，就攻下南京，建立國都。可是自從打下南京以後，那些領袖們漸被這『紙醉金迷』的繁華之地所迷惑，開始腐化起來了。後來有人攻擊他們，說他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以致『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漸成麻痺不仁之象』。而諸王之間，則從互相猜

忌到互相殘殺。

、洪秀全取得南京以後，深居簡出，把軍政大事都交給楊秀清。秀清權勢日盛，又引起了秀全的猜疑。一八五六年秋，洪秀全與韋昌輝合謀，殺秀清和他的部屬，把秀清的全家都殺光了。石達開聞訊，從安慶趕回，對韋昌輝頗多責備，昌輝又要謀殺達開，達開乘夜出走，昌輝就把達開全家殺了。達開回到安慶，舉靖難兵，軍隊開到寧國，洪秀全無法，殺昌輝以謝達開。但不久達開又爲秀全所忌，被迫逃出南京，帶兵入四川，別圖發展。此後太平天國的中樞僅由陳玉成、李秀成二人勉強維持着。後來李秀成兵敗被俘，在他的供狀中寫道：『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敗變，做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那時各有散意，……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故未散也。』

太平天國既不團結內部，又不爭取外援（當時上海有七首黨，淮北有捻子，都起來響應，但太平軍沒有能够跟他們聯繫好），滿清政府就得從容佈置，準備反攻。同時太平天國的政策引起貴族、官僚、地主、商人的恐慌。太平天國所崇奉的上帝教，

與中國一般民衆的習慣不合，如破壞廟宇，搗毀神像等等，很可能引起民衆的反感。因之由官僚、大地主、商人所領導的反動武裝即所謂「團練」等等，在各地紛紛組織起來，與滿清政府結合，共同反抗太平軍。其中尤以曾國藩所編練的「湘軍」與李鴻章所編練的「淮軍」，戰鬥力最強，爲後來攻滅太平軍的主要軍隊。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的大地主，是一個進士，在滿清政府做相當大的官（禮部侍郎）。太平軍起來時，他正丁憂在原籍，就在原籍辦團練，保護地方；後來增募鄉勇出戰，正式編爲「湘軍」。又大造船隻，練水師。他出兵討伐太平軍時，曾發布所謂討粵匪檄，開頭就造了許多謠言，說太平軍「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城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而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擗其屍以示衆船。」其實那些都是無恥的謠言，無非借以嚇騙老百姓。事實上太平軍的軍紀要比所謂「湘軍」「淮軍」好得多；後來他們把湘軍、淮軍的姦淫、擄掠、燒殺，都寫在太平軍的眼上了。這種污蔑革命軍隊的宣傳方法，自

會國藩以來，衣鉢相傳，直到國民黨匪幫。會國藩又痛斥太平天國，說他們破壞名教，蔑視禮義。他說：『粵匪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孟之經，而別有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這裏他指出太平天國破壞封建秩序，提出『名教之奇變』的口號，來引起一般士大夫的『義憤』，祇是他忘記了他所說的『我大清』，在二百年前『我大明』的漢族子孫，爲了剃髮改裝，也認爲是『開闢以來之奇變』，不惜擲頭顱，灑熱血，要趕他們出關外去的。會國藩又列舉太平軍沿途毀壞廟宇神像等等，以激起一般人對太平軍的反感。他說：『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在封建意識根深蒂固的當時的中國，他的這種宣傳，無疑是起了極大作用的。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的一個地主，也是進士出身。太平軍起來後，他奉旨回籍辦團練。太平軍攻皖北，他的團練打不過太平軍，從此一蹶不振。後來太平軍在江蘇方面

發展，江蘇士紳來安徽討救兵，曾國藩奏請派他負責，仿湘軍成法，招募淮勇，編成『淮軍』，開赴上海。以後淮軍在洋人的援助之下，成爲東南一支最有力的反革命軍隊，與上游的湘軍遙爲呼應。

當太平軍攻下南京的時候，帝國主義者頗爲高興，以爲洪秀全是基督教徒，一定容易說話。那時候英國的香港總督會親自到南京，和太平天國打交道。據說美國亦會遣使通好，洪秀全且派其弟王洪仁玕赴美報聘。法國最初以爲洪秀全的上帝教是耶穌教的變相，和天主教相衝突，對太平天國頗爲懷疑，但後來派人到南京實地察看以後，也就瞭解了。而太平天國亦會通告各國：『彼此通商，理所應然，將來事定，只有洋煙（鴉片）再勿來吾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因此，歐美列強當時都表示取局外中立態度。但太平天國缺乏外交人才，又不能瞭解資本主義侵略的道理，確定外交方針；而列強也覺得太平天國的勝利，會破壞他們在中國所享有的特權，就用武力壓迫滿清政府，先使滿清政府就範，然後再幫助它來消滅太平天國。在天津條約中豫先規定，待太平軍平定之後，再擇三處開爲通商口岸，已表示列強決心幫助清廷，消滅太平天國了。後來太平軍進攻淞滬一帶，蘇淞道吳煦募兵數千，由美國人

爾統率，稱爲『常勝軍』。因爲這部隊都有洋槍（俗稱前膛槍）裝備，所以又名『洋槍隊』。華爾死後，由美國人白齊文（Burgwin）代替，最後則由英人戈登統率。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更把『常勝軍』擴大組織，並與英法聯軍共同防守淞滬，從此『常勝軍』參加江浙一帶的戰役。

因爲上述的種種原因，太平天國漸漸削弱，終至滅亡。

太平天國自經楊韋之難後，全靠李秀成、陳玉成支撐危局。他們倆都是有名的戰將。尤其是李秀成，不但有軍事天才，還有政治頭腦。

曾國藩所訓練的湘軍，在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已訓練完成，水陸共一萬七千餘人，配以戰船洋砲及火彈火箭等新式武器。曾國藩的作戰計劃是：先取武漢，扼長江下游；次取九江；次取安慶；最後進攻南京。湘軍開始出發時，曾國藩曾自率一部分陸軍攻靖港，戰不利，湘勇潰散，曾國藩幾次投水自殺，都被救起。其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曾國藩得乘機整理其部隊。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秋，湘軍攻佔岳州，進陷武昌，完成其第一部作戰計劃。是年冬，湘軍進圍九江，至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夏，九江被攻陷，太平軍名將林啓榮力竭而死，曾國藩的第二部作戰計劃實現。

了。從湘軍進圍九江到九江陷落，前後凡四年半，其間經過好多次大戰，太平軍曾三克武昌，湘軍將領塔齊布、羅澤南陣亡，水師戰敗，被截爲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曾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路線，從這方面獲得閩浙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稅釐金，所以湘軍雖常打敗仗，而不至於覆滅。

李秀成出來支撐危局的時候，九江已失，長江沿岸的銅陵、南陵等地都告陷落；一面又失去了蘇北的門戶徐州，清將和春、張國樑進軍秣陵關，再立江南大營。洪秀全下詔徵勤王兵，但諸將都被各路清兵吸引住：陳玉成爲阻止曾國藩、胡林翼部的東下，扼守黃梅；韋志俊（這是一位勇將，太平軍三克武昌，他無役不與，軍中有『韋國宗三打湖北』的美談）正與彭玉麟、楊岳斌奮戰，堵住池州；黃文金堅守祁門，與鮑超相持，都無法分兵馳援。而清將勝保又攻陷安徽的含山、和州（和縣），南京形勢頗爲緊張。於是洪秀全晉封李秀成爲忠王，代英王陳玉成統領中外諸軍事。秀成督師縱陽（安慶以東的一個市鎮）。與陳玉成等先後攻下揚州、六合、滁州，大破湘軍於三河集（滁縣東北）。又大破鮑超軍。先後克復合肥、黃梅、宿松、太湖諸地。又大敗張國樑、勝保軍於浦口。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李秀成攻克杭州，回師大會

皖、浙、江北諸軍數十萬人，分十路向包圍南京的清軍進攻，大破和春、張國樞軍三百餘營，遂解南京之圍。和春、張國樞退丹陽，太平軍追擊，又獲大勝，張國樞戰死。太平軍乘勝克無錫、常州、蘇州，降清軍五萬餘人。不久，李秀成再克杭州，並進攻淞滬，開始與帝國主義的武裝相接觸了。

滿清政府和曾國藩各有一套如意算盤：曾國藩穩紮穩打，想由武漢而九江，而安慶，最後奪取南京。滿清政府呢，總覺得湘軍『非我族類』，靠不住，希望蘭軍只在外圍打勝仗，南京仍由滿洲親貴所統率的綠營兵就近拿下來，如此，則太平軍撲滅了，而居首功的還是滿洲統帥。但到那時候，滿清政府的如意算盤打不通了，只得把地方政權讓點給曾國藩，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率援軍馳救浙江，保全東南大局。曾國藩對局勢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克武昌九江以來，安慶已成為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的唯一門戶，只要攻下安慶，那麼太平天國一時的勝利不能挽救其悲慘的結局。但他也感覺到太平軍實力還很強大，要由他的嫡系軍隊來獨佔戰功，是不可能的了，就推薦左宗棠幫辦軍務（實際上是胡林翼保薦的，咸豐帝後來重用左宗棠，用意在分曾國藩的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一向對曾國藩很不滿）守江西，保薦李

鴻章辦淮軍。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秋，曾國荃破安慶。陳玉成退守廬州，不久被捻黨叛徒苗沛霖誘擒，獻於清軍，慷慨不屈而死。

安慶既陷，曾國藩分兵三路進攻：曾國荃圍南京，左宗棠取浙江，李鴻章攻甯山。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常勝軍』五千餘人配以大砲四十多門，大破太平軍於嘉定。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常勝軍』大破李秀成軍於常州，秀成敗退南京；同時左宗棠也攻下杭州；南京四面被包圍，太平天國已到了決定失敗的階段了。李秀成勸洪秀全親征鄂贛。他認為『京師危急，坐斃非策，不如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蘇州，以利餉源。即金陵有失，猶擁兵五六十萬，尙足並驅中原。若戀此危城，征調不至，必亡之道也。』（羅惇誦 太平天國戰紀）但洪秀全不聽。一八六四年夏，南京城破。十多萬太平軍全部殉難，沒有一兵一卒投降！秀全已先服毒藥自殺。李秀成被擒，他親寫供辭數萬言，十天纔寫完。他希望保留太平天國的真實歷史，但他的供詞被曾國藩刪改了。秀成受刑後，南京的老百姓悲痛萬狀，自動罷市，表示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哀思。

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自南京出走後，率部馳騁於皖、贛、浙、湘、桂、黔等省，後由滇入川，至大渡河，受清軍圍剿，在天京陷落的前一年已被消滅。其他太平軍別部，如轉戰安徽、江西至福建邊境及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的汪海洋部，敗入福建，佔據漳州的李世賢部，轉戰冀、魯、晉、陝各地的賴汶光及陳得才部，均被清軍次第消滅。總計太平天國自金田村起義到天京陷落，前後凡十五年，軍隊所過凡十六省，爲我國近代史中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

第四節 三合會和捻回的暴動

當太平軍全盛時代，上海有三合會的暴動，淮北有捻子的起義，西南和西北的陝、甘、新疆又有回民的暴動。

三合會是一種秘密會黨，又稱天地會或添弟會，洪家大會或洪門會，一說就是三點會。創立的情形，已不可詳考（注二）。大抵自鄭成功抗明失敗以後，他的部屬就在南方秘密組織會黨，以圖復興。乾隆時（一七八七），會首林爽文在臺灣暴動，嘉慶時（一八一八），會衆在梅嶺起事；道光時（一八三二），曾領導兩廣僑民起

事，均告失敗。但會黨的潛在勢力，日益雄厚。洪秀全起義時，招集四方豪傑，兩廣的三合會衆，多來歸附，後來因教義不合，大都散去。太平軍攻陷南京後，有三合會的支派七首黨首領粵人劉麗川、閩人陳阿連，圖謀襲攻上海縣城，以響應太平天國，事情洩露，官方大捕三合會員，劉麗川便結黨羽萬人攻入上海縣署，殺上海知縣。蘇、淞、道、吳、建、章逃入租界，請求保護。七首黨人既佔領上海縣城，連昭、川、沙（應名，屬松江府）及青、浦、南、匯、太、倉、嘉、定、寶、山諸縣。劉麗川爲了要和太平軍取得聯絡，上書洪秀全，請求援助，秀全置之不理。清軍屢次圍攻上海，均不得手，便向英、法、美駐軍求援助，結果由法軍出來助戰。一八五四年冬，清法聯軍與七首黨大戰於上海，鄭家木橋，最初七首黨獲勝，聯軍死傷甚多，後來因爲清軍繼續增援，七首黨糧盡援絕，不得已退出上海。劉麗川在退走途中被擒殺。

七首黨的暴動，因爲沒有跟太平軍聯繫好，失敗了，但列強借此機會擴大其在華的種種特權。當七首黨佔領上海時，列強藉口保僑，派海軍、陸戰隊登陸，並組織所謂「萬國義勇隊」，借此擴充武裝。一面又借在滬外商名義，發表聯合宣言，主張居留地中立，不許雙方（清軍與七首黨）作爲攻擊與防禦地帶，無形中就擴大了列強在上

海的統治權。不但如此，當時英法美三國領事，因為華人逃入租界的很多，就乘機設立『工部局』，處理華洋民刑案件，清廷未能過問，行之十餘年，雖未經中國的認可，然外人已視爲成例。清廷平定太平軍後，曾與各國交涉收回租界，沒有結果。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由上海道與三國領事，根據歷年成例，訂立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十款，從此在租界內華人案件，不問民刑，概由所謂『會審公廨』審理，案件最後的判決權全由外人操縱，判決後且無上訴機關，會審公廨漸漸變成上海的最高法院，對於中國人的行政權司法權，顯然有絕大的損害。同時因當時無人管理關稅，各國領事協議推舉英人瓦德（Wade）做稅務司，暫時管理，後來滿清政府竟讓外人繼續管理上海及其他各地稅關，直到民國以後還是這樣。

捻子起於康熙年間。它的名稱很特別。據說，在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交界處，鄉人迎神賽會，有點油紙捻作龍戲的風俗，凡參加者稱爲『拜捻』。以後那些拜捻的成羣結隊，或數人結爲一捻，或數十百人結爲一捻，漸漸開始劫富濟貧，毆鬥仇殺，一般人就稱之爲『捻子』（一說，皖東人稱一小集團爲一捻，捻即組織黨徒的意思）。從嘉慶到道光年間，捻子的活動區域，遍及山東、江蘇、河南、直隸、安徽諸省，引

起滿清政府的注意，曾下令各地嚴拿，處以斬首、絞、充軍等嚴刑。可是壓迫愈甚，反抗愈烈，捻子在北方更加活動起來。到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河南山東諸省的捻子，紛紛響應。南自安徽的六安、壽州（壽縣），東徧山東的兗、沂、曹諸州，北達直隸邊境，西及陝西境內。滿清政府命欽差大臣勝保督安徽軍務，又命袁甲三（袁世凱的父親）專剿直魯皖三省捻子。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又命僧格林沁負責剿捻，擒殺捻子首領張洛行。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的天京陷落，其部將陳得才據湖北麻城，賴汝光則與張洛行的義子張總愚合攻黃州，而安徽亳州的捻子亦與張總愚合流。僧洛林沁移兵援鄂，大破捻子於蘄春，張總愚敗走太湖、宿松。後來陳得才兵敗，賴汝光、張總愚北入河南，佔中牟，又折入山東。那時候，捻子在山東的聲勢甚盛，滿清政府命曾國藩李鴻章防守淮陽一帶。僧格林沁率大兵窮追捻子至鄆城，被捻子所圍，兵敗而死。於是捻子乘勢北趨直隸，南撲安徽。曾國藩部移駐徐州，以斷捻子的南北聯絡。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捻子分爲東捻、西捻，東捻以任柱、賴汝光爲首，西捻以張總愚爲首。東捻從山東經豐、沛，入河南信陽，陷雲夢、應城，攻德安，復回河南。另一股走麻城，轉戰蘄水、廣信、黃梅之間，旋又入山東，擬渡河，不果，乃折

向東南，走濰縣，爲劉銘傳所敗。任柱奔贛榆，爲其部下所殺。賴汝光率所部走海州，戰敗，南趨揚州，爲清軍所擒殺，東捻遂被消滅。西捻入陝西後，大破清軍于灤橋，擊潰清軍三十餘營，遂圍省城。滿清政府命左宗棠督陝甘，專主征剿西捻。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劉松山大破西捻於西安，張總愚遂與暴動的回民聯合，聲勢復盛。次年，西捻侵入直隸，旋又南入豫北，轉趨山東，沿運河而抵天津、保定。左宗棠督率大軍跟蹤追擊，西捻被圍，軍疲糧盡，張總愚投水死，西捻遂被剿滅。那是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的事情，距太平天國的滅亡已經四年了。

回族從元朝以來，雜居內地者漸多。因宗教信仰不同，再加上滿清政府在種族歧視政策之下的挑撥離間，以及漢滿的地主豪紳常和官府勾結以欺壓回民，漢回之間頗爲隔閡，回人對漢人十分仇視。到了太平軍起來，西南及西北的回民亦乘機暴動。

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雲南建水地方因漢回人爭奪銅鑛，激起回民暴動，一時各地回民羣起響應：馬金保、藍平貴起於姚州；杜文秀起於蒙化，攻陷大理及其他二十餘州縣；馬世德據建水、通海一帶；馬和、馬貴佔徽江、江川、呈貢、普寧，宜良，直薄昆明。滿清官吏被殺死的，有提督褚永昌、巡撫恒春等。當時滿清政府忙於

應付太平軍，無法分兵。最後纔由岑毓英、楊玉科合力征剿，漸就平復，前後歷時十九年之久。

太平軍別支陳得才進攻陝西時，陝西的回民和他有所聯絡。回民又和捻子互通聲氣。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渭南一帶，漢回發生械鬥，事態擴大，回民紛起暴動，殺死清團練大臣張芾，馳騁渭河兩岸，聲勢大盛。滿清政府命勝保、多隆阿進討。多隆阿依靠殘殺，雖取得一些勝利，但最後本人亦以受傷死於盩厔。於是滿清政府命左宗棠督陝甘。左宗棠進兵陝西，分三路作戰：由綏德進兵花馬池（鹽池），爲北路；由鳳翔進兵天水、隴西，爲南路；自率大軍駐乾縣，驅迫回人入甘肅，是爲中路。那時候回人馬化龍一支佔據寧夏、金積一帶，最爲強大。馬彥龍佔導河、狄道一帶，爲一支。馬桂源起事西寧，爲一支。馬文祿起事酒泉爲一支。清軍北路破金積，屠殺全城軍民，不留一人。這是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的事情。次年清軍會攻狄道、導河、西寧，到達酒泉，一路大肆屠殺，老弱婦孺亦無倖免。馬化龍的殘部退入新疆。左宗棠先後斬殺回民數十萬，極盡殘酷之能事。他的頂子被血染紅了，而一般沒有民族意識的文人，還多方歌頌，稱之爲中興名臣！

陝甘回人起事，新疆回人亦謀獨立。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東干回阿訇安明在烏魯木齊（迪化）起事，殺死清廷的提督，連陷昌吉、阜康、奇台、綏來等縣，又佔哈密、吐魯番，一時天山北路全失。南路回人紛起響應，纏回金相印和浩罕回人雅克布白克（Yakob Beg），佔據英吉沙、疏勒一帶。兩部回人發生衝突，安明爲雅克布白克所敗，於是雅克布白克幾乎奄有新疆全部，遂建立喀什噶爾王國，遣使赴英俄，要求承認，並曾遣使赴土耳其的首都君士但丁堡。

左宗棠既平陝甘，便圍攻新疆。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分派大軍，進攻天山北路，迪化各城以次佔領。再由哈密、吐魯番向西南前進，攻阿克蘇，圍喀什噶爾（疏附），白克自殺。到一八七八年新疆平定。但伊犁被俄軍所佔，不肯交還，那位殺人如麻的左宗棠，也感到束手無策（關於中俄伊犁交涉，詳見第三章，這裏不詳述）。

第五節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意義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參加太平天國革命的是廣大的農民羣衆。他們在軍事組織和戰略戰術上的創造，是值得稱道的。太平天國開始起義時，就把他們的軍隊從五個人爲一『伍』起，一直到萬人的大軍團，形成了嚴密而靈活的組織，並確立了軍隊內部生活的紀律號令等，有很多是他們新創的。這是保證了他們的十多年中軍事組織能一貫強韌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的敵人也這樣稱讚過：『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有以致之。』（見賊情彙編）太平天國的名將如馮雲山、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都出身閉塞的農村，然而指揮大軍，從容作戰，攻守有度，常常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他們在戰略戰術上的創造，可以說是屬於我們現在所說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範圍內的，雖然他們並沒有能够加以概括，提高爲理論，但他們在實際的戰鬥中突破了封建統治的軍事家們所定下的戰爭規律，却是不能否認的。不過這也不能祇歸功於他們中間個別領袖的天才。倘不是廣大羣衆自動參加戰爭，在戰爭中集體地發揚了積極性，創造性，那麼，這樣的戰略戰術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太平天國不僅用新的方法打仗，而且也用新的方法從事社會的建設，提出他們的社會理想。不管他們的方法和理想都帶點空想色彩，但是在那樣長夜漫漫的時代中，

這種偉大的空想發散着光芒，雖在實際中失敗，仍舊繼續閃爍在千萬低頭勞作的農民的心頭。所以馬、恩合著的國際概況一書中，對於太平天國曾有過這樣的批評：『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按指太平天國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的相差，像中國的哲學家與黑格爾哲學的相差一樣吧，可是一件事情終究是值得我們高興的，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資本家紡織品的影響，八年來已處於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

至於反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他是鴉片戰爭以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者的開山祖師。

自然，曾國藩的湘軍也是徵募農民編成的，但它不是農民隊伍，它是在封建統治者利益的支配下進行編組與從事作戰的，所謂『湘勇』，都是被動的受僱傭的人。因此，湘軍的紀律非常之壞，完全靠燒殺姦淫來振作士氣，維持戰鬥力的。當曾國藩奉命辦團練的時候，他就獎勵『團紳』捕人殺人，只要被紳士們認為是『奸匪』的，就加以捕殺，捕得越多越好。當時一般窮苦失業的老百姓都有被當作『奸匪』而遭捕殺的危險，大家對於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取了一個綽號，叫『曾剃頭』，說他殺人

像剃頭髮一樣。以後湘軍作戰，每攻破一城，總給士兵們以幾天燒殺擄掠姦淫的絕對自由。曾國藩常常大批地殺戮俘虜，有一次殺七十多個俘虜來祭陣亡將士，祭畢，命士兵們剖心取食。士兵們在他的鼓勵示範之下，完全失去了人性，他們的肯出死力打仗，爲的是打勝了可以任意殺人放火姦淫擄掠。這種殘殺成性，毫無紀律的反革命軍隊，剛與紀律嚴明的革命軍隊成一對照。不管後來的官書把一切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罪惡都推在所謂「髮匪」身上，但許多中外人士的私人著述中都有很公平的記述，就是曾國藩本人有時也不能不承認湘軍紀律太壞。

然而太平天國終於在湘軍淮軍以及外國的反動武裝「常勝軍」協同進攻之下覆滅了！這是歷史的悲劇。農民戰爭要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纔有取得勝利的可能，如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例子。而且歷史事實又證明，資產階級常常並不能澈底地領導農民進行革命，只有無產階級能够把農民革命領導向澈底的勝利。太平天國起義時，中國正開始轉化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資本主義雖已在孕育，但還沒有新興的資產階級，更不能有無產階級來領導這個革命。因爲受着當時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中心的堅強的領導階級，所以沒有能够匯合並統一當時

所有的農民運動，以增強革命力量，摧毀反動統治；沒有能够明確地去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做深入羣衆的鬥爭，特別是土地的鬥爭；沒有能够建立強固的政權，建立更多的革命根據地，而反形成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所以攻下的城市，大都隨得隨失，近乎半流寇的性質。在反革命的一方面，倒是匯合並且統一了一切反革命勢力，從滿洲皇帝包括到地主、官僚、買辦、商人，更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幫助，把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國革命撲滅了。

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它已給滿清以沈重的打擊，使滿清的統治基礎根本動搖。第一，滿洲侵入中國，主力的軍隊是八旗兵；從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的軍隊是綠營兵；這兩種軍隊，滿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淮軍是漢族軍閥的軍隊，滿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纔能調動。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第二，過去地方軍政長官極大多數是滿洲人。太平軍起義後，湘軍淮軍轉戰東南，所有各省的總督、巡撫、提督、總兵不得不用湘淮軍中人。地方權力漸漸加重，中央與地方政權的矛盾也就漸漸增加。這樣，滿清政府的政權力量削弱了。第三，在太平天國的革命過程中，曾、左、李與上海的紳士、買辦、洋人打成一片。滿清政府對於依靠洋人來鎮壓革命的事實也

直認不諱。以後身兼官僚、軍閥、買辦的三重資格的李鴻章，以深通洋務（直白說來，就是與洋人勾結）之故，滿清政府辦外交總要借重他。從此滿清政府越來越傾向於結託外國侵略勢力來維持其統治權力的政策。這樣，滿清政府在人民大眾中的聲威也就越來越減弱了。第四，曾國藩在打太平天國之後，爲保持自己祿位，免除滿清政府對他的疑忌，曾大裁湘軍。被裁的軍官和士兵非常憤慨，相率加入哥老會，在營官兵也都有秘密加入的。哥老會代替了天地會，成爲反滿的秘密團結，當時竟使滿清政府窮於應付。後來孫中山從事革命運動，就曾聯絡過哥老會，得到他們幫助。曾國藩撲滅了太平天國的革命，却又替革命散布了種子，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自曾國藩創造對外屈服、對內屠殺的反民主革命的方式以來，左宗棠李鴻章都是親受衣鉢的。左宗棠不僅屠殺我漢族同胞，更對我整個中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回胞和苗胞——大肆屠殺。自漢朝段熲大殺羌人以來，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大的一筆血債。李鴻章以後就專辦賣國外交，所有不平等條約，大都經他一手簽訂。曾左李在中國近代史中難道還不是民族罪人嗎？如果在今天，在國民黨匪幫統治中國的時候，好多人崇拜曾國藩，開口「曾文正」，閉口「曾湘鄉」，捧着一部曾文正全集，

幾本會國藩家書當作寶典，想做會國藩第二，這些人的立場和企圖不是很明顯的嗎？

(注一)許多歷史教科書中都說：洪秀全創立上帝教，又名天地會，即三點會。其實上帝教與天地會或三點會不同。三點會亦稱『三合會』，淵源於『洪門』。洪門是清初一種反清的秘密組織，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爲名。入會者，指天爲父，指地爲母，故又名『天地會』，又以同音稱『添弟會』。凡同盟者，均曰『洪門』。門，家門也，故又號『洪家』。後來爲避免滿清政府注意，隱其天地會的名稱，取洪字偏旁『三點水』，號曰『三點會』。或又嫌偏而不全，非吉祥之兆，又取『共』字之義而連稱之，共者合也，故又號『三合』。又，上帝教所信奉的是天主和耶穌，三點會所信奉的是道教。洪秀全最初和三點會結合，後來三點會的弟兄在太平軍中地位降低，不能享受『老兄弟』待遇（太平軍中有老兄弟、新兄弟之分），所以會國藩在討粵匪檄中說：『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浙江）被脅之人，會大家牛馬之不若』，其用意即在挑撥加入太平軍的三點會兄弟。不過說洪秀全一點沒有受三點會的影響，也不盡然。他們稱天爲父，國號『天國』，官以天名，上下一體，皆以兄弟相稱，都是受三點會的影響。

(注二)與寧羅氏守先閣所藏天地會文件中有西魯序，述天地會起源，雖然依託神話，可供參考。

第三章 中日甲午戰爭

第一節 中國藩屬的喪失

中國到滿清同治（光緒）之間，國勢愈衰弱。歐洲資本主義則已向獨佔階段發展，不僅要輸出商品，還要輸出資本，不僅以爭得市場爲滿足，還要進一步獨佔所得的市場。於是向爲中國藩屬的如琉球、安南、緬甸等，相繼淪爲某一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首先動手來撤除中國的藩籬的是東方的島國日本。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很快的走上資本主義階段。當時日本工業發達，原料的取給與製造品的推銷，漸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日本雖和我國通商，但沒有能夠和所謂列強享受同樣利益；而且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非通商所能滿足。因此它一開始就以武力侵略的姿態出現。

日本開始對外侵略的目標是琉球。琉球一向服屬於中國，對滿清政府負朝貢的義

務。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琉球人因航海遇颶風，飄流到臺灣，被當地的土人所殺。日本見有隙可乘，有辭可藉，便一面冊封琉球王爲藩王，照會各國公使，聲明琉球已爲日本的藩屬，琉球政府與各國所訂的條約移轉關係，改爲日本與各國所訂的條約；一面質問清廷，臺灣土人是否隸屬中國。顛預的滿清政府答復說：『生番向屬化外，他們殺人越貨，中國政府不能負責。』日本就以中國不負責任爲理由，於一八七四年聲稱爲琉球人復仇，派兵攻臺灣，佔領土人住居的地帶。滿清政府向日本交涉，要求撤兵，但日本態度異常強硬，大有決裂的樣子。英國怕中日開戰，影響他們的對華貿易，便由駐京英公使出任調停，中日訂立和約。其重要條款爲：（一）中國承認日本出兵臺灣爲保護日本人民的正常舉動；（二）中國撫卹琉球難民銀十萬兩，賠償日本在臺灣修路築屋費銀四十萬兩；（三）臺灣土人由中國管束。這條約的第一條無異承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日本廢琉球王，改琉球爲沖繩縣。這是我國喪失藩屬的第一次。以後安南、緬甸、暹羅相繼喪失。

安南古稱交趾，一向臣服中國。清乾隆時，酋長阮光平受封爲安南王。其後新舊阮氏互爭王位。一八〇二年（嘉慶七年）阮福映借法國兵力統一安南，事訖允許剛化

南島給法國，作爲酬報，事後阮福映不實踐諾言，法政府大爲不滿。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法國與西班牙聯軍攻安南，次年佔領西貢（Saigon）。其時英法聯軍方對中國作戰，攻安南的法軍兵力單薄，未敢深入。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英法聯軍侵華戰事已結束，法西聯軍便大舉進攻安南北部，安南乞和，訂立西貢條約，允許割地賠款。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安南發生內亂，法國以代平內亂爲名，出兵佔領安南北部，派測量隊測量通中國的水道，發見湄公河不適宜於航行，大爲失望，便轉而注意到紅河。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法軍艦開入紅河。其時紅河上游爲太平軍餘黨劉永福所佔據，部下二十餘萬人，號「黑旗兵」，饒勇善戰。見法艦無端開入紅河，大爲不平，就幫助安南擊敗法軍。但安南政府經不起法國的一再恫嚇，竟與法國訂立條約，確定安南爲法國的保護國。清廷向法國抗議無效。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法國藉口保護紅河航行權，派海軍攻陷河內。次年，劉永福與法軍戰，法軍大敗。於是法國派大軍至河內，向劉永福及安南的京都順化府分途進攻。攻劉永福的法軍依舊失敗，但順化府的法軍則節節勝利。安南向法國求和，訂立和約，除割地開埠，承認法國得在各地駐軍外，並自認爲法國的保護國。滿清政府得訊，派曾紀澤向法使交涉，司

時命兩廣總督張樹聲辦理邊務，雲貴總督岑毓英統大兵入安南，並以劉永福爲經略大臣，又命廣西巡撫徐延旭進兵諒山。但不敢正式向法國宣戰，反聽從李鴻章的建議，要與法國和平解決。於是李鴻章受命爲全權大臣，與法使在天津締結預定媾和草約五款，承認安南歸法國保護，中國在北安南之駐軍撤歸本國，但法國不得向中國要求賠償及侵犯邊境。這草約公布後，朝野譁然，彈劾李鴻章的奏章多至四十餘封，但條約已經簽訂，所爭者只是中國軍隊撤退的時間問題罷了。李鴻章請以三個月爲期，法國堅持須在三星期內撤退。安南法軍爲逼迫中國軍隊撤退，進軍諒山，諒山的中國軍隊以未奉命令，不肯退，遂與法軍開火。法政府藉口中國違背和約，向滿清政府提出無理要求，一面派遣軍艦，企圖佔領中國一要地，以威脅滿清政府。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法海軍攻臺灣、福州，燬路政局及馬尾砲臺。次年一月，法陸軍攻陷諒山，進逼鎮南關，邊境大震。但不久進逼鎮南關的法國陸軍，爲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所擊破，馮軍長驅二百餘里，克復諒山。同時岑毓英軍大破法軍於臨洮，攻克廣威、承洋兩府，安南民衆紛起響應。那時候法國正當普法戰後，元氣未復，受此挫敗，人心動搖，就暗請英國出面調停。李鴻章本來以對外投降妥協爲一貫政策，他竟不管

我們的軍隊正在大打勝仗，接受了英國的調停，於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四月與法國重訂和約十條，承認安南爲法國的保護國，開諒山以北兩處爲通商口岸，並允許南方數省建築鐵路時須雇用法國人。次年又訂立了越南邊境通商細則十九款，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又締結了中越界務專約五款及商務續約十款。在商務續約中訂明開龍州、蒙自、蠻耗（後改名河口）爲通商口岸。這樣，不僅喪失了安南，更使法國勢力伸入廣西、雲南，西南邊境從此多事了。

當法國經營安南的時候，英國也下手奪取緬甸。緬甸與印度接壤，於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進貢稱臣，內屬於中國。英滅印度後，屢向緬甸侵逼，那時候中國正值多事之秋，無暇過問。一八八五年，英國借端出兵攻緬甸，囚緬甸王。到了下一年，緬甸各地都被英軍佔領。滿清政府命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政府提出抗議，結果英國僅允許緬甸照舊例每十年進貢中國一次，中國則承認英國對緬甸有最高主權。英人既得緬甸，就想侵佔我雲南邊境。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重訂滇緬條約十九款，把江洪（雲南邊外車里士司的地方，與暹羅接壤）給法國，而以科干、木邦兩地（都在雲南龍陵縣南）給英國。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英人還佔據了片馬（在雲南保山縣西

北，爲緬甸入川，進滇，通藏（的捷徑）。

緬甸安南滅亡以後，介在英法兩強勢力之間的暹羅，勢難獨存。英國既併緬甸，就想進佔湄公河上游，以通雲南。法國也藉口以前曾侵佔安南所有湄公河以東的地方，要求交還。暹羅政府不允，法國便出兵佔據湄公河口，實行封鎖，暹羅政府不得已，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把湄公河以東地方及河口的幾個小島割讓給法國。英國怕法國獨佔暹羅，跟法國協商，分割暹羅所轄的南掌地方（今老撾一帶地），訂立協約，共認暹羅爲獨立國。暹羅本來也算是中國的藩屬，現在名義上獨立，廢止向中國朝貢的舊例，事實上不啻是英法的保護國，而中國南部的藩屬完全喪失了。

當我南方的藩屬相繼喪失的時候，帝俄也向我西北侵略。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俄國乘我西北有回亂，藉口維持邊境治安，攻佔伊犁。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回亂平定。次年清廷派崇厚爲全權大臣使俄，交涉交還伊犁。崇厚是一個顛預而又庸懦的官僚，受俄國逼迫，簽訂了還付伊犁條約十八款，其內容，除償還俄國佔領伊犁軍費五百萬盧布外，將伊犁南部阿克斯河兩岸地割讓給俄國（阿克斯河即伊犁河東南源，不僅土地肥沃，又爲國防重地）。約文傳至北京，朝野譁然，都主張毀約。清廷

將崇厚褫職，並議處死刑（後來因帝俄的抗議，終於赦免了他的死罪），雙方幾乎決裂。後由英國調停，於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另派曾紀澤爲全權大臣，前往交涉。是年二月，改訂伊犁條約。其重要條款爲：（一）割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地方給俄國；（二）償還俄國佔領伊犁軍費九百萬盧布；（三）伊犁交還中國，但俄國在伊犁得有土地權及各種貿易上的特權。這新約雖然割地較少，但從此帝俄的勢力得公然侵入山南北路和內外蒙古了。

第二節 中日戰爭的導火線——朝鮮問題

朝鮮在歷史文化各方面，與中國都很密切，有宗屬關係。日本既經得了琉球，就把目標移向朝鮮。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日本明治八年）日本因朝鮮砲擊了他們闖入江華灣的軍艦，就砲轟江華砲臺，大興問罪之師，並脅迫中國允許日本和朝鮮通商。額預的滿清政府，竟向日本宣稱：『朝鮮雖爲我藩屬，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預聞。』日本就根據這個宣言，壓迫朝鮮訂立商約。其時朝鮮內部分兩大派：一爲維新黨，亦名日本黨（可以說是親日派），主張開國政策，以王妃閔氏爲首領；

一爲守舊黨，亦名中國黨，主張鎖國政策，以大院君李昰應爲首領（大院君是朝鮮王李熙的本生父。李熙年幼時，他曾主持國政，後來李熙年長，妃閔氏專政，他遂不得預聞國事）。爲了與日本簽訂商約問題，兩派爭執頗烈，結果閔妃一派勝利，便由閔妃一派主持，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這條約的第一條，就寫明「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有平等之權」。這樣就取消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又規定朝鮮和日本互派使臣，建立直接的外交關係；除釜山外，加開沿海兩處爲通商口岸（後來開了仁川津及仁山兩處）；並允許日艦得自由測量朝鮮的海岸。

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朝鮮爆發了以大院君爲首的保守派的政變。大院君既著怨於閔氏，又痛恨政府對日本的屈服，就利用兵變，劫殺執政，幽閉國王，焚燒日本使館，誅殺日本派往朝鮮的軍事教官。清廷得訊，即命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帶兵往朝鮮。李鴻章怕引起戰爭，命令駐朝鮮公使馬建忠會同丁汝昌，將大院君逮捕，解送天津。於是朝鮮派使向日本謝罪，日韓在利物浦訂約，除懲兇、賠款外，日本有駐兵朝鮮首都（漢城），以保護日本使館之權。滿清政府也派袁世凱爲駐朝鮮全權委員，並派吳長慶率兵二千駐漢城。袁世凱與朝鮮外戚閔詠駿等竭力拉攏。另一方面金玉均、

朴詠孝等以『維新』爲號召，組織所謂『獨立黨』，實際上是依附日本，而與朝鮮的日本駐軍相勾結。因之，一向主張開國政策的閔妃一派，一變而爲守舊黨了。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日本乘中法開戰，煽動獨立黨在漢城發難，打進王宮，劫持國王，殺戮大臣，放逐反日分子，並自署官爵，組織政府，企圖一舉而使朝鮮脫離中國的關係。袁世凱聞變，立命吳長慶用武力鎮壓。日兵雖助獨立黨作戰，但這次叛變，終於被中國武裝鎮壓下去了。日本就派軍隊到漢城，脅迫朝鮮政府訂立善後條約。滿清政府派吳大澂爲欽差大臣，帶兵至朝鮮辦理善後。次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來中國，商議中日共同保護朝鮮辦法，與李鴻章締結中日天津條約。李不懂國際法，竟允許日本在約中訂定中日兩國在朝鮮同時撤兵；將來中日兩國如派兵往朝鮮，須先互相知照。朝鮮就成爲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了。

獨立黨起事後十年，爲公元一八九四年，即光緒二十年甲午，朝鮮又爆發了東學黨的事變。

東學黨的開始組織在清朝同治年間，其創始人名崔福成，其黨義係採取儒、佛、道三家學說，而以振興東學，排斥西教爲宗旨，實際則是朝鮮人民反政府的組織。事

變的起來，因為以前有一同志被朝鮮政府寃殺，他們向政府請願訟寃。在請願時，他們的領袖數人又被政府殘殺，於是他們號召人民，在全羅道的古阜縣暴動。朝鮮政府立即派遣大軍進剿，但被東學黨打敗，幾乎全軍覆沒。暴動範圍擴大，有直逼首都之勢。朝鮮政府發急了，便向中國討救兵。滿清政府裏從那拉后（西太后）到李鴻章都是立志鎮壓人民，獻媚「友邦」的，對於日本的侵略朝鮮，可以裝聾作啞，不加聞問，一聽到朝鮮來要求代為鎮壓他們的人民，就非常高興。李鴻章立即派遣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總兵聶士成，率軍東渡，參加朝鮮的內戰。一面依據條約，把出兵朝鮮的事情，照會日本。可是滿清的軍隊開到牙山（在朝鮮忠清南道的西北），東學黨的暴動已告平息；而日本的軍隊，則早已開進了朝鮮的首都漢城了。李鴻章原想在幫助人家打內戰時，使中國軍隊一顯身手，現在幫打內戰不成，日本軍隊來了，只好依約要求日本軍隊和中國軍隊一起從朝鮮撤退。但是日本那裏管什麼條約，他們已經準備和中國一戰，澈底掃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就藉口要改革朝鮮內政，不肯撤兵。這樣中日兩軍在朝鮮就展開了敵對的形勢。袁世凱在朝鮮，已看出日本有備戰之意，屢電李鴻章，請派艦隊到仁川，並請增派陸軍，以備非常。李鴻章不但增兵備戰，還

要撤退牙山的駐軍，以冀緩和形勢。經光緒帝嚴諭申斥，纔算不撤退牙山的軍隊，但仍然電告總督與日使小村協商中國撤兵的問題。

當中國的妥協派認爲『和平尙未絕望，決不輕言戰爭』的時候，日軍在朝鮮已開始作戰爭的行動：一面在漢江口佈水雷，以阻塞中國軍艦的進路；一面竟闖進朝鮮王宮，逮捕朝鮮王及反日分子，組織以大院君（大院君前被清廷逮捕，囚禁保定，三年後放回朝鮮）爲首領的傀儡政府，並使大院君宣布廢除與中國歷年所訂的一切條約。消息傳到中國，輿論大譁，彈劾李鴻章的奏疏，如雪片飛來。當時光緒帝及其師傅翁同龢，也極力主戰。李鴻章在全國上下督促之下，不得不勉強備戰。但他不多派艦隊運送多量援軍，只用運輸艦高陞、操江，運載少數陸軍，由渤海東航，以援牙山；其餘的援軍，都命他們由遼東陸路迂迴前進。高陞、操江兩艦駛至中途，被日艦襲擊，高陞沉沒，操江投降。同時駐漢城的日軍，已開始向牙山我駐軍進攻。到那時候，妥協派首領那拉后還沒有決心作戰，只說『不受辱』；但全國輿論沸騰，民心激昂，她知道萬難敷衍下去了，纔於七月初一日發布對日宣戰的上諭。

第三節 中日戰爭的經過與馬關條約的簽訂

當中日未宣戰前，日軍進攻牙山的中國駐軍，守將葉志超、聶士成棄城而逃。葉志超反向清廷謊報『成歡大捷』，因此葉志超以敗軍之將，反受總統諸軍的榮命。

葉志超從牙山率殘軍北奔平壤。平壤爲朝鮮舊京，負山阻河，形勢險要；中國大軍都集中於此。當地人民對中國軍隊異常歡迎，清廷也知道平壤重要，已派大批後援部隊增援。所以平壤的中國軍隊，既有地利，又得人和，只要指揮得宜，攻守有度，可立於不敗之地。但統帥葉志超庸懦無能，無法統率諸將，部署軍隊，諸將每天置酒高會，環砲自守。一部分軍隊紀律很壞，搶劫財物，奴役壯丁，甚至姦淫婦女。因而地理無用，人和盡失。九月十五日，日軍第一軍在其大將山縣有朋的指揮下，對平壤總攻。一戰而攻佔北門要塞，再戰而平壤豎起降旗。葉志超於當天晚上率諸軍棄城而逃，日軍追擊不捨，我軍自相踐踏，死者二千餘人，被俘的數百人，糧食軍械，公文密碼，一切都委之敵人。葉志超率殘軍過安州、定州，皆棄而不守，狂奔五百里，渡過鴨綠江，纔敢紮營。從此我國軍隊不再出現於朝鮮境內了。

平壤失守的後兩天，海戰也發生了。李鴻章費了二十年心血，創設北洋艦隊，當時中國的海軍力量相當雄厚，和日本可以說是勢均力敵。但李鴻章辦海軍的目的，似乎只在增加滿清政府的統治力量，防止像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的再起，並不是用來加強國防，洗雪國恥的。所以他一開始就不願意跟日本打。當朝鮮變亂初發動時，他立刻出動北洋艦隊，以控制朝鮮海面，保持海上交通，僅派遣濟遠艦率領揚威、平遠兩艦前往。等到日軍大集，濟遠管帶方柏謙以濟遠艦投降，李鴻章竟盡召諸艦回國。等到日本俘虜朝鮮王，局勢更惡化，纔又派威遠、廣乙等艦，先後駛至牙山。當時朝鮮海面已受日本控制，行至中途，即受日艦襲擊，狼狽逃回。牙山失守，中國大軍集平壤，大戰迫在眉睫，李鴻章纔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隊前往應援。那時候日本海軍已雄據朝鮮海面，當中國艦隊到達鳴綠江口大東溝附近海面時，即遭日艦攻擊，倉皇應戰。

海軍提督丁汝昌原是陸軍將領，而且屬於淮軍系統的，海軍官兵，十九都是福建人，因此指揮不靈。海軍的官佐，更加腐敗不堪，平時多帶家眷住在陸上，甚至士兵亦有離船陸居的。視兵艦爲衙門，只有照例點卯領餉，纔回到艦上。平時疏於操練，

臨戰不知所措。當時兩方艦隊，量與質均相差不遠，戰爭的勝負，要靠戰鬥技術來決定。中國艦隊最先排成人字形，張兩翼以待敵艦。日艦最初作一字形，以後相機變化，爭取有利的形勢。但中國艦隊則始終是人字形，沒有什麼變動。激戰四小時，中國艦隊大敗，經遠艦被俘，致遠、超勇、揚威、廣丙四艦被擊沉，只剩下定遠（中國的旗艦）等七艦，潰不成軍，當然不能再排成人字形了。從此北洋艦隊藏匿在旅順，日本奪取了黃海的制海權。

日軍佔領平壤後，前鋒進至鴨綠江南岸。中國的大軍則蝟集九連城。清廷逮問葉志超、衛汝貴，另派宋慶總統諸軍。宋慶作戰比較葉志超等勇敢，但他資望淺，諸將不受約束，且胸無韜略，亦非大將之才。當時連平壤敗歸各軍，拚合起來還有七十多營，但宋慶不能調度。他又不以重兵扼守鴨綠江沿岸，阻止敵人渡江，僅僅以少數哨兵游戈江岸。總之，毫無攻守的計劃和布置。十月二十五日敵人強渡鴨綠江。宋慶棄九連城，北趨鳳凰城；又以鳳凰城不可守，再退摩天嶺。日軍另一支隊，由蕘州渡江，向西北進擊，連陷安東、岫巖州、柘木城，最後進陷海城，截斷摩天嶺與後方的交通。

另一路日軍，在大山巖的統率之下，進窺大連、旅順。其時中國海軍已逃匿無蹤。原來駐守旅大的軍隊，已開往九連城增援。填防旅順的，是提督姜桂題、程允和所募的新兵。填防大連的，是總兵徐邦道、銘軍分統趙懷益所募的新兵。日軍逼金州，徐邦道力言金州有失，則大連旅順不守，請諸將分兵迎擊；但當時旅大諸將各不相屬，都不肯發兵。十一月六日日軍攻金州，徐邦道自率所部迎擊，衆寡不敵，金州失守。日軍分三路攻大連，趙懷益捲款逃旅順，把一百二十尊大砲及彈藥槍械，全數送給敵人。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軍海陸並進，夾攻旅順。時旅順諸將已將糧餉運送煙臺，準備逃亡。旅順的六個統領，原不相統轄，至是公推姜桂題爲主帥。姜爲人愚闇，惶然不知所措。徐邦道率少數軍隊，迎擊敵人於土城子，給敵人以很大的打擊；日軍大隊繼至，邦道孤軍無援，也敗退下來。趙懷益等率部搶掠，奪民船滿載而逃。徐邦道孤軍再戰，士卒傷亡殆盡；乃與姜桂題、程允和等雜亂軍中逃去，旅順遂告陷落。

戰爭節節失敗，滿清政府以淮軍不可靠，起用湘軍宿將魏光燾、李光久等，教他們募兵北上。召兩江總督劉坤一，授欽差大臣，督辦征東事務，以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那時候的李鴻章，已經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受革職留任的處分，

但仍掌握海陸軍的實權。不久湘軍出關作戰；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而逃，吳大澂棄田台莊夜奔入關，湘軍又垮了。日軍乘勝追逐，進陷營口。於是遼河以東，再沒有華軍的蹤跡。

陸軍雖然潰不成軍，但殘餘的海軍尚逃匿在威海衛。日軍爲要澈底消滅我國的海軍，又發動對威海衛的攻勢。日軍二萬，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十日自榮城登陸，向西攻擊，以拊威海衛之背。至三十日日軍攻陷威海衛砲臺。同時日艦二十五艘包圍威海衛海口，海陸兩軍夾攻停泊在劉公島內的中國兵艦。定遠、來遠兩艦中魚雷沉沒，靖遠艦被大砲擊沉，魚雷艇十二艘被日艦俘獲，餘艦不能動彈。丁汝昌聽從德員瑞乃爾的話，命令諸將擊沉軍艦，徒手投降，諸將不從；命諸艦突圍而出，也不聽從。汝昌服毒自殺，諸艦遂全部投降。在劉公島灣內的受傷與完好的艦船大小三十艘，通統被日本俘獲；而統計前後所喪失的，不下五十餘艘，北洋艦隊全部覆滅。

戰局發展至此，中日兩國就開始停戰議和的談判。在談判進行時，日本的艦隊又攻佔澎湖羣島，進窺臺灣，不過這已是戰爭的尾聲了。

當日軍攻陷旅順的時候，李鴻章請各國出任調停。英國曾以擔保朝鮮獨立及中國

賠償日本軍費作爲條件，勸日本停戰，被日本拒絕。清廷又派天津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德璫琳（G. Detring）爲媾和使，携照會赴日本請和，又被拒絕。美國恐戰事延長，影響他們的商業，兼欲見好中國，命令駐日美公使向日政府表示願任調停之意，日政府答稱須中國直接向日本求和。清廷就派侍郎張蔭桓及湖南署理巡撫邵友謙赴日本廣島議和，日政府認爲張邵資望太淺，不够資格。清廷乃改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東渡請和。日本則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爲議和和大臣，在馬關的春帆樓進行和平談判。日方態度極爲強硬，提出媾和條約草案，專等李鴻章簽字。兩方屢經磋商，李鴻章請求減少賠款數額，伊藤對他說，「但有允不允兩句話，不能減少」。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訂立了馬關條約。其重要條款爲：

- 一 中國承認朝鮮爲獨立國，廢除朝貢。
- 二 中國割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羣島給日本。
- 三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 四 兩國以前條約作廢另訂。
- 五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設領事館於各商埠。

六 爲擔保條約的實行，日軍暫時佔領威海衛，軍費由中國支付。

同年六月又續訂中日通商航船章程二十九條，規定准許日本汽船在宜昌至重慶，上海至蘇州杭州各航路自由通行。日人得向中國內地自由購買及輸入各種貨物，租棧存貨，並免除稅鈔及一切派徵費。日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所用各種機器，僅納進口稅，就可以裝運各地；所製貨物，只照輸入貨品納稅。此外日本又取得領事裁判權，並得到與列強在中國所享受的同等權利。

當李鴻章揣馬關條約回國時，輿論大譁，彈劾他的奏章多至百數十封，大都主張不批准和約，並且嚴厲懲辦他。臺灣人聞臺灣被割，尤爲憤激，主事邱逢甲等建議自主，公舉唐景崧爲大總統，圖謀建立民主國。俄國聞遼東半島被割，大起恐慌（如遼東爲日本所佔，帝俄就不能向極東發展），便約同德法兩國，向日本提出抗議，要求退還遼東半島給中國（那時候法國正與俄國締結同盟，還想在遼東投資，也不願意日本獨佔遼東半島。德國想乘機干預東方的事情，以謀擴張它的勢力於遠東）。帝俄且動員海陸軍，表示不惜對日一戰。日本不得已，最後照會三國，表示「日本悉依三國政府友誼上之忠告，願將遼東半島佔有權永久拋棄」，另由中國加給銀三千萬兩給日

本，作爲歸還遼東半島的報償。那時候李鴻章怕清廷不批准和約，曾派伍廷芳迎駐日領事來大沽，密令他電告東京，催促清廷換約，又急電伊藤博文，因此中日換約的全權大臣早已到達烟臺，等到遼東半島問題一解決，即匆匆換約，中日戰爭至此遂告一結束。從此朝鮮淪爲日本的屬國。臺灣的獨立運動當然不會成功，就與澎湖羣島同劃入日本領土了。

第四節 列強對華侵略的新發展

帝俄既強迫日本把遼東半島交還給我們，就以爲有功於中國，要求酬報。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禮，滿清政府特派李鴻章赴俄京致賀，李與帝俄締結中俄密約，允許以東三省的鐵路敷設權及鐵山開採權讓給俄國，並允許租借膠州灣。不久，中俄又簽訂了華俄道勝銀行契約。後來因爲德國強佔了膠州灣，俄國便強租旅順、大連，旅順作軍港，大連開商埠。並在租約中規定，自哈爾濱至旅大之鐵路與至牛莊至鴨綠江之支線由俄國建築。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俄國改遼東租借地爲關東省，以旅順爲首府，並置總督。這樣，從日本嘴里挖出

來的那塊肥肉——遼東半島，又給俄國吞食去了。不但如此，後來俄國因為跟英國爭奪鐵路建築權，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成立英俄協定，規定揚子江流域爲英國的鐵路建築範圍，長城以北爲俄國的鐵路建築範圍。從此滿洲與新疆、外蒙，都成爲俄國的勢力範圍了。

中俄密約成立後，英國大感不安，就加緊壓迫滿清政府，取得種種權利。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中英成立新協定，開騰越、思茅、梧州、三水、甘竹墟等爲通商口岸。次年中英締結租借威海衛條約。英國向滿清政府要求：（一）揚子江沿岸各省的土地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二）准許外輪航行內河；（三）開長沙爲通商口岸；（四）中國總稅務司監督永久聘用英國人。滿清政府都允許了。同年六月間，因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藉口爲『抵制法國危害中國及侵犯英國利益』，與滿清政府訂立租借九龍條約，規定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四十餘島與大鵬、深圳兩灣租借給英國。從此英國在中國建立了兩個重要海軍根據地（威海衛與香港九龍），遂得北與俄國，南與法國的勢力抗衡。同時英國又取得在山西的鐵路設權及山西河南的採鑛權。當時據英國政府自己表示，英國在華的勢力範圍，包括雲、貴、川、贛、皖、豫及兩

湖、江、浙等十省。

在「干涉還遼」的三國中，法國最先向中國要求報償。當中日戰爭的時候，法公使已向滿清政府要求續訂中法劃界及鐵路通商專約，中日和約換約後，法國的要求也實現了。法國的邊境擴展到湄公河上游，江洪河畔都成爲法國的領土，開闢思茅、河口爲新貿易場，並取得了雲南、兩廣的鑛山開採權，雲南的鐵路建築權。一八九七年春間，法公使又向滿清政府要求：海南島不割讓給他國；延長龍州鐵路；修築雲南到安南的通商道路等。滿清政府大體上均予承認。一八九八年法國又藉口殺害武官教士事件，強租廣州灣，並在租約中規定，法國得在廣州灣作軍事上的設備。這樣，法國在我國南部的勢力範圍也劃定了。

德國是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侵略中國爲時較後。它爲參加「干涉還遼」，曾向滿清政府要求報償，但被拒絕了。一八九七年冬，山東曹州發生殺害德國教士事件，德政府就作爲藉口，派軍艦赴膠州灣，脅迫滿清政府租借膠州灣。滿清政府被迫，和德國訂立了膠州灣租借條約，其主要條款爲：（一）將膠州灣水面與內外羣島租借與德國；（二）德國得在租借區內建築砲臺及行使戰權；（三）中國准德國在山東修

築自膠州灣至濟南的鐵路，德商有在鐵路附近三十里以內開採鑛山之權。這樣，山東就成爲德國的勢力範圍了。

中日戰後，日本對我國的侵略野心更大，豫備南北並進（即所謂「海洋政策」與「大陸政策」）。但日本究竟是一個小國，從中國方面驟然得到這許多權利，需要相當時間來消受，在北方又碰到一個強敵——帝俄，因此，它只能暫時經營南方。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日本以福建省與臺灣相接爲藉口，向滿清政府要求發表聲明，福建省及其沿岸一帶永不租借或割讓給他國。滿清政府承認了。從此福建就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的情形，大概如是。等到日本戰勝俄國，帝俄在南滿的權利，就讓渡給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又取德國在山東的地位而代之，但這是後話。這裏所要敘述的，在這帝國主義列強爭先恐後地向我國侵略的時候，北美洲中南部的美利堅合衆國，難道肯默爾而息嗎？只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較後，未能及早參加侵華集團。它來遲了一步，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早經劃定，使它毫無從插足之感。它就想出一個很妙的方法，以超然第三者的地位，標榜「世界和平」

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由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向各國提出所謂中國門戶開放宣言，主張：

一 各國對於在中國所獲的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域，或別項既得權利，互不相干涉。

二 各國範圍內的各港，除自由港外，對於任何國輸入的商品，都依照中國現行關稅率納稅。

三 各國範圍內的各港，對於別國入港船舶，不得課以比本國船舶較重的入港稅。各國範圍內的鐵路，對於別國貨物，不得課以比本國貨物較重的運費。

當時各國為暫時保持其既得的權利計，先後表示贊同。這主張成為後來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政策。事實上所謂『門戶開放』，就是不許各帝國主義壟斷，讓美國也有一分兒的意思。如果說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略用的是鋼刀，那麼美國用的是『軟刀子』。

帝國主義列強趁中國新遭挫敗，爭先搶奪鐵路建築權贛山開採權等，以造成其勢

力範圍，取得其在華投資的保障。從此以後，中國社會從經濟機構到政治文化的整個體系上，更進一步的變成了帝國主義的附庸，半殖民地中的地位也格外加強了。同時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各在其勢力範圍內與封建勢力相結合，就漸漸使中國形成後來軍閥割據的局面。

第五節 甲午戰爭慘敗的教訓

甲午戰爭跟鴉片戰爭一樣，是中國史上劃時代的戰爭。鴉片戰爭的結果，使中國的封建社會根本動搖。甲午戰爭的結果，使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地位更加強化。

甲午戰爭失敗得比任何一次都慘。鴉片戰爭的對方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英國，他們有的是兵艦和大砲，決非疲憊的綠營兵和所謂『水師』所能抵抗（假使不動員民衆的話），然而也還抵抗了一回，並且有『平英團』的民衆反抗，使得大英帝國不得不有所退讓。英法聯軍之役，滿清正用全力鎮壓南方的太平天國革命，削弱了對外的力量，但大沽砲臺的大砲，還擊沉過四艘英國砲艦。中法戰爭明明是中國打了勝仗的，

只是以那拉后和李鴻章爲首的對外投降派決心要妥協，不惜喪權辱國，纔在勝利後反向敵人作城下之盟。甲午戰爭的對方是蕞爾三島的日本，當時中國在李鴻章的主持之下，已經編練了南北洋艦隊，中國海軍的實力並不在日本之下，又加以地大物博，人民於歷受外來侵略之後，同仇敵愾，都想趁此機會，一瀆國恥，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這次戰爭是沒有失敗的道理的。然而竟失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自始至終，不會打過一次勝仗，費十多年心血所編練的北洋艦隊，只在四小時內被打得七零八落，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爲當時中國有一個專制，獨裁，腐敗，貪污的「壞政府」。在這個「壞政府」裏掌握大權的是一個老寡婦，那就是咸豐帝的寵妾而那時候已做了太后的那拉氏，當時人稱她西太后，死後稱慈禧太后。她沒有什麼知識，卻具有一副頑固的頭腦。滿洲的皇族親貴，本來把中國當作他們的私產，把他們的「天下」看作儻來之物，喪失一些藩屬，割掉一些土地，開放幾個通商口岸，他們慷慨得很，滿不在乎。他們只是夢想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劃出一塊特殊的地盤，來保持他們最喜愛的封建專制主義，利用落後的生產方式，推行獨裁的政治，保存中世紀的文化。他們最喜

怕的，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人民的起來。他們把人民當作「家奴」。那拉后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寧贈夷狄，不與家奴。」這不是負氣話，倒是她的對外對內的政策。而身兼官僚、地主、買辦的三種資格的李鴻章，他自身的利害和滿清政府的利害是一致的。他是滿清的忠臣，那拉后的幫手，也就是封建地主階級中最反動勢力的代表人。他是打內戰的能手，辦喪權辱國外交的專家。他自命懂「洋務」，但「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砲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都是梁啓超批評李鴻章的話）他之所以整頓軍備，編練南北洋艦隊，與其說是爲鞏固國防，無寧說是要增強滿清政府的統治力量，以防止像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的再起。所以當朝鮮國王請求他派兵去幫助朝鮮政府打內戰，他毫不猶豫地派大軍前往，等到要和日本正面衝突時，他就猶豫畏怯起來了。他和那拉后都是主張對日妥協的，倘不是日本相逼太甚，倘不是全國民情激昂，滿清政府是不會對日宣戰的。因此，李鴻章事前不準備戰爭，等到戰爭發生，既不以陸軍增援牙山，又不令海軍佈防朝鮮海面，以致牙山、平壤相繼失守。李鴻章是當時戰爭的最高指揮者，但他同時是投降妥協派的首腦，在

戰爭的進行中，他是念念不忘於妥協的。平壤戰敗後，他就企圖停止戰爭，與日本妥協，但以民氣激昂，不能實現他的願望，等到旅順失守，他的願望可實現了。以一個投降妥協派的領袖來當戰爭的最高指揮者，妥協與戰爭平行發展，如可能獲得勝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獲得勝利，那倒是奇蹟了。

有些編輯近代史的先生們，用現代的眼光，來批判五十年前史事，責備滿清政府不懂得動員民衆。他們不知道當時根本沒有『動員民衆』這個名辭。人民如果起來抗戰，那就是反叛，就是匪類。照例可以『格殺勿論』的。倫敦的泰晤士報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發表過這樣的評論：『中國如海蜚然，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關。假如歐洲亦有如旅順口者，一旦爲敵兵所奪，則全國丁男子女，無不引爲己憂。反是以觀，則華人誠蠢拙之至矣。』（見甲午中日戰輯）他們不知道當時中國的人民並不是對國事漠不關心。在李鴻章奉命赴日本的時候，上海一埠就貼滿了反對投降的標語；在李鴻章到了日本之後，全國輿論又一致抨擊議和的失策；馬關條約簽訂時，就有康有爲爲首的一千三百多位舉人的『公呈上書』，主張遷都抗戰（詳見第四章）。只是因爲當時有一個與人民爲敵的『壞政府』，它害怕人民，寧可對『夷

狄」屈膝，不願讓人民起來，當然不會懂得什麼『動員民衆』了。說中國人『蠢拙』，中國人是不承認的。

而且當時中國的這個『壞政府』即使決心跟日本一戰，也是不能操勝算的。爲什麼？因爲『壞政府』裏的上上下下，盡是些貪污人物。當李鴻章與辦海軍的時候，那拉后就強挪一筆海軍經費去建築頤和園（圓明園在英法聯軍入北京時被焚毀了）。北洋海軍成立時，那拉后派她的『面首』太監李蓮英，隨海軍督辦醇賢親王到天津、烟台、旅順等處去檢閱，糜費了幾百萬閱兵費。海軍將領如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衛汝成、趙桂林、龔照嶼等，都爭先恐後地送貴重的禮物給李蓮英，投拜門下，自稱『受業』。從此他們有了奧援，非常跋扈，不大受李鴻章的指揮。而他們所付出的鉅額的賄賂，就用貪污舞弊的辦法來補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在海軍界中辦事的大小官員，十之八九是貪污的。嚴復說：『甲午之辦海防也，水底魚雷與開化彈子，有以鐵滓泥沙代火藥者。』嚴氏是學海軍的，熟悉當時海軍界的情形，當然不會說謊話。倫敦泰晤士報也說：『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衛既設砲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砲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購之

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假如一砲也，輾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僅以值五六百金之砲應命，皆不問其可用否也。」（見甲午戰輯）又王炳耀在朝鮮紀亂中說：「平壤華軍所執之洋槍，係專爲牟利，不顧喪師辱國之監司大員所轉購，藥不配彈，子不對槍。」至於兵，除淮軍外，都是新募的，因爲「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丐無賴，混雜其中」，所以軍紀非常腐敗，軍行所至，種種騷擾，不一而足。當時的軍官，「事先一無培植，一聞招募，各營皆以鑽謀爲能事，不以韜略爲實政」，而且「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所以扣餉吃缺，成爲極尋常的事。例如衛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百兩回籍，以致軍心渙散，臨陣先降」。而其他的軍隊，也大都「每遇戰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也者」（以上所引，均見甲午戰輯）。羅惇在所著中日兵事本末中有這樣一段記事：「衛汝貴治淮軍久，以貪諂至提督，援朝鮮時年六十矣。其妻貽書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婦誡，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這樣的裝備，這樣的士兵，這樣的軍實，即使海軍噸位，陸軍

人數，都超過敵人，也沒有打勝仗的可能的。

因為中國有一個「壞政府」，從中朝大官以至各省督撫，盡是些腐敗，貪污，頑固的人物，他們「不知國家爲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疆吏當盡之責任，全國上下形成麻木不仁之象」，真像海蜆一般，任人擇肥而割，其他部分仍然漠不相關。當遼東戰事十分嚴重的時候，「其他各省，官吏偃息於牀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兵革禍也」（中日甲午戰輯）。梁啓超曾記當時一則故事：「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艦，書中謂此艦係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云。」無怪在開戰之前，日本人有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人衆爲慮者，伊藤博文就說：「中國名爲一國，實則十八國」（按當時中國本部凡十八省）。西報的評論也說，「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事實上李鴻章也何嘗有決心與日本戰！）。

甲午戰敗後，西報批評說：「中國至今日孱弱已極，其砲如木彫成，其人如紙糊老虎。」英國泰晤士報婉惜地說：「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爲何事。賊使早延西人爲之訓練，餉銀則毫不剋扣，

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泰晤士報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不配合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即使有新式裝備並請西人爲之訓練的海陸軍，還是無濟於事的。）從此，歐美人看穿了中國這隻『紙老虎』，更清楚地認識滿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但是，他們還要維持這個『壞政府』，以便向它取得種種特權。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的依靠，所以他們要和以前的社會結構的統治階層（封建地主、商業與高利貸資產階級）結成聯盟，進攻大多數的民衆。帝國主義是到處企圖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在鄉村中），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的。但從另一方面說，甲午戰爭所給與中國人民的教育作用，倒是很大的。由於甲午戰敗的刺戟，引起了變法維新運動；因變法維新的失敗，促成了革命的爆發。甲午戰爭在它的本質上可說是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殘餘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清算；但不到二十年，中國人民自己起來，清算了那個專制，獨裁，腐敗，貪污的『壞政府』，開始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大道邁進。所以甲午戰爭又是從舊中國轉入新中國的關鍵。

第四章 戊戌政變到庚子拳亂

第一節 從洋務到維新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戰爭，無一役不失敗；而滿清政府打败太平天國，全靠外國裝備，由洋人訓練，歸洋人統率的『洋槍隊』，因之一般貴族官僚對於洋人的勢力頗覺可怕。薛福成曾記述胡林翼的一個故事，很有意思：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嘗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似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

胡林翼死於一八六一年，那時候太平天國尙未失敗，但他不怕『粵賊』而怕『洋人之勢』。太平天國平定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以『中興功臣』在政治上負着重望，具有實力。他們以軍事和外交的關係，和洋人接觸較多，對於洋人的長處，他們也自以爲懂得一點。尤其是李鴻章，他認爲『西人專恃其槍砲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又認爲西方諸國之所以成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其原因在於『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李鴻章奏摺中的話）。因此，他們認爲中國要自強自立，必須取法西洋各國，從整頓軍備，振興工商入手。又因爲辦這些事都是取法西洋的，所以概括稱之爲『洋務』。他們對於洋務確曾盡過一番力，我們且看下面的表：

-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 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及蘇州設立小規模製砲局（後併入江南製造局）。
-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 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設立金陵兵工廠。
- 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 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奏設輪船製造廠於福建馬尾。

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挑選學生赴美留學。請開煤鐵礦，設輪船招商局。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籌辦鐵甲兵船。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

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砲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派武弁往德國學習水陸軍械技藝，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製造技術。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丁寶楨奏設成都機器廠。

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左宗棠在甘肅蘭州設製呢總局。

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始購鐵甲兵船。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南北洋電報局。請修築鐵路。開採山東嶧縣煤礦。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設開平鐵務商局。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吳大澂

奏設吉林機器廠。敷設唐山鐵道。

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

築旅順軍港船塢。設商辦機器織布局於上海。

設立金陵火藥局。

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

上海商人祝大椿在上海設立源昌機器五金工廠。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

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

張之洞在廣東創立縲絲局。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

開辦漠河金鑛。開採熱河四道溝銅鑛。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

北洋海軍成軍。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

張之洞在廣東設織布局及鑄鐵廠（向英國購鎔鐵

爐兩具）。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

創立上海紡織新局（官商合辦，為恆豐紡織廠之前身）。漢陽兵工廠成立。張之洞奏請將廣東之

鎔鐵爐移武漢，設立漢陽鐵廠。

鎔鐵爐移武漢，設立漢陽鐵廠。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

張之洞在武昌設立織布、紡績、製麻、製絲四局

(後改名爲湖北紡紗布官局)。湖北成立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官商合辦)。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 上海華盛紗廠成立(爲申新第七廠之前身)。

上列各種事業，前一期的，大都爲李鴻章所倡導或創辦，他是洋務的主持者(曾國藩於一八七二年病死，左宗棠則專征西北)。就他們所辦的事業來看，誠如梁啓超所說的，不外「軍事」與「商務」，「其間有興學堂，派學生游學外國之事，大率皆爲兵事起見，否則以供交涉翻譯之用者也」。所以梁啓超笑他們「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相傳德國的俾士麥曾經說過：「中國和日本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爲日本人到歐洲來的，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制原理，豫備回國去進行根本的改造；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砲造得怎樣，價格是否便宜；買了回去就完事。」當時出使英國的郭松燾寫信給李鴻章說，日本人留學英國的大都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軍事的很少。他認爲應該「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

他反對一味注意在軍事方面，認爲「各省督撫，高談可達之理，募勇又非能當也，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李鴻章回答他：「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不求兵法。兵乃立國之要端，欲舍此別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祇有盡其力所能爲而已。」我們說過，李鴻章等致力於所謂洋務，其最大目的在改良軍備，以增加滿清統治的力量，防止像太平天國那樣的亂事的再起。他們只感覺到軍備改良的需要，而從事於軍事工業的建設。他們決不會意識到軍事工業的建設，須有廣大的一般產業與強大的新社會生產力做基礎；軍事的學習與軍備的改良，須和全部的政治改革與軍隊改組配合起來，才能收預期的效果。固然，他們也感覺到，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李鴻章奏疏中白話），他們所碰到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以爲『窮則變，變則通』，中國也非有所『變』不可。然而他們不會從經濟政治方面去研究歐美各國所以富強的原因，來進行根本的改革，以爲中國的封建社會專制政治，是萬年有道之長，斷沒有可以改變的道理。和李鴻章同調，也高唱『窮則變，變則通』的張之洞，在他所著的勸學篇中說：『夫不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這幾句話可以代表當時所謂『通

「曉時務」的新官僚和士大夫的一般見解。張之洞又曾提出過「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這幾句話也正是這個口號的注腳。

甲午戰爭一敗塗地，北洋艦隊全部毀滅，郭松燾所說「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成了預言。然而另一方面倒刺戟了一部分覺醒的士大夫與新官僚，使他們知道西洋各國於兵艦大砲之外，還有他們的政治制度也值得模仿。這樣，他們就起來號召「變法維新」，從事於政治改革運動了。

維新運動的領導者是康有爲。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他是「書香人家」的子弟，他的祖父是一位「程朱派」的理學家。他的父親早死，所以小時候受的是他祖父的教育。後來又在朱九江那裏讀書。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是康有爲的同鄉。他也是理學家，屬於「陸王一派」，又研究歷史，治經學。在經學方面，他綜合漢宋，不講家派。康有爲在他那裏讀了六年書，受的影響很大。後來遊香港上海，很驚奇於西洋人殖民政治的完整，以爲屬地尙且如是，本國的政治可知，因而聯想到他們一定另有一套政治原理，就把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翻譯的書都買來讀了。那時候所譯的書，都是些自然科學及工藝、軍事、醫藥等等，關於政治、經濟、

哲學的一無所有，但康有爲能舉一反三，即小見大，讀了也頗受影響。從此他思路開拓，在他的思想領域中開闢了新境界。

我們說康有爲開闢了新境界，可是他的新境界還是從六經裏找尋出來的。中國封建社會縣延了二千多年，中國的政治，向來是奉六經爲準繩的。當時如果不引經據典，只把西洋那套平等自由的學說整套搬來，不但沒有人懂，沒有人接受，恐怕大多數人要聞而卻步的。所以康有爲不得不從六經中找新境界，發爲新理論（事實上也只能如此）。後來梁啓超也說：「今日中國開立憲共和之論而卻步者尙占大多數，不引微先聖最有力之學說以爲奧援，安能樹一壁壘，與二千年之勁敵抗耶？」

我們要敘述康有爲那套變法維新的理論，先須講一講所謂「經學」。經學原有「今文派」「古文派」的分別，這兩派對於六經的見解和研究方法都不相同。大抵今文派比較誇誕一點，喜歡附會經典，自成理論。康有爲是屬於今文派的。他的附會經典比以前的今文家更厲害。今文家的說經，是依據春秋公羊傳的。公羊傳裏面本有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康有爲就從這裏面去找尋他的政治理論。他在甲午以前已著了兩部書，一部是新學偽經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認爲那些晚出的古文經傳，

都是王莽的國師劉歆偽造的，所以都是「偽經」。既是偽經，那麼，古文家的經學算不得「漢學」，祇能說是「新學」（王莽改國號爲新）。他又認爲周秦諸子都是託古改制的，如老子依託黃帝，墨子依託大禹，許行依託神農，堯舜便是孔子所依託的人物。經典中盛稱堯舜的功德，完全是孔子的理想。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創作的微言大義。而公羊所說的「通三統」「張三世」，深得孔子改制的精義。所謂「三統」，就是白統，黑統，赤統，互爲循環而不相沿襲（例如夏、商、周各得其一統，不相沿襲）。所謂「三世」，就是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昇平世爲「小康」，太平世爲「大同」。他根據「張三世」之義，衍爲專制，立憲，共和的政治進化論。根據「通三統」之義，認爲「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而倡變法維新之說。他的理想世界，就是所謂「大同之世」，曾著有大同書。他以爲漢朝以來的治法，都是「小康」之法，孔門另有「大同」的道理。但目前也只能講小康，不能談大同。那時候的康有爲，真不愧爲思想前進的新人物。他在學術上提倡疑古精神，否定經學道統。他在思想上，是歷史進化論者。他說孔子託古改制，其實他自己正是託古改制。他雖引經據典，披着孔學的外衣，實際上他的思想是中國古來「天下爲公，選

賢與能」的大同主義及外來的民主主義的混合物。

康有爲在甲午以前已經得到幾位門弟子，其中最有力的是梁啓超。後來康有爲由舉人成進士（甲午的下一年），在北京大小官僚中，得到好多同情他的人，如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給事中高燾會以及張蔭桓、李端棻、楊銳、林旭、劉光第都是。督撫中如陳寶箴（湖南巡撫）、張之洞，也是他的同情者（後來張之洞怕出亂子，就跟維新派斷絕關係）。甚至於大學士翁同龢也贊成他的主張。其他同志有黃遵憲、陳三立（陳寶箴的兒子）、汪康年、徐仁鑄等，不勝列舉；而湖南的譚嗣同更是他同志中的急先鋒，一位卓越的理論家。康有爲既然有了一套政治理論，更有這許多同志，便在各地創立學會，開辦報館。他在「公車上書」的下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被迫回兩廣講學，創立了一個桂學會。一八九六年又赴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組織強學會（袁世凱也是強學會的贊成人）。他就抓住這個學會，推張之洞爲會長，並設分會於上海，在上海出版了強學報。後來因爲強學報用孔子降生紀年，把張之洞嚇壞了，就被禁止發行，強學會也遭封閉。梁啓超、黃遵憲等就又辦了一個時務報，大受讀者歡迎。梁啓超在康門弟子中受歐美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影響最

深，在維新派中是最開明最博學的一個，他寫的文章筆鋒常帶感情，因之聲名很大。「康梁」並稱，就開始在這個時候。不久德國強佔膠州灣的事件發生，舉國譁然，康有為又乘此機會，在北京倡立了保國會。又以「振作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為學會，以相講求」，就以各省在京人士作基礎，在北京分別倡立粵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把維新運動展開到各省去。那時候，感受維新空氣最强烈的要算湖南。由譚嗣同、唐才常等倡導，得巡撫陳寶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黃遵憲、學使徐仁鑄等的維護與協助，倡立南學會，辦了一個時務學堂（梁啟超曾在這學校裏講過學），又刊行湘學報。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的春夏間，維新變法的空氣已經很濃厚了。

第二節 戊戌政變的經過

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上書光緒帝，陳說列強侵略中國的危狀，請取法歐美日本，實行改革，為大臣所阻。中日之戰快要講和的時候，他在北京會試，糾合了各省到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上萬言書，主張遷都續戰，力陳變法維新

之不可再緩，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那時候大學士翁同龢以皇帝的師傅而兼軍機大臣，贊助康有爲的主張。光緒帝看了奏章也很受感動，就密令翁同龢擬詔書十二道，將頒佈維新政令，被那拉后發覺，翁同龢貶官，康有爲南歸，事遂中止。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德人強佔膠州灣，康有爲時以進士任工部主事，又上書陳事變之急，建議改革的具體辦法。他的奏章是呈請工部代奏的，一直被擱置着，但在京師已抄傳殆遍。那時候，各地學會紛紛創立，梁啓超主持的時務報，風行全國，維新派的聲勢已十分浩大。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恭親王奕訢病死。那奕訢是那拉后的耳目，一直在監視着光緒帝的（那時候名義上光緒帝算是『親政』了）。光緒帝本已決心變法，但被奕訢等阻撓，現在奕訢已死，少了一個監視他，掣肘他的人了，便諭令王大臣傳有爲至練署，詢問變法事宜。王大臣才把上年康有爲請工部代奏的奏章給光緒帝看了，光緒帝很感動，命令嗣後康某如有陳條，即日呈遞，毋許扞格，並宣取所著日本變法及俄皇大彼得傳等書。是年四月二十五日（陰曆，下同），因御史楊深秀、侍讀徐致靜的先後奏請，下明定國是的詔書。隨即召見康有爲，命他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行走，並許他專摺奏事。從此新政開始。在三四個月

內所下實施新政的七諭凡數十道，如廢八股改策論，停書院改設學校，裁汰冗官，變更兵制，保薦經濟特科人才，開辦中國通商銀行，設鑛務、鐵路及農工商局於京師，命各省設商會，上海設總商會等，都是比較重要的設施。一時中外耳目爲之一新。

這種改革運動是自上而下的。康有爲只抓住一個光緒帝，在光緒帝的上面還有一個那拉后，下面還有一個軍機處（當時中央政府的實權都在軍機處），北京以外還有一個兵權所寄的直隸總督。當時光緒帝名雖親政，實際上凡二品以上大員的黜陟，都要請示於太后，所以雖然信任康有爲，卻只能給他一個「總理衙門行走」的官。一個「總理衙門行走」，如何能够制服這些人和機關呢？康有爲沒有方法抓住軍機處，終不能實現他的維新計劃。於是在七月間經各方的運動保薦，光緒帝擢用了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均賞加四品卿銜，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那時候梁啟超賞六品銜，在辦理譯書局事務）。這四個人都是維新派的健將，當時人稱之爲「四卿」。從此凡有奏摺，都經四卿閱覽，凡有上諭，都經四卿屬草，其餘的軍機大臣無不側目而視。但光緒帝不敢更換軍機大臣，更無法使康有爲入軍機處。倒是那拉后早已命光緒帝把直隸總督實授榮祿，又命把裕祿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裕祿爲那拉后所寵信，

特地把他放在軍機處偵探政局內情的。

當四卿未入軍機處以前，光緒帝曾斥革了禮部尙書懷塔布以下六個堂官。這六個堂官，都是頑固守舊派。懷塔布的妻常在頤和園侍候那拉后的，她就向那拉后哭訴，說皇帝要把滿人都去了。那拉后聽了她的話，很不以光緒帝爲然。榮祿已經實授直隸總督，手握重兵（他節制北洋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軍），那拉后便和他秘密商議，指使御史李盛鐸奏請光緒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預備於閱兵時用兵威脅，實行廢立。李盛鐸的奏章上去，光緒帝向那拉后請示，那拉后欣然允諾，遂下定九月中奉太后赴津閱兵之詔。詔書下後，廢立的風說，日緊一日。四卿對於光緒帝的受制於那拉后，頗多憤慨，又痛恨頑固守舊大臣的阻撓新政，光緒帝特賜手詔安慰他們，說：『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富兵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譚嗣同等看了這個手詔，知道形勢已萬分急迫，便想到那強學會的贊成人而握有『新建軍』的袁世凱（注一），想利用他來制服榮祿和那拉后。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因譚嗣同等

的密保，特別召見袁世凱，命他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袁世凱原任直隸按察

使，現在取得侍郎的官銜，是升了級了。初二日又召見。初三晚上，譚嗣同特別去訪袁世凱，要求他在九月天津閱兵的時候，用軍隊保護光緒帝，把榮祿殺了。譚嗣同告訴袁世凱，如果不願意幹的話，就請到頤和園向西太后舉發，可以得富貴。袁世凱正色厲聲地說：「你把袁某當成何等樣人！」袁世凱算是答應了譚嗣同的要求了，譚嗣同也很高興，以為大事成了。可是袁世凱真的爲了可以得富貴，把譚嗣同這一夕話向那拉后榮祿方面告了密。那時候，那拉后和榮祿已在軍事方面有所佈置，撥調聶士成軍五千駐天津，又命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又急電袁世凱返天津。袁世凱回到天津，榮祿就乘專車到北京，和懷塔布等赴頤和園，請那拉后回宮聽政。那拉后立命以榮祿的衛兵守禁城，命榮祿仍回津候命，會議到夜半才散。同時京城裏有一種謠言，說維新黨要圍攻頤和園，那當然是那拉后一方面散佈出來的。初六日那拉后下諭搜捕南海館（康有爲在北京的公館）。並藉口皇帝有病，重新垂簾聽政，把光緒帝幽禁於瀛臺，下詔停辦一切新政。那時候，康有爲已經離開北京，在乘輪赴上海途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康有爲之弟康廣仁，都被捕下獄。張徐二人，一充軍新疆，一永遠監禁。其餘六人都被殺了，就是所謂「六君子」。

此外受處分的，尚有禮部尚書李端棻，充軍新疆；湖南巡撫陳寶箴，編修徐仁鏞、徐仁鏡、三品卿銜黃遵憲、四品京堂王照、江標、庶吉士熊希齡、詹事王錫藩、六部員外郎李岳瑞、吏部主事陳三立、刑部主事張元濟等都革職。梁啟超受日本人保護，逃到北京。譚嗣同未被捕以前，梁啟超勸他到日本使館暫避，他回答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

從光緒帝下詔定國是到那拉后重新垂簾聽政，前後只有一百多天，當時人稱之爲「百日維新」。

第三節 那拉后的反動政治

那拉后重新垂簾聽政以後，一方面肅清新黨，一方面佈置親信。榮祿由直督召入軍機處，仍舊節制北洋各軍，而以裕祿爲幫辦。把光緒帝三四個月來下詔舉辦的新政完全翻過來。例如：（一）恢復八股；（二）禁止士民上書言事；（三）禁止集會結社；（四）禁止報館，嚴拿主筆；（五）停止各省書院改學校之舉；（六）停止經濟特科；（七）撤廢農工商局；（八）撤廢官報局（按上海官報即由時務報改）；（九）

命京內詹事府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按這些飯碗衙門，在『汰冗官令』中決定要裁撤的）；（十）復設鄂、粵、滇三省巡撫及河道總督各缺（按這些官缺，在『汰冗官令』中也決定裁撤的）。總之，不但把新政全部推翻，恢復原來的樣子，而且變本加厲了。就在戊戌那年的十二月中，湖北巡撫曾鈺，奏請變通成例，立刻被人彈劾，說他『擅請變法，莠言亂政』，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從此沒有人再敢提『新政』二字了。一直到庚子（一九〇〇年）義和團暴動時，維新黨人唐才常，聯絡會黨，密謀在長江流域起義，以『勤王靖難』為口號，但因時機不密，失敗了，這算是戊戌政變的餘波（注二）。

爲了變法維新，那拉后恨光緒帝刺骨，一意要廢舊君立新君。現在光緒帝已被幽禁，要廢掉他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可是從太平天國亂後，各省督撫之權漸重，形成外重內輕之勢，要行廢立大事，先得探詢各省督撫的意見。不料探詢的結果，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反對，他回電說，「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使得那拉后的計劃一時不能實現。再過了一年光景，那拉后耐不住了，因爲康梁在國外大倡『保皇』之論，開口『聖主』，閉口『皇上』，她覺得不把這個『保皇』的目標更換，終久是禍

胎。她聽從大學士徐桐等的建議，先擇宗室近支立爲皇太子（光緒帝沒有兒子），再等機會把皇太子捧上皇帝的寶座，就有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下詔立溥儀爲大阿哥（滿洲人稱皇太子爲大阿哥）的事情。這就是所謂「己亥建儲」。己亥建儲的作用，大家看得很清楚，在上海就有經元善、蔡元培等紳商千餘人聯名電爭，海外華僑也紛紛來電力爭。當時那拉后對於各省督撫以至紳商及華僑的反對，已先有所佈置，例如召反對建儲最烈的兩江總督劉坤一來京陛見，命李鴻章爲兩廣總督（因爲康梁在海外聯絡華僑倡保皇，華僑大都是廣東人，她怕廣東出亂子，特派李去鎮壓）等等，所以她對於這些反對的電報，並不十分重視。現在她所要知道的，究竟她的主子——帝國主義列強對於廢立的意見如何。她就派人向各國公使表示，朝廷建立大阿哥，請他們都來道賀。假如各國公使真的來道賀，便是贊成廢立了；但是各國公使都置之不理。因此她由憤怒而發生一種排外思想，她恨不得用什麼「法寶」或「神力」來把「洋鬼子」一律趕出去。

在這樣一個專制腐化的「壞政府」的統治之下，中國所有的微弱的新工業，當然得不到國家的保護與獎勵，對於外來的經濟侵略，更無法抵制。本來李鴻章等致力於

所謂『洋務』的結果，建立了一些軍事工業。隨着軍事工業而發展起來的，則有煤鐵鑛的開採，鐵路的敷設等等。屬於輕工業的如紡織廠、絲廠、紗廠、火柴廠等等，也相繼開辦。一部分商人、官僚，開始投資於工業。中日戰後，馬關條約中允許外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從此外國資本的工廠爭先設立，阻礙了我國自己的企業的發展。尤其嚴重的，就是外國商品輸入的激增。從一八四二年到一八九九年，列強在我國陸續開闢了五十一個商埠。各國的商品就從這幾個商埠大批運進來，而我國所運出去的都是原料，入超就一年一年激增。據統計：一八八四年（甲午戰爭的前十年）輸入總額為七二、七六〇、七五八兩；輸出總額為六七、一四七、六八〇兩，入超僅五、六一三、〇七八兩。到了甲午戰爭那年（一八九四年），輸入總額為一六二、一〇二、九一一兩，輸出總額為一二八、一〇四、五二二兩，入超已達三三、九九八、三八九兩。甲午戰後，入超逐年增加，到一八九九年（戊戌政變後一年），輸入總額為二二八、七四八、四五六兩，輸出總額為一五九、七八四、八三二兩，入超竟達六八、九六三、六二四兩。入超的激增，使中國白銀外流。外國商品的大量輸入，使中國舊有的手工業和農業日趨破產。同時滿清政府爲要償付鉅額的新舊賠款，繼續舉借

外債。僅在一八九四到一八九八年的四年間，向英、俄、法、德諸國新借的款，綜合起來已達五四、四五鎊之多。爲要償付鉅額的新舊外債，便又加緊了對人民的榨取。滿清政府把從中國人民身上榨取來的財富的大部分奉獻給帝國主義列強，把剩餘的一部分來維持它的統治機構與貴族官僚的奢侈生活。

政治腐敗，經濟破產，我國大部分的農民在帝國主義與專制政府的雙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生活極端困苦，因此而引起廣大的農民鬥爭，特別在山東、山西、直隸等省普遍地開展起來，發生了義和團運動。

第四節 義和團的起來

義和團本稱義和拳，起於嘉慶時，是降神練拳的一種低級宗教，源出八卦教，爲白蓮教的支派，在它的歷史上就帶有反抗外族壓迫的特性。白蓮教本以「反清復明」爲口號的；但到了義和團，又改爲「扶清滅洋」了。這是因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使中國民族與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加深，而義和團又爲滿清政府所利用的緣故。

義和團運動發動在山東。因為那時候山東是德國的勢力範圍，德人根據條約，着手建築膠濟鐵路，並在附近試探鑛苗。他們用賤價強買鐵路以內的土地，並擅掘墳墓，引起當地人民極大仇恨。加以外國來的傳教師，自以為來傳佈「文明」的，把中國人看做「野蠻人」，平時倚勢欺壓平民，而那些「喫教」（當時一般人稱信洋教為喫教）的洋教徒，又往往倚仗洋勢，欺侮老百姓。地方官吏因為害怕洋人，逢到老百姓和洋教徒發生爭訟，總是袒護洋教徒，不敢公平判斷。這許多仇恨累積起來，人民對於「洋人」和「洋教」真是腐心切齒。所以同治以來，民教衝突到處發生，大規模的排外運動也就醞釀成熟了。

義和拳初起時，到處設壇降神，傳習拳棒。他們所奉的神，如洪鈞老祖、關公、孫行者，黃天霸等等，都是從小說裏或戲台上去找來的。他們的組織，以八卦分團，有「乾字團」「坎字團」等名目。總頭腦是陝西人李來中；各團首領有曹福田、張德成、韓以禮等。練拳術分「清功」「混功」兩種，清功四百天練成，渾功一百天練成，練得渾功，可以避槍砲，練得清功，可以白日飛昇（就是成仙）。他們在迷信的外衣下包含着反帝的內容，反映了一般羣衆的要求，大家自然踴躍參加。人數日漸增

多，聲勢日漸浩大，他們就扯起『扶清滅洋』的旗子。把洋人和教民分爲三種：一是『大毛子』，指普通洋人，一是『二毛子』，指洋教士；一是『三毛子』，指喫教的或讀洋書的中國人，隨時隨地加以殺害。山東巡撫李秉衡痛恨洋人跋扈，對義和拳大加獎勵，因此釀成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的曹州教案（就是德國人所藉口來強佔膠州灣的），李秉衡因此革職。繼任的巡撫毓賢，對義和拳仍竭力庇護，並加以招撫，改稱義和團。於是義和團公開活動，在旗子上繡上一個『毓』字，殺教民，焚教堂。因爲法國公使的責問，清廷召毓賢入京，命袁世凱爲山東巡撫。袁世凱把當地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捕殺了，山東的拳黨一時都逃入直隸。毓賢到了京裏，在端王載漪（大阿哥的父親）大學士剛毅等面前極口稱贊義和團確有法術，忠勇可用，並把李來中介紹給載漪。載漪剛毅等大爲高興，據以轉稟那拉后。那拉后正恨各國不同情她的廢止計劃，聽到義和團有法術可以趕走洋人，自然也十分高興。毓賢因此得授山西巡撫，義和團就在直隸山西兩省活動起來。直隸總督裕祿見太后等如此信任義和團，他也相信起來了，對義和團的首領十分敬禮。義和團在直隸聲勢大盛。北京附近琉璃河、長辛店、蘆溝橋、豐臺各車站都被焚燬，鐵路電線全被破壞（因爲鐵路電線都帶有洋氣

之故)。在長辛店、保定一帶的外國人，都逃來北京。各國公使調兵自衛，並向清廷抗議。那拉后派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等借查辦爲名，把幾萬義和團招到北京來，公開設壇練術，王公親貴爭相崇信，那拉后且密召曹福田入宮，賞賜銀兩，稱之爲「義民」。時爲一九〇〇年，就是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第五節 八國聯軍與辛丑和約

義和團在北京，展開仇殺洋人的暴動。他們指光緒帝爲洋教教主，並指斥歷年主辦外交的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媚外賣國，揚言將取一龍二虎的首領。一面焚教堂，殺教士，凡家藏洋書洋畫的。都被指爲「二毛子」「三毛子」，捕殺不赦。那拉后特任命載漪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大臣，召甘肅提督董福祥帶部隊三千來京師。五月十五日（陰曆）義和團戕殺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二十日縱火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其時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所在）的洋兵，架砲嚴守巷口，如臨大敵。那拉后特傳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前後凡四次。因爲她聽信載漪的話（一說是榮祿），說各國公使向清廷要求四款，內有要求她把政權還給光緒帝的一條，大爲憤怒，決

意向各國宣戰。二十五日下了宣戰的詔書，限各國公使二十四小時內出京，並命各省招義和團助戰。各國公使因無法出京，固守東交民巷。董福祥的軍隊和數萬義和團合攻東交民巷，一直攻到七月二十日，義和團用盡了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等等所謂『法寶』，一些兒效驗都沒有，僅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克德林（Kettner），沒有把東交民巷攻破，而八國聯軍已逼京師，那拉后帶着光緒帝往西北逃難去了。

當義和團進入北京的時候，各國公使都向他們的政府告急。帝國主義者對於這樣嚴重的事變，當然不會輕易放過，英、法、日、俄、德、奧、義、美八國立刻組織聯軍，進攻中國。先是各國軍艦四十七艘，早已雲集大沽口，聯名致書守將羅榮光，限期交出砲臺，羅榮光拒絕，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榮光戰死，大沽陷落。英提督西摩爾統率各國軍隊，向北京進發，到了楊村，被阻折回。清廷宣戰令下，聯軍改由德人瓦德西爲統帥，攻占天津，由天津乘勝長驅直入，連破北倉、楊村，沿白河佔河西務、張家灣，直取通州（即北通州，今河北通縣）。通州既陷，京師大震，那拉后挾光緒帝倉皇出奔，聯軍遂陷北京。

聯軍入北京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擄掠三天，後來又借搜索『拳匪』爲名，繼續焚掠，並姦淫婦女。北京所存的古物圖書，除被毀損外，大都被作爲戰利品；搬送到他們的本國去。後來瓦德西在他所著的拳亂筆記中，對於聯軍在北京的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也都承認。他說：『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現在各國互以搶劫之事相推諉，但當時各國皆曾經徹底實行搶劫之事實，卻始終存在。』又說：『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爲數必極重大無疑。又因搶劫所發生強姦婦女之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亦屬不少。』

當聯軍攻入北京時，帝俄假保護鐵路爲名，先後攻陷齊齊哈爾、長春、遼陽，以十八萬重兵佔據東三省，並企圖進據關內鐵道，因此引起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畏懼。聯軍在英德勾結的局面之下，派重兵北駐山海關，以阻俄軍南下。那時候，英俄衝突很利害，據後來瓦德西在拳亂筆記中說：『英俄兩國因互爭直隸之勢力範圍而生之衝突已達極點，兩國皆增派軍隊赴津，英國艦隊已由揚子江口駛往大沽。』其實因分贓不均而引起的衝突，不僅英俄兩國，英德之間，英法之間，日俄之間，都有極尖銳的

衝突。美國則仍高唱門戶開放主義。以此之故，各國無法瓜分中國。爲免自相衝突起見，各國公使就會議媾和條件，準備跟清廷議和。

那拉后挾光緒帝逃出北京，奔到宣化，用光緒帝名義，下了一道罪己詔；再到大同，命慶親王奕劻回京，會同李鴻章辦理一切事宜，旋抵西安。後又授奕劻爲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謀商和議，但各國意見不一，和議一下子談不成，李鴻章病死，由王文韶繼代。到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陽曆的九月七日，和約纔簽字，這就是辛丑和約。其重要條款爲：

- 一 懲辦罪魁（當時宗室如載漪等充軍新疆，載勛等賜自盡。大臣如徐承煜等都斬決。董福祥革職。徐桐已先死，追奪官爵）。
- 二 賠款四萬五千萬兩（注三）。
- 三 分派親王大臣爲全權特使，向德日兩國謝罪。
- 四 大沽砲臺和有礙北京至海口間交通的砲臺，一律燬平。
- 五 允許各國駐兵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等處，保持北京至海口間的交通。

六 劃定公使館區域，不許中國人居住，並許各國駐兵保護。

七 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位在六部之上。

八 改訂條約，整理財政，以籌措賠款。

和議成立，聯軍陸續退出北京，義和團事變纔算告一結束。但有必須補述的：此次戰爭，東南沿海沿江各省都沒有參加。因爲戰爭起來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南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騫，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實行所謂『自保』，並以正式公文通知上海領事團，告以『無論北京如何形勢，本省內之和平秩序與外國人條約上之權利，保護不忘』，領事團也欣然承認上述數省爲『中立地』。這種割據自保，幫助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山東巡撫袁世凱，他事前既在山東省內努力保護外人，捕殺『拳匪』，後來奉旨調他的新建陸軍入都，他把所部軍隊的一部分開到直魯接境的地帶，就按兵不動了。因此，不但洋人讚賞他，李鴻章也恭維他，說『幽薊雲擾，而齊魯風澄』。李鴻章臨死時，口授于式枚草寫遺疏，保薦袁世凱繼任直督，說：『瓊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後來袁世凱果然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受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影響，各省督撫的

專權日見擴大，滿清政府的中央統治權日見削弱，外重內輕的形勢，愈來愈顯著了。第二，出賣「百日維新」的袁世凱，又一次運用他的機智和手腕，擴充了他的軍隊實力，抓到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職位（直隸總督爲軍權所寄，在各督撫中佔最重要的地位），打定了北洋軍閥的基礎。

第六節 對於維新運動與義和團的批判

李鴻章等辦洋務的失敗，證明了不從改革政治入手，在一個「壞政府」底下，要改良軍備，振興工業，是不可能的。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證明了要革新政治，非把那個專制，獨裁，貪污，腐化的「壞政府」根本推翻不可。同時也證明了凡是脫離了民衆而且根本反對民衆參加的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本身非常脆弱，是不堪反動派的一擊的。

康有爲等所代表的，是當時一部分開明地主和一部分與大工業有若干聯繫而在政治上帶有一點自由主義色彩的大資產階級，他們所進行的維新運動，建立在微弱的官僚資本的基礎之上，因此決定了這種運動只能是自上而下，脫離民衆的資產階級的改良

主義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失敗，但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上自有他的進步的意義，它不但促進了全國人民的新覺醒，而且表示了早期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對封建保守專制政權的抗爭，在客觀上幫助了革命運動的發展。正和辦洋務的結果雖沒有能夠富強中國，但在融解守舊主義的冰層這一點上自有它的歷史意義一樣。尤其是「六君子」的慷慨犧牲，發揮了中國民族志士的「臨難毋苟免」的優良傳統，對於後來無數革命先烈的慷慨犧牲，起着鼓勵與示範的作用。六君子中的譚嗣同，是一位進步的思想家，卓越的理論家，他曾勇敢地反對名教，提出「衝決網羅」的口號，並且反對滿洲君主的以天下為私產（詳可看他所著的仁學）（注四）。他在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上佔着崇高地位。

在極端專制腐敗的政府的統治之下，發生像義和團一類的農民暴動，是中國歷史上所數見不鮮的事，所不同者，這次的農民暴動，竟反為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所利用。義和團本是一種原始的反帝運動，他們只知道痛恨洋人，不知道中國之所以糟到如此地步，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應該負着大部分的責任，所以沒有能夠把反帝的鬥爭與反滿清統治的鬥爭聯絡起來，反為滿清政府所利用。然而正因為如此，倒也暴露了

滿清統治權的搖搖欲墮，它已被迫到不惜行險僥倖，要利用義和團的「法術」來維持它的統治了。

義和團運動的慘敗，是無可避免的。在八國聯軍的西洋大砲之下，流了成千成萬的最善良最勤勞的中國農民的血！然而他們的血決不是白流的。因他們的流血，揭破了所謂「文明國家」的「文明行爲」，原來就是姦淫擄掠，殺人放火！因他們的流血，使中國人民進一步瞭解滿清政府的存在將會把中華民族拖進萬劫不復的深潭，而要起來跟滿清政府清算了。所可痛心的，自從義和團失敗後，滿清政府固然完全屈膝於帝國主義而充任其剝削中國人民的代理人，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也視洋人爲天之驕子，漸漸養成了一種媚外心理，反罵義和團爲「拳匪」。這種媚外心理，直到人民解放軍大勝利後纔完全改變過來。

說義和團是野蠻的匪徒嗎？那就請你讀一讀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發生的時候，列寧在火星報上發表的中國之戰。他是這樣寫的，請你一個字一個字讀下去：

「我們試想想，中國人爲什麼反抗歐洲人？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德國人所要肅清的中國的叛亂，究竟爲什麼發生的？主戰者（帝國主義者）倡言

黃種人仇恨白種人，中國人嫉視歐洲文明。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惡歐洲人的。可是究竟爲什麼要嫉惡歐洲人，中國人所嫉惡的又是那一種歐洲人呢？中國人並不仇視歐洲人民，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中國人所仇恨的乃是歐洲的資本家和代表資本家的政府。他們矜誇西方的「文明」，在中國肆無忌憚地實行其誑騙竊盜和虐待。此等貪慾無厭的歐洲人在中國，怎能不使中國人惡呢？他們對中國開戰，爲要得到種種權利，爲要自由販賣鴉片，以昏迷中國人民。他們利用基督教的假面具，來達到其盜竊的目的。這樣，怎能不使中國人嫉惡呢？此種盜竊政策，歐洲的資產階級早已在中國實行了，而今又有俄皇專制政府參加其間。他們不過沒有公開瓜分，而像暗中的兇兒一樣；他們槍掠中國好像兇竊屍體。但是如果這個假屍起來抗拒的時候，則就立刻像對待野獸般的加以攻擊，把樹林也燒了。屠殺沒有武裝的人民，同時卻大聲疾呼要制服野蠻的中國人？

「中國的民衆所受到的痛苦，是和俄國民衆所受到的痛苦一樣的。他們從亞細亞的專制政府一直到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壓迫所作的罪惡感受到痛苦。」

這種專制政府，是從飢餓的農民榨取租稅，以武力鎮壓一切自由解放的運動的。」

列寧這一段議論，對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及義和團事件作了深刻的分析與正確的批評，正好引來作為本章的結論。天下真理只有一個，凡是站在人民方面，以正義為立場的人，對於事件的批判，總會得到同樣的結論的。

（注一）袁世勦於甲午中日戰爭發生後，由朝鮮奉召回國。乙未中日和議既成，袁以浙江溫處道留京，充督辦軍務處差委，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榮祿都賞識他，要他草擬創練新軍辦法，即於是年十月由醇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新建陸軍，保薦袁世勦督練。並請以固有的定武軍十營為基本（按：定武軍原由胡燏燾招練，分步、砲、馬及工程隊，共四千七百五十人，參用西法教練。時胡被派建築津蘆鐵路，定武軍須人接統），加募馬步各隊，湊足七千人，依袁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奉旨照准。同時又請求派遣員蔭昌挑選八旗精壯子弟附入天津武備學堂，為豫備將校之用，與袁督練陸軍相依附。定武軍本來駐在離天津七十里的新農鎮，津沽間所稱為「小站」的地方。袁受委後，依照所擬計劃進行。所用將校人員，一部分是宿將，一部分是武備學堂畢業生。如姜桂題、段祺瑞、

王如珍等皆隸麾下；馮國璋、曹錕、陸建章、王占元等，當時都屬偏裨；徐世昌也在幕中，參謀營務。這是所謂「小站練兵」和「新建陸軍」的名詞的由來。

（注二）唐才常是譚嗣同的至友。他在日本會見過孫中山，與興中會不無關係，但他始終備在立憲派一方面。他曾發起正氣會（後改名自立會），在宣言中既說「非我屬類，其心必異」，又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可見他是徘徊於革命和立憲之間的。他和他的同志林圭等早在長江上游招納會黨，庚子義和團事變起來，他以「勤王靖難」為號召，策動起義，以事洩被捕殺。

（注三）這就是所謂「庚子賠款」。總計海關銀四萬五千萬兩，分二十九年償還，實息四釐。

（注四）譚嗣同在其所著的仁學中說：「天下為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遠、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墮壞也，其人則墮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亂俗也。逞其兇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為未憂；銅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但他後來對光緒帝忽有知己之感，稱之為「聖主」，願為保皇變法而犧牲，這正表現了他思想的矛盾，他的階級及他所處的時代限制了他。

第五章 辛亥革命

第一節 列強在華的角逐和鬥爭

辛丑和約訂立後，中國更被束縛得不能動彈；而帝國主義列強間，則爲爭取在華利益而互相角逐，甚至不惜訴之戰爭。

首先是日俄兩國的衝突。義和團之亂，俄國乘機侵略東三省。辛丑和約成立後，聯軍陸續撤退，但駐滿洲的俄國軍隊卻以種種藉口，不肯撤退，並且盛傳中俄之間訂有密約，各國輿論大譁。尤其是日本與英國。日本怕滿洲和朝鮮的權利被俄國奪去，英國怕俄國的勢力過分擴張，影響到他們在遠東的地位，而且當時俄國在西藏也有所活動，更爲英國所忌。於是英日兩國聯合制俄，在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一月締結了英日同盟條約。盟約的內容爲：

兩締約國相互承認中韓之獨立，若因他國侵略行爲或因中韓兩國自起騷擾

致妨礙締約國之利益時，兩締約國得執行必要手段。

二 兩締約國之一方若與他國交戰時，他一方須嚴守中立，並阻止第三國與敵國同盟。

三 若他國與敵國同盟，與締約國之一方交戰時，則他一方即當出兵援助。

四 兩締約國無論何方，若不與他方協議，不得與第三國締結妨礙同盟國利益之條約。

條約中把中國和朝鮮等量齊觀。中國的獨立要英日兩國來加以承認，試想那時候的中國處於何等地位！但這個條約主要是對付俄國。俄國被迫，不得已，與清廷訂立的滿洲撤兵條約，規定自一九〇二年十月起，於十八個月內分三期撤退。第一期俄國是依約撤兵了。但到了第二期，不但不撤，反竭力經營旅順及朝鮮，委派東方總督處理極東事務。到了第三期，兵還是不撤，反增加守備以威脅朝鮮。急得日本屢向俄國抗議，屢和俄國談判，但都無結果。日本知道俄國並未積極備戰，就於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二月突然襲擊旅順口的俄國砲臺，並使駐在旅順口的俄國海軍遭受了嚴重損失，日俄戰爭就此揭幕了。

日俄在中國境內開戰，並且在滿清政府的老家裏，但是滿清政府有什麼辦法呢？既沒有能力制止，又不敢參加那一方面，只好說「嚴守中立」，並劃遼河以東作爲日俄兩國交戰區域。後來俄兵侵入遼西，又以溝幫子到新民府（土名新民屯）的鐵路線爲戰爭界線。

日俄戰爭繼續一年多，結果是俄國打了敗仗，旅順大連相繼失守，東洋及波羅的海艦隊均遭殲滅，但日本也已疲憊不堪，遂聽從美國的調停，會議於美國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於一九〇五年八月訂立媾和條約。這和約中與中國有關的爲：

一 俄國定期撤退在滿洲的軍隊，并放棄在滿洲的與機會均等原則不相容的一切權利。

二 日本把佔領的滿洲地方交還中國，但旅順大連不在其內，並且將該兩地的租借權讓給日本。

三 長春以南的鐵路及煤礦等都讓給日本。

四 橫貫滿洲的鐵路，俄國所管有的以工商業爲限。

從此以後，日本勢力遂由朝鮮而侵入滿洲南部，俄國也竭力經營長春以北，遂有

所謂「南滿」「北滿」的名詞。

日本既從俄國手裏攫取了南滿的一切權利，就強迫清廷訂立滿洲善後條約及附約，其中重要的條款有下面三條：

一 開鳳凰城、新民屯、遼陽、鐵嶺、通江子、法庫門、長春、吉林、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齊齊哈爾、海拉爾、愛琿、滿洲里等十六處爲商埠。

二 安東奉天之間的軍用鐵道，由日本繼續經營，改爲專運各國商品的鐵道。

三 設立中日合辦的木材公司，採伐鴨綠江右岸的森林。

一九〇六年六月，日本仿東印度公司組織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作爲在南滿洲經濟侵略的大本營。從此中日交涉不斷發生，到清朝覆滅爲止的幾年中間，重要的有安奉鐵路、間島領土權、撫順烟臺煤礦、新法鐵路、營口支線等交涉（注一）。

俄國爲補償其戰後的損失，當然也在北滿竭力經營。先是清廷的駐俄公使許景澄於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與俄國道勝銀行訂約，允許俄國在吉林黑龍江兩省境內建築鐵路，從赤塔經吉黑兩省到海參威，稱爲東清鐵路。一八九八年添築支線，由

哈爾濱南達旅順大連灣。日俄戰爭後，長春以南的鐵路割讓給日本，別稱南滿鐵路。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俄國強以哈爾濱的行政權劃歸東清鐵路公司，經英德兩國抗議，纔作罷。次年，哈爾濱俄國領事又頒佈所謂東清鐵路市制，向中外人民課稅，清廷屢向俄國交涉，結果允許東清鐵路附屬地得組織自治會，以爲行政的樞紐，糾紛纔告解決。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俄國又向清廷要求松花江全部航行權，清廷無法應付，遂於次年開放滿洲界內的松花江，允許各國自由航運，借此避免被帝俄一國所壟斷，但松花江的航權從此斷送了。

當日俄爭奪滿洲的時候，英俄在西藏也競爭甚烈。日俄開戰，英國乘機由印度侵入西藏，驅逐親俄派的達賴，進據拉薩。一九〇四年八月，班禪額爾德尼與英國締結英藏媾和條約，後因清廷提出抗議，因重訂藏印條約，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但從此西藏劃入英國的勢力範圍了。至於美國，一向高唱『門戶開放』，曾根據這個原則，於一九〇九年向各國提出通牒，主張滿洲鐵路中立，因爲英法兩國不贊同，遂無結果。以後美國根據『門戶開放』原則，與各國平分在中國經濟勢力和政治地位。

第二節 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及其影響

辛丑和約訂立後，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國作大規模的經濟侵略。侵略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除借款給滿清政府作政治上的投資外，紛紛在中國設立紡織、麵粉、烟草等工廠，開採煤鐵礦，建築鐵路，發展航業，開設銀行。

主要是鐵路的建築。帝國主義列強爲了要控制每一個勢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爲了要便利輸入商品，輸出原料及運輸軍隊，直接投資在中國建築鐵路，或借錢給滿清政府而指定以某條鐵路作抵。當時如東清路（後稱中東路），是俄國所直接投資經營的；膠濟路是德國所直接投資經營的；滇越路是法國所直接投資經營的。而由中國向外國借款建築，把鐵路作抵的，有京漢路（英法日）、京奉路、滬寧路、滬杭路、廣九路（以上均英國）、津浦路（英法）、吉長路（日本）等。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鐵路，當然完全由他們管理。借款建築的鐵路，一切重要職權也大部分操縱在外國人手裏。在辛亥革命以前，滿清政府的鐵路借款已達十五萬萬圓（其中有移作他用的）。帝國主義者在借款本身上已獲得很多利潤（通常借款不是十足收到的，例如一百圓實

收九十圓，但利息則按一百圓計算），又在代購建築鐵路材料中賺到很多的錢（往往在借款的條約中訂明建築鐵路材料即由債權國代購）。不但如此，列強取得了鐵路建築權，往往同時又取得了鐵路沿線的鑛山開採權；也有因為要取得鑛山開採權，而要求在鑛山附近建築鐵路的。

帝國主義列強先後在我國取得內河航行權，就設立了許多輪船公司，像英商有怡和、太古，日商有日清、大連，德商有美最時、禪臣等。我國自己的輪船公司只有招商局、大連、寧紹、政記等數家，合起來的噸數，還不及英商太古一家。

帝國主義者又在我國開設銀行，例如英國有匯豐、麥加利、有利銀行，美國有花旗銀行，俄國有華俄道勝銀行，法國有東方匯理銀行，德國有德華銀行，日本有正金、台灣銀行，比國有華比銀行，荷蘭有荷蘭銀行。而我國自己開設的銀行，在辛亥革命前，只有大清銀行（辛亥以後改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及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四明商業銀行、廣東銀行等大小數家而已；資本從幾十萬兩到二百萬兩，當然萬萬比不上外國銀行那樣雄厚。當時帝國主義者無論對我國有什麼借款，都經過他們自己的銀行。這些銀行保留有中國關稅的收入，從中國的軍閥官

僚方面吸收存款，同時也發行鈔票，利用金銀比價的變動，進行各種投機事業，壟斷對外貿易與匯兌。更經過錢莊、當舖與各種經紀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用很高的利息貸款給中國人民，用最低的代價收買農產品。

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多種各樣的經濟侵略方式來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倒也刺戟了中國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他們多願意投資工業，使中國得到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自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到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的五年中間，上海、無錫、寧波等地，陸續興辦了一些紡織廠，資本從一百多萬到幾十萬不等。上海漢口等地，新開了幾家麵粉廠，資本從二十餘萬到十來萬不等。此外如中興煤礦公司，漢冶萍公司，揚子機器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及雲南的錫務公司，東三省的一些火柴廠，都是在這一時期興辦的。

中國的新興工業雖然基礎十分脆弱，總是資本主義的開始發展。但「帝國主義是到處企圖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的」，因之，當時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都要求維持現狀，維持舊有生產關係，不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另一方面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資產階級，華僑，知識分子，新官僚，都要求打

破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舊有生產關係，也就是要求推翻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與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

第三節 滿清政府的所謂「預備立憲」

戊戌政變後，康（有爲）梁（啓超）亡命海外，組織「保皇會」，繼續宣傳君主立憲。康的思想議論始終沒有什麼改變，老是通三統，張三世，公羊孟子，保教尊孔那麼一套。梁啓超可早已丟了公羊孟子而大捧盧梭孟德斯鳩了；不談保教尊孔，而說「保教非所以尊孔」了。因之，事實上梁已取康的地位而代之，成爲立憲派的領袖了。

梁啓超在日本辦的刊物，前後有三個名稱：從一八九八年（戊戌）十月到一九〇一年叫清議報，一九〇二年以後叫新民叢報，一九一〇年以後叫國風報。這種報（其實是雜誌）雖然在日本出版，但暢銷於中國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因爲梁氏雖然開口「皇上」，閉口「聖主」，但主張要打破現狀，正合時代要求。其次，庚子亂後，清廷曾下詔發八股攻策論，梁啓超寫的文章正好是從八股中解放出來的策論體，加以

感情奔放，一瀉千里，讀起來非常激動；當時一般預備應考的士子們，讀清議報或新民叢報，正是一種最好的揣摩工具，於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影響。所以過去一般比較頑固的讀書人，罵康梁離經叛道，到那時候已認立憲爲天經地義了。

日俄戰爭的結果，一些新官僚和士大夫們，認爲日本以立憲而勝，俄國以專制而敗。例如張謇（他是一個狀元，爲翁同龢所賞識，在當時是新黨名士）在日俄和議尙未成功的時候，寫信慫恿袁世凱，要他主張立憲，說：『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衆立憲，尙可倖乎？』據說袁世凱讀了頗受感動。當時駐外公使如孫寶琦，疆吏如張之洞，都曾向清廷建議立憲；而國內南部的老新黨名士受了梁啓超的言論影響，紛紛贊成立憲派的主張，一時要求立憲成爲最有力的輿論。

那拉后在挾了光緒帝狼狽西奔的時候，頗覺得慚愧，常常對她的侍臣說：『我想不到被皇帝所笑！』那時候，她常常假光緒帝一點辭色，有時也跟他商量商量事情。庚子年的十二月，曾下過變法的詔書，辛丑年三月又命設立『督辦政務處』，算是籌辦新政的機關。從辛丑到乙巳（一九〇一——一九〇五）的五年中間，陸續辦了一點

所謂「新政」，如廢科舉，設學校，派留學生等等。但這些都不過是一個「騙局」而已。抱定「寧贈夷狄，不與家奴」的宗旨的那拉后，怎會有誠意革新政局！辛丑和約訂立後，中國的主權贈給「夷狄」也贈得差不多了，她現在正好和「夷狄」聯盟來共同對付「家奴」（人民）。但是，她也看到大勢所趨，人民的力量似乎也不可輕視，於是「騙」之外再想出一個「拖」的方法來。她彷彿說：你們都說立憲可以強國，那麼，好，讓我來預備罷。正像孟子裏說的：「今茲未能，請輕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那拉后的所謂預備立憲的第一個步驟是派大臣出洋赴各國考察憲政。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清廷派戴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最初派戴澤、戴鴻慈、徐世昌、方、紹英，後來吳樾在北京正陽門丟了一個炸彈，徐世昌、紹英嚇得不敢去了，便改派尙其亨、李盛鐸）。次年夏間五大臣從外國「走馬看花」地「考察」了回來，一致呈請立憲，就由御前會議決定，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先從改革官制入手。同年陰曆九月下了一道釐定官制的上諭，把中央官制略為更改一下（例如戶部改為度支部，兵部改為陸軍部，刑部改為法部，理藩院改為理藩部，工部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增設郵傳部等等），名義上說是以後「各部堂官均設尙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漢滿」

(以前六部堂官滿漢平列，滿三漢三)，而實際上新授各官的配置，是滿七漢四，外加蒙古一人，漢軍旗一人。原來是借改革官制爲名，而實行排斥漢人！到了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又發佈一種所謂外官制（無甚重要，不詳述），並將權勢最大的督撫調入中央（袁世凱、張之洞於是年七月同時調入軍機處），表面上是以中樞的機要大權昇與漢員，表示不分滿漢，實際是先去掉最有權勢的督撫，漸次削減各督撫的實權。總之，滿清政府藉口預備仿行憲政而改革官制，實際是勵行中央集權，而且把權集中到滿洲親貴手裏。

但是，滿清政府既然提出了「預備仿行憲政」的諾言，立憲運動的高潮就起來了。梁啟超於一九〇七年的夏間，與蔣智由陳景仁等在日本組織政聞社，發表宣言，提出四大政綱：（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釐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政聞社成立後，社員分赴國內外活動。是年九月，有華僑聯名請願，要求實行立憲的事。又有湖南人熊範輿等聯名請願，要求設立民選議院的事。而各大都會常有學生開會，作政治演說，慢慢連北京也有開會演說的事了：這些大都是政聞社活動的結

果。滿清政府採取高壓手段，下諭禁止學生干預政治，又嚴禁京師開會演說。後來政聞社在國內公開出來，滿清政府就在一九〇八年夏間下令將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革職看管，又嚴諭各省督撫查禁政聞社，將該社社員一律嚴加緝捕，毋任漏網。但是，當時國內類似政聞社的組織可不少：在江浙一帶，有預備立憲公會，湖北有憲政籌備會，湖南有憲政公會，廣東有自治會。其中以預備立憲公會為最活動，會中重要人物有朱福詵、張謇、湯壽潛等，會員大都是江浙閩三省名士及實業界有地位的人物。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夏，由該會發起，邀各省社團於七月間派代表齊集北京，請願速開國會。滿清政府對於政聞社，可以藉口與康梁有關係，用嚴厲手段對付，但對於這些請願的人士，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相當有地位，有名望，未便十分壓迫。那時候各省諮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都已頒行了。清廷正像煞有介事地在預備立憲；而革命的暴動，則自一九〇六年以來，屢仆屢起（詳下節），使清廷感到極大的威脅，恰好憲政編查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時候，曾特設考察政治館，後來改為憲政編查館）已將所擬訂的憲法大綱、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進呈，遂於是年八月二十七日（陰曆）將這些法案公佈，並限於第九年

籌備完竣。

所謂『憲法大綱』共二十三條，關於君上大權者十四條，關於臣民權利義務者九條，完全從日本憲法上鈔來，但祇鈔了關於天皇大權的一部分，對於限制天皇大權的條文，一條都沒有鈔過來。這是那拉后拿來『騙』人民的。至於限期九年預備完竣，那是一種『拖』的方法。那時候那拉后已經七十四歲了，她想，再拖九年，她未必還在人世，那麼即使九年後真的立憲罷，總算在她手裏始終沒有把大權『給家奴』。

那拉后真的不再活下去，她於欽定憲法頒佈後兩月就『駕崩』了。光緒帝比她早一天『駕崩』，這當然是一樁疑案，但我們不值得去研究它。光緒帝死後，醇親王載灃（光緒的弟弟）的兒子溥儀嗣位，由載灃監國攝政。次年改元宣統。載灃是承受那拉后衣鉢的，他懂得『騙』和『拖』，也懂得皇族集權。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二月，清廷特下諭旨，宣示決行憲政之意；十月各省諮議局成立；次年九月資政院成立，十月派載澤爲纂擬憲法大臣。在這兩年之內，陝甘總督升允爲奏阻立憲而開缺；甘肅布政使毛慶蕃因玩誤憲政的籌備而革職。這都是載灃的絕妙『騙』法。他在辛丑年曾以頤等專使派赴德國謝罪，見德國政權集中於皇室，便向威廉亨利請教，亨利教

他第一要拿到兵權。他把這話牢記在心，做了攝政王的第一樁事情，就是把握有兵權的袁世凱開缺，自己以監國攝政王代行大元帥，親統禁衛軍；並派他的兩個弟弟：載灃做軍諮大臣（等於參謀總長），載洵辦海軍。這樣，總算把軍權抓住了。

但在另一方面，各省諮議局成立，立憲派有了法定的集合機關，更容易公開活動。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發起聯合各省諮議局，各派代表，在上海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約定須俟國會正式成立，始行解散。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正月，各代表齊集北京，由孫洪伊領銜，向清廷請願，要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清廷不許。是年二月革命黨汪兆銘行刺載灃未果，各省諮議局代表又聯合各省政團商會及海外僑商，各舉代表，組織「國會請願代表團」，向清廷作第二次請願。又奉諭旨「不准」。九月資政院成立，請願代表團又向資政院上書，請提議設立責任內閣，召開國會，資政院居然提出了，並經議決通過，正式向清廷請求。各省督撫或受諮議局的要索，或因中央想削滅他們的實權而感到威脅，也希望中央有真正的責任內閣出現，也聯電軍機處，主張從速成立內閣，召開國會。滿清政府看情勢如此，覺得非敷衍一番不可了，就在那年十月初下詔將所謂預備立憲的期限從九年縮短為五年，定宣統五

年召開國會，在國會未開以前，先將官制釐訂，成立內閣。這諭旨下後，請願同志會中的預備立憲公會派，以爲有了相當的結果，躊躇滿志，不再進行活動，但其他各派堅決主張應立即召集國會，仍在北京活動，預備作第四次的請願。這樣，滿清政府可就不客氣了：把東三省來的請願代表解回原籍；並命各省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又逮捕溫世霖，遣戍新疆，因爲他在天津原籍組織請願的緣故。從此請願開國會的風浪就平靜下去了。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三月，滿清政府算是實踐諾言，頒佈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了。這是一個非驢非馬的內閣：總理大臣之下，又設兩個協理大臣；而十三個大臣之中，漢人只有四個，滿人八個（其中皇族佔五個），蒙古旗人一個。這樣的改組政府，顯然沒有誠意，不過借此來實現皇族集權而已。是年六月，立憲派以「諮議局聯合會」名義，請都察院代奏，認爲「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清廷的答復是：「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妄行干涉！」時局發展到了這種地步，滿清政府的「騙」和「拖」的種種手段已經玩盡了，最後不得不露出它的頑固而兇惡的本相來。立憲派固然知道「請願」已失掉作用，就是

許多舊軍閥、舊官僚也已感到清祚之不永，開始尋求自己的出路了。那時候，南方的革命火焰雖暫被撲滅（指黃花崗之役，詳下第五節），而川省的爭路風潮（詳下第六節）正鬧得如火如荼，大家知道革命已無可避免，再沒有人幹上書請願的蠢事，一時立憲運動倒反沈寂起來了。這是暴風之前的暫時的沈寂——萬木無聲待雨來。

第四節 反滿勢力的大結合

當康有為大談「公羊三世」，上書請變法的時候，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孫中山和康有為同是廣東人。廣東是和西方文化接觸最早的地方；廣東人所受外來的刺戟最利害。但兩個人的出身不同：康有為是所謂「書香人家」的子弟，孫中山出身富農家庭。兩人所受的教育也不同：康有為讀的是聖經賢傳；孫中山讀的是教會學校，學的是醫。因此兩人同抱救國宏願，但所走的方向，所採的方法不同：一個主張改良，一個鼓吹革命；一個要保全滿清皇朝，一個則「自己西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行醫為入世之媒」（孫中山的話）。

興中會創立於甲午戰爭的那一年，距『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快十年了，但沒有提出『傾覆清廷』的口號，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僅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爲號召。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活動的對象是海外華僑。次年在香港成立分會，其宣言中仍祇說『講求富強之學，振興中華』。但那年因對日戰爭失敗，人心憤激，孫中山就與同志計劃在廣州乘機起事，以運送軍械不慎，被海關截獲，事遂失敗，同志陸浩東死難。就在這一年，孫中山在倫敦被中國駐英公使館所誘捕，預備解歸本國，後得外人援救，纔得脫險。從此他徧歷歐洲各國，於政治制度之外，兼考察各國的經濟組織。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爲擴大興中會組織，他由歐洲赴日本，命陳少白在香港創辦鼓吹革命的報紙，命史堅如到內地聯絡會黨。庚子義和團之變，他曾圖謀在廣東乘機起義，已約定三合會領袖鄧士良在惠州發動，不幸又遭失敗。但從此全國都知道有革命黨領袖孫文，三合會等會黨也被人注意起來。下一年辛丑和約訂立，國人受了重大刺戟，表同情於革命運動的日漸增多了。

我們所說的『會黨』，是指當時下層社會的一種秘密組織，其中以三合會、哥老會最著名。三合會跟太平天國發生過關係，它的支派『匕首黨』在上海作過大規模的

暴動（均見第二章）。他們最初活動的根據地是廣東福建一帶，因受官府的壓迫，多數會衆逃往海外，海峽殖民地是三合會最佔勢力的地方。他們標榜『反清復明』及『疾病相扶助』『貧困相救濟』。其勢力從菲律賓以至暹羅、印度、澳洲、太平洋沿岸，在華僑中發展甚速。哥老會和三合會都是『洪門』的系統，他們的活動地帶是長江流域。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藩大裁湘軍，被裁的官兵相率加入哥老會，在營官兵也有秘密加入的，哥老會的聲勢因之大盛。三合會和哥老會的組織，以城市貧民與流氓無產階級爲中堅，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羣衆參加。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只有一種朦朧的民族觀念。他們要『反清復明』，也就是排滿。所以一經秘密聯絡之後，三合會和哥老會就跟革命黨結合起來了。

代表着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開明地主而以知識分子作領導的反滿政團，則有黃興等所領導的華興會和章炳麟蔡元培等所領導的光復會。

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他是兩湖書院的高才生，以官費留學日本。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春間，他和同鄉黃篤生等發起組織華興會，湖南籍留日學生大都加入。華興會的宗旨是復興中華，也就是推翻滿清。那年九月間（陰曆），黃興等曾在

湖南策劃，想乘那拉后萬壽節日，分別在長沙等處起義，哥老會會員加入的已近十萬人，聲勢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但以事機洩露，沒有成功。黃興和他的同志宋教仁（字漁父，湖南桃源人）等亡命日本，一時在留日學界中大露頭角。他們出版一種雜誌，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

章炳麟（字太炎）、蔡元培（字子民）都是浙江人，又都是學者。章炳麟不應科舉試，所以沒有什麼「功名」，但他是樸學大師，又是浙東學派的繼承者。蔡元培是一個進士，但他能接受新思想新學說，比較張謇之流要進步得多。清代學術本分兩大派，一派承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的系統，着重在經世致用，而種族思想特別濃厚；由黃宗羲所開創的浙東學派，根據歷史鼓吹民族主義，有極大的影響。另一派就是「今文學派」，高談孔門微言大義，發展到廖平、康有為而極盛。他們主張託古改制，提倡變法維新；然而當他們看到滿清政府已到衰敗不可挽救的時候，反而來高呼「保皇」。這兩派學術的發展結果，一主張反滿，傾向革命，一主張保皇，傾向改良。庚子義和團起來時，章炳麟在上海張園參加「國會」（這是在滬各省的革命及維新志士所組織的一種集會），嘗把辮子剪去，表示與滿清決絕。章氏又和蔡元培等發起

中國教育會（一九〇二年），後來擴大為愛國學社。從此愛國學社成為革命思想的匯集所，張園是公開演說反對滿清的場所，而湖南人陳範所辦的蘇報，是一個反滿的宣傳刊物。四川人鄒容曾撰革命軍一書，章炳麟替他作序；章氏本人又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激烈文字，稱光緒帝為『載活小醜』。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遂有『蘇報案』的發生，章炳麟和鄒容都被上海會審公廨判處徒刑（章於一九〇六年出獄，鄒庚死獄中），蘇報被封，愛國學社被解散，蔡元培等皆出國。然而那時候上海出版鼓吹革命的刊物很多，從一九〇三年起的兩三年之間，不下數百十種。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月間，孫中山又從歐洲回日本，與黃興等晤面，商討組織革命黨問題。孫中山在比利時與賀之才等籌組革命黨，並開第一次會，加盟者須親書誓詞，加蓋指印。其誓詞式樣是這樣的：

具願書人	× × ×	當天發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
權矢信矢	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 × × ×	押（指印）
		主盟孫文

誓畢，孫中山與到會各人以次握手道喜，說：「各位已不是清朝人了。」孫中山也寫一張同樣的誓詞，交給他們保存。這是一九〇三年的事情，當時加盟者三十餘人。第二次在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第三次在巴黎，加盟者十餘人。當時只稱「革命黨」，並未確定同盟會的名稱。孫中山與黃興等商討結果，認為過去「此一省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不是辦法，「總以互相聯絡爲要」（據宋教仁日記）。遂於是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赤坂區日人坂本金彌宅開「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發佈會章，公推孫中山爲總理。是日到會者數百人，包括華興會光復會的人物，除甘肅一省外，其餘十七省的人都有。所定的黨綱爲：一，推翻滿清政府；二，建設共和國；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四，主張土地國有；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助中國革命事業。從此革命黨有明確的政綱，有正規的組織，有經常的工作，有紀律的領導，並且包羅了其他黨派，形成革命力量的集中。一方面聯絡會黨，運動新軍，使反滿勢力集中在中國同盟會旗幟之下而迅速地展開。

第五節 辛亥革命前各地的起義

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後，在東京出版民報，作為該會的會刊，正式提出「三民主義」，公開宣傳。當時立憲派的新民叢報由蔡啓超主筆，與民報大開筆戰。章炳麟出獄後，也加入民報當主筆，他正好是康有為的敵手，根據他的「古文家」的立場，對「今文家」康有為的理論，攻擊得體無完膚。一方面因清廷的欺騙政策漸漸揭穿，立憲派的主張為一般人所厭惡，民報就更起作用。同盟會成立後，派員回國，赴各地積極活動，聯絡會黨，運動軍隊。從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到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國內就有不斷的革命事變發生：

（一）萍瀏之役（一九〇六年）發生於湘贛接壤的萍鄉、醴陵、瀏陽等縣。這一年正鬧饑荒，該處會黨頭目李金其、蕭克昌等受同盟會會員蔡紹南、劉道一等的宣傳影響，就與蔡等接洽，乘機運動萍鄉鑛工，聯合附近各處的同黨，計劃起事，擬分三路：一由瀏陽進窺長沙，一以萍鄉、安源鑛路為根據地，一由萬載東出瑞州、南昌以達長江。但以事機不密，先期洩露，瀏陽一部分先於十月十九日（陰曆，下同）發難，佔領麻石、金剛頭等處。萍鄉的一部分，因鑛工參加響應，佔領高家台、上栗市、桐木，進入宜春的慈化等處。湘贛交界各地紛紛響應，來至數萬，長江下游為之

震動。鄂、贛、湘等省將撫闖耗，調集重兵圍攻，革命軍終歸失敗。

(二) 黃岡之役 (一九〇七年) 廣東潮州饒平縣的黃岡會黨，本來和革命黨有聯絡，孫中山派人運動他們，謀劫黃岡協署軍械起事。四月十一日會衆圍攻協署，殺清吏數人。又攻克寨城。但不久被潮州鎮兵所擊潰。

(三) 惠州七女湖之役 (一九〇七年) 是年鄧子瑜奉孫中山命，於四月二十二日在距惠州二十里之七女湖起義，歸善、博羅、龍門等處會黨紛起響應，惠州大震。旋以彈械不繼，先後被清軍擊潰。

(四) 安慶徐錫麟之役 (一九〇七年) 浙江山陰人徐錫麟和他的同志陶成章、秋瑾 (女)、陳伯平、馬宗漢等，都是光復會的重要人物。徐曾留學日本，學警察，歸國後，在安徽任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堂長，爲巡撫恩銘所賞識。他素來是反對滿清政府的，便暗中佈置同黨，圖謀在安徽起義。陶成章在浙江聯絡武義、永康、東陽等地的會黨。秋瑾任紹興大通學堂堂長，與王金發等聯絡紹興、嵊縣、仙居等處會黨，編練光復軍，與徐有聯絡。忽有黨員在長江下游某處被捕，名冊被搜去，江督知道有革命黨在安徽圖謀起事，電告恩銘防範，恩銘命徐錫麟密查，徐恐事洩，就提前

發動，於五月二十六日乘巡警學堂行畢業禮時，邀請皖省大吏來校觀禮，預備把他們一網打盡，然後集合軍警起事。但結果僅刺殺恩銘，其餘都逃散了。徐錫麟率領學生，佔據軍械庫，被防營兵所圍，陳伯平戰死，馬宗漢與徐皆被擒，遇害。事後浙撫張曾敷捕徐之同黨秋瑾，殺之於紹興縣的軒亭口。秋瑾能做詩，有『秋風秋雨愁殺人』之句，後人替她在杭州西湖建『風雨亭』以留紀念。

(五) 欽廉防城之役（一九〇七年）先是廉州三那地方有劉恩裕所統率的『萬人會』，抗納糧捐，欽州的張得清亦聚眾與三那會黨聯合，官方派郭人漳、趙聲兩人各統所部新軍往剿，趙聲已加入革命黨，郭和黃興熟識，孫中山與胡毅生面勸郭趙倒戈，他們答應只要有真正的革命軍起來，一定響應。孫中山便派人往約欽廉抗捐的會黨及各屬團紳，作一致行動。遂於十四日在欽州之王光山起義。進攻防城。各鄉民衆携械來加入的有一萬多人，聲勢甚盛。不料東京同盟會本部因為購運的軍械受到阻碍，未能如期到達。黨軍乃轉道逼欽州，希望郭趙等響應，但郭趙等見革命軍軍力薄弱，都不敢動。清吏調大軍進剿，革命軍戰敗，黨衆退入十萬大山。

(六) 鎮南關之役（一九〇七年）欽廉失敗後，孫中山和黃興、胡漢民及安南

同志百餘人，改由安南謀窺廣西。鎮南關附近有一羣遊勇的集團，勇敢異常，孫中山派人聯絡，作爲攻取鎮南關的先鋒隊，於十月十三晚上，突攻鎮南關，奪取鎮南、鎮東、鎮北三砲臺，擬約集以前退入十萬大山的黨衆，會攻龍州。但十萬大山的黨衆因路遠不能趕到。孫中山與黃興親領百餘人據守砲臺，與陸榮廷、龍濟光所統的清軍激戰七晝夜，終以衆寡不敵，退入安南。

(七) 河口之役(一九〇八年) 孫中山退入安南後，法政府應滿清政府的請求，強迫他離開安南。他離開安南後，命黃興再入欽廉，集合該地同志；一面命黃明堂謀攻河口，以便進攻雲南。後來黃興率領二百餘人退出安南，在欽廉間活動，然終以無援退出。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三月，黃明堂進攻河口，清邊防督辦被殺，收得一部分投降的士兵。不久黃興到了河口，與黃明堂等力抗清軍。以衆寡不敵，河口失守，黃等率殘部六百餘人退入安南。後來安南政府把他們送到新加坡。

(八) 安慶熊成基之役(一九〇八年) 徐錫麟的同志熊成基，是光復會的會員(章炳麟祭熊成基文說：君實伯孫——徐錫麟字——之死友，而與炳麟枝幹相維者也)，當安徽新軍砲臺營的隊官。是年秋間，湖北及南洋(蘇、皖、贛)的新軍定期

在安徽太湖會操。熊黨本想趁秋操起義，剛好光緒帝和那拉后同時暴死，謠言紛起，大家以為將有大事變到來，因之各省防備革命黨愈加嚴密，熊成基怕被發覺，就於十月二十六日（那拉后死後第四天）率安慶城外的砲臺營聯合馬隊起事。皖撫聞變，急忙關閉城門，一面電調秋操軍隊和長江水師來援。熊攻安慶城不下，退走廬州，潰散（熊成基後來逃到哈爾濱，謀刺載洵被捕，在吉林遇害）。

（九）廣州新軍之役（一九一〇年）同盟會在廣東運動新軍本已成熟，原定正月某日起事。新軍中有兵士數人，因細故和巡警口角，釀成大風波，不可遏制，革命黨員倪映典就在正月初二日倉卒入營指揮，率領新軍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被敵截擊，倪映典中彈死，餘衆潰散。

這一次的失敗，給同盟會的打擊很大，因為他們費了一年多的經營，結果只是『曇花一現』。事後孫中山邀黃興、胡漢民、趙聲等到檳榔嶼商議『捲土重來』的計劃，同志們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經孫中山的鼓勵，並向華僑募得五六萬元，決定再圖大舉，因此而有：

（十）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孫中山與黨同志計議定

後，便分頭進行。黃興與胡漢民先後返香港，在香港組織統籌部，舉黃興爲統籌部部長，趙聲爲副部長，胡漢民等各負一部分責任，陸續在廣州設秘密機關三十幾處，但相互間沒有聯繫。因爲以前屢次失敗，每每爲了一個機關被破獲了就牽動全局，所以這次特別保守秘密，由各部分主持人負責，大家不相問，亦不相告。不久長江各省的秘密聯絡已近成熟，廣州方面的新軍、防營、警察、民軍以及革命黨所組織的先鋒隊，都已有相當的準備。原定三月十五日起事，不料等候軍械等到三月二十日以後，而粵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準已把他們的秘密探出。是月十日溫生才刺殺孚琦，城中戒嚴，並搜索黨人。黃興於三月二十五日潛入廣州，次日就有機關和黨員被破獲，於是大家議決下展期舉事的命令。但到二十八日忽據報告，說粵督調來的防營就是革命黨的同黨，便又下令二十九日舉事。到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黃興率領先鋒隊約百人攔攻督署，張鳴岐倉皇逃到水師行臺。黃率所部分途轉攻他所，途遇溫帶雄所率防營軍數百人，溫早已和革命黨人有聯絡，並已接到五時半往攻水師行臺的命令，他又得到李準的命令，叫他入城防攻黨人，他很高興，率隊出發，怕在路上有什麼阻碍，預備到水師行臺後纔換革命黨的白布臂章，不料因革命黨事前過於秘密，大家不接頭，

黃興等見他們沒有臂章，不知道是同黨，開槍擊斃溫帶雄，雙方開起火來。又因爲幾次變更命令，原定的十路，只有四路同時發動，所以抵敵不住清兵的攻擊，完全失敗了。黃興受傷，展轉逃到了香港。這一役，革命黨犧牲的很多，尋出屍體的有七十二人，合葬黃花岡，就是所謂『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其實死難者不止七十二人）。

以上各次起義，大都由同盟會領導；只有徐錫麟、熊成基的先後在安徽起義，與同盟會無關，孫中山所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此外如謝持等謀在成都等處舉事，熊克武等謀在鈺州舉事（均在一九〇七年），都未成功。而汪兆銘（精衛）自一九〇七年鎮南關之役失敗後，就不耐煩幹艱苦的革命工作，主張用暗殺手段。黃興、胡漢民等反對他的主張，他堅持己見，不顧一切，密約黃復生、喻紀雲、陳璧君等赴北京，圖謀暗殺攝政王載灃，於一九一一年二月事洩被捕，監禁在北京。

這些革命活動，參加者的熱情及其犧牲精神，是可泣可歌的，但他們所採取的方法可不足爲訓。他們大都不是依靠羣衆來進行革命活動，不耐煩在羣衆中作深入的工作，不把自己的行動置基在廣大的羣衆之中，而是依靠了少數人的軍事冒險及恐怖暗

殺，希望以便宜的單純的革命冒險來推翻滿清政府。他們的鮮血固然流得很光榮，但他們的失敗是決不可避免的：這是個慘痛的歷史教訓。

第六節 辛亥革命的經過

自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銷商品爭購原料以來，就有買辦階級應運而生。後來帝國主義者採對華投資政策，那些買辦又可乘機取得外債回扣，以飽私囊，就高唱『利用外資，開發實業』，以款動皇族內閣裏的那些貪婪昏庸的親貴。在滿清末年，買辦階級很活躍，代表人物是盛宣懷。他以路鑛起家，他辦路鑛，完全靠『外資』。那時候他做郵傳部大臣，想靠鐵路借款來飽私囊，固權位，於是迎合皇族內閣集權的心理，提出鐵道國有政策，經清廷於辛亥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諭宣佈。四月二十二日盛宣懷就和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川漢、粵漢鐵路借款六百萬鎊（六千萬圓）。

那時候 滿清政府借了『利用外資』和『鐵路國有』的名義，大借外債，把路權送給帝國主義者，事實上是一種貪污賣國的行爲。而況粵漢鐵路會由美商合興公司承

辦（事實上是由盛宣懷私售與合興公司的），後因該公司違約，人民力爭收回，已批准由商民集股自辦；川漢路也經批准商辦；粵省早已修築，川省宜萬段亦已開工。現在忽然要取消商辦案，以國有名義把權利送給外人，當地的人民如何不起來反對？於是湘粵川鄂各省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以各省諮議局爲開會反對的大本營，一面派代表進京交涉，並電請各省軍官援助。當時四川人尤爲激昂，經保路同志會的領導，發出『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的兩個口號，並議決罷市抗爭。商民每家都供着光緒帝的牌位，舉哀號哭（因爲川漢鐵路的准歸商辦是光緒帝在位時實現的，所以要供牌位哭他。上面的兩個口號也是從光緒帝的詔書裏摘下來的。由此可知這個運動開始並不含革命的意味）。川督趙爾豐起初也幫四川人說話，可是受到清廷的嚴旨申斥後，他便換一副臉孔，把鐵路股東代表拘禁起來，市民相率至署請求釋放，被衛兵開槍，死傷數十人，事後報告清廷，說川人借爭路爲名，希圖獨立。盛宣懷呢，他強硬得很，他有帝國主義做靠山，有皇族內閣作後盾，居然使清廷對各省的反抗集會下『格殺勿論』之諭。在京的四川代表，也被押解回籍。事情愈鬧愈嚴重，四川的新津縣發生了暴動，城市被佔領，各縣的同志軍又聞風興起。於是清廷調湖北

新軍入川平亂。湖北新軍的下級官兵，本來多傾向革命，湖廣總督瑞澂怕他們乘機搗亂，用調虎離山之計，把新軍中最富於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交川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調遣，並秘密與某國領事相約，請調軍艦入武漢，以資鎮壓。但他那裏料得到武漢的軍隊調空了，反給革命軍以起義的機會！

原來兩湖自萍醴之役失敗後，又產生了一些革命團體，先有共進會，以焦達豐、孫武、居正等爲領袖，後有武昌的文學社，以蔣翊武爲領袖。文學社和共進會的會員大都是同盟會的同志，但他們的組織和行動並不直接受同盟會指導。文學社和共進會的秘密活動，起初並不統一，後得湖南革命老前輩譚人鳳調和其間，漸歸一致。譚人鳳和宋教仁秘密往來於滬漢間，與孫武、居正等籌商進行方法，於是文學社與共進會事實上成爲「同盟會中部總部」的分機關（這時候，上海方面由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等主持，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聯絡各省，統籌辦法）。到了辛亥年七月之交，因爭路風潮激烈，全國汹汹，大有弦滿欲發之勢，武漢方面的同志，急欲發動。同盟會本擬派黃興等赴鄂主持，但鄂督瑞澂已探得革命黨將要發難的消息，武漢水陸各要地都特別戒嚴。革命黨起義的日期，原定中秋節，後以準備未充分，改爲

二十五日。不料十八日午後，蟄伏在法租界寶善里的黨人，因製炸藥失慎爆炸（孫武受傷），因此有許多黨人機關被軍警搜捕，並搜去黨員名冊。軍隊中的黨員，按名逮捕，人人自危，首由工營左隊的熊秉坤倡議立刻發動，就於十九日（陽曆是十月十日）午後九時，集合軍中同志，猛撲楚望臺，佔領軍械局；輜重營由城外衝入，會攻督署。瑞徵和新軍統制張彪，本來聽見「革命黨」就害怕的，事前防範既未得法，一聞砲聲，都倉皇棄城逃走，武昌全城遂為革命軍佔領。

新軍佔領武昌後，急於要找一個首領，但那時候黃興未到，孫武受傷，居正赴滬未返，一時找不出人來。他們因為新軍二十一混成旅協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為人謹厚，便強迫他出來當中華民國軍政府革命軍鄂軍都督（注二）。黎氏本非革命黨人而做了都督，於是立憲派的湯化龍（時為諮議局議長）也出任軍政府的民政部長了。

軍政府成立後，出佈告改用黃帝紀元（是年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不久革命軍攻下漢陽、漢口，完全佔領武漢三鎮。各國領事團得到軍政府的照會，申明滿清政府對外訂立的條約繼續有效，也就宣告嚴守中立。於是革命軍聲勢大振，各省紛

紛響應，宣告獨立：

九月初一日（陽曆十月二十二日），湖南獨立，焦達豐爲都督（焦不久被害，

由譚延闓任都督）。

同日，陝西獨立，張鳳翽爲都督。

初二日（十月二十三日），江西九江獨立，馬毓寶爲都督。

初八日（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獨立，閻錫山爲都督。

初十日（十月三十一日），雲南獨立，蔡鍔爲都督。

同日，江西南昌獨立，吳介璋爲都督。

同日，安徽江北各處紛紛獨立（安徽獨立，經過事變甚多：安慶於十八日纔宣告獨立，滿清巡撫朱家寶爲都督，旋即被逐，孫毓筠、柏文蔚相繼任都督）。

十三日（十一月三日）江蘇的上海獨立，陳其美爲都督。

十四日（十一月四日），貴州獨立，楊蔭誠爲都督。

十五日（十一月五日），江蘇的蘇州獨立，滿清巡撫陳德全爲都督。

同日，浙江獨立，湯壽潛爲都督。

十七日（十一月七日），廣西獨立，滿清巡撫沈秉堃爲都督（旋即取消獨立）。

十八日（十一月八日），江蘇的鎮江宣告獨立，林述慶爲都督。

十九日（十一月九日），福建獨立，孫道仁爲都督。

同日，廣東獨立，胡漢民爲都督。

九月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山東獨立，孫寶琦爲都督（旋即取消獨立）。

十月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四川獨立，蒲殿俊爲都督。趙爾豐端方被殺。

滿清政府的海軍亦於九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降服民軍。東三省則組織了所謂『奉天保安會』，爲變相的獨立。當時滿清政府實際所能控制的，只剩直隸、河南兩省了。

武昌起義的第二天，清廷就派陸軍部大臣蔭昌統兵由京漢路南下，並命薩鎮冰率部領海軍開往武漢江面助戰。但清廷早失民心，士兵更不願內戰，蔭昌徘徊孝感信陽之間，軍事毫無起色。清廷乃召回蔭昌，命馮國璋統第一軍，段祺瑞統第二軍，起用袁世凱爲次差大吏，付與調遣陸海軍及湖北剿撫事宜。九月初七日（十月二十八日）

馮國璋的第一軍奪回漢口，革命軍稍受挫折。但不到幾天上海又宣告獨立，浙江響應，清軍雖奪回漢口，無補於全局。而袁世凱則正於此時逼迫清廷把軍政大權全部交給他，並且企圖使清廷把統治權『禪讓』給他，以便據以攘取革命的果實。不久，清廷果任命袁為內閣總理，攝政王載灃亦去位。於是滿清政府名存實亡，軍政大權全操於袁世凱一人之手。革命軍方面雖然聲勢浩大，但各省的獨立，大都出於官僚紳士們的投機，他們表面上贊成革命，實際是把持政權，以致革命勢力的內部，因分子複雜，更加不健全起來了。武漢的各路革命軍，又因發生暗潮，被清軍乘機奪回漢陽（十月初七日，陽曆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受威脅。同時因帝國主義者把持了海關收入和鹽稅收入，使革命軍在經濟上大受打擊。剛好袁世凱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出任調停，朱爾典電令駐漢英領事向兩方介紹議和，就趁此機會，於十月二十八日（陽曆十二月十八日），由各省軍政府公舉伍廷芳為議和代表，與袁世凱所委派的全權代表唐紹儀，在上海公共租界開和平會議。但因革命軍方面堅決主張清帝退位，改政體為共和，雙方相持不決，和議又告停頓。

當和平會議開始時，各省軍政府選派代表，會議於武昌，議決組織臨時政府，並

暫定武昌爲中央軍政府所在地。十月十二日（陽曆十二月二日）蘇浙聯軍攻下南京，各省代表乃決議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代表會也移到了南京。十一月初六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自海外歸國，到達上海。那時候代表會議正在爭正副大元帥不決（有主張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但也有主張黎正黃副的），孫中山到了，這個問題自然擱置不談，決定於十一月初十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是日到會代表，計有奉、直、豫、魯、晉、陝、蘇、皖、贛、閩、浙、粵、桂、湘、鄂、川、滇十七省，孫中山當選爲臨時大總統。十一月十三日爲陽曆一月一日，代表會決議中華民國紀元改用陽曆，以本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派人赴上海歡迎孫中山。孫中山遂於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下令改元。一月三日孫大總統下令，分別任命黃興等爲各部總長，組織內閣。各省代表會改組爲臨時參議院。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至此遂正式成立。

袁世凱見南京已經成立了臨時政府，知道中華民國的招牌既經掛起，無法再除下來了，就一面運動清帝退位，一面向南京臨時政府要求舉他爲正式大總統，作爲協議條件。那時候革命黨員大都主張拉攏袁世凱，給他做正式大總統，以爲這樣已經達到

了「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目的。至於掛起「革命」旗幟的舊官僚、舊軍閥，更不用說願意奉袁世凱爲新主子。臨時附和起義的立憲派，他們早已忘記了袁世凱的出賣「百日維新」，只希望經過袁世凱來穩定自己的權位。孫中山知道這樣一妥協，革命等於流產，但他沒有辦法。當他初到上海的時候，黨員們以爲他一定帶來大批現款，那裏知道他只說「帶了革命的精神回來」，有些人已大爲失望。等到袁世凱要做大總統，孫中山表示反對的時候，一部分黨員就說他要爭總統權位，破壞和局。黃興甚至於說：「如不讓步，糧餉再難維持下去，我亦不負責了。」在這樣情形之下，孫中山祇好讓步，提出協議條件，交由伍廷芳轉告袁世凱。其中最重要的三條是：

一 袁世凱須宣佈政見，絕對贊成共和。

二 孫文向臨時參議院辭職。

三 由臨時參議員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這樣的條件袁世凱當然是滿意了，他就逼迫清帝退位。其實滿清政府自武漢起義後，早已名存實亡。他們爲圖最後掙扎，曾宣佈過所謂憲法十九條，但是宣佈得太遲了，一點也不能收緩和革命之效，倒反給袁世凱以取得組閣的全權；現在袁世凱已

和民黨妥協，只好在訂定優待條件之下，於二月十二日宣佈退位（注三），下一天，孫中山依照協議，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書。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設南京，派蔡元培、汪兆銘赴北京，迎袁南下就職。但袁世凱怕南下就職，離開了他的老巢穴，有種種不利，嗾使軍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處叛變，他就藉口必須坐鎮北方，要求在北京就職。孫中山乃於三月十一日公佈臨時約法五十六條（注四）。四月一日孫中山實行解職。二日，臨時參議院議決將臨時政府移往北京。從此政權落入袁世凱手中，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除結束專制皇朝，推翻滿清政府，掛起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外，實際上是流產了，失敗了。

第七節 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教訓

辛亥革命的起因，我們已經敘述得很詳細，如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資本主義的開始生長，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等等；但辛亥革命之所以成爲『辛亥革命』，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滿清政府的守舊不變，以及它的『騙』和『拖』的政策。假使那拉后當時讓光緒帝去實行變法維新，又假使戴灃能識時務，把他最後頒佈

的憲法十九信條在宣統登位時頒佈，那麼，雖然革命終難避免，但也許遲十年，成爲『辛酉革命』，或竟遲二十年，成爲『辛未革命』。

辛亥革命發展得異常迅速，不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連革命黨人都意想不到。這不是偶然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的目標非常簡單，只有『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八個字，我們甚至可以說只有『排滿』兩個字。惟其只是狹義的民族主義即排滿主義，目標簡單，所以各種反滿勢力能够在矛盾之下統一起來。甚至連君主立憲派在請願無結果，對清廷絕望的時候，也來附和革命，努力在革命內部取得權位了。甚至有許多舊軍閥、舊官僚（各省區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舊統治勢力），也都扯起『革命』的旗子，企圖借此避免真正的革命了。在當時，孫中山固然已經揭櫫三民主義，可是大家祇接受他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甚至有些人連『建立民國』與否都無所謂，只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好了。就是孫中山本人，對於民生主義也祇提出『平均地權』，還沒有談到『節制資本』，而且『平均地權』也只是一個口號，缺乏具體內容及實現方法。

因爲上述的原因，使得辛亥革命發展得異常迅速，但也因爲上述的原因，使得這

個革命特別富於軟弱性和妥協性，而失敗得也異常迅速。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革命的活動地盤主要的是舊形式的民衆組織（會黨）和新軍，而這種會黨和新軍主要是以農民大眾構成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這個革命的政治綱領。但那時候中國的工人力量還很弱小，農民本來富於保守性而且很散漫，所以起義民衆的自覺性和組織性顯然是很不夠的。而且當時各階級在『反滿』這個簡單的目標上結合起來，除此以外，目標是絕不一致的。同盟會的本身就是這樣矛盾的組織，辛亥革命的本身就是這樣矛盾的革命。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過分軟弱，和民衆的結合太不夠，並且但不敢使人民勝利，乃至隨時可能把革命交給反革命。而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面前也不能形成堅決的獨立力量。因之，孫中山革命綱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平均地權，被大家忽視着而擱置一邊，他的革命方略，被大家認爲『理想太高』，無法施行。結果是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盜竊去，辛亥革命歸於失敗。

辛亥革命失敗了，它沒有能够完成打倒帝國主義，肅清封建勢力的兩大革命任

務，沒有能夠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而中國民衆，由於北洋軍閥的投靠帝國主義，依然並且進一步在帝國主義的奴役下和封建勢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悲慘的生活。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辛亥革命的成功部分。第一，正如孫中山所說的：「此役爲剷除君主專制之迹。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爲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爲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第二，也如孫中山所說的：「此役所得之結果，一爲蕩滌二百六十餘年的恥辱」，推翻了滿清在中國所建立的「民族牢獄」。辛亥革命開始以「驅除韃虜」爲口號，到了滿清皇朝推翻了，立刻以「五族共和」爲號召，這個民族政策是非常正確的。

尤其是辛亥革命所給予我們的歷史教訓，應該特別指出來的。第一，帝國主義者利於中國的落後，而畏懼中國民衆的覺醒，所以總支持着中國的落後封建勢力。只是當時滿清政府太腐敗，太無能，簡直已成爲「扶不起的阿斗」，而革命黨並未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反把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接受過來，所以列強樂得暫守中立。但是當他們看出袁世凱是一種落後的封建勢力，而能力強於滿清政府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起來扶植他。我們祇要看當時英公使朱爾典出來調停，一面把持海關收入

和鹽稅收入，使革命軍在經濟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其用意無非是迫革命黨向袁世凱投降，使中國革命流產。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帝國主義者從中阻撓，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剷除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是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第二，由於滿清政府的專制，頑固，腐敗，貪污，以及後來的種種欺騙方法，拖延手段，使我們知道封建統治者越是腐敗無能，越是面臨崩潰危機的時候，越是害怕改革。他們要維持現狀，縱然現狀十分殘敗，但在這殘敗的現狀中，他們還能享受富貴尊榮。他們拒絕一切改革，怕一有改革，會把他們帶到不可測的前途去。對於統治者，希望他們自動改革，給人民以民主權利，那等於與虎謀皮，決不可能。民國以前的滿清統治證明了這一點，民國以後的軍閥統治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人民要想求得解放，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把勾結帝國主義的封建統治者打倒。推翻封建制度，是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必須徹底進行的。

(注一) 安奉鐵路亦稱安瀋鐵路，從瀋陽到安東，接朝鮮境，爲南滿鐵路的支線，原是日俄戰爭時的軍用鐵路，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爲路綫發生交涉，依日本的意見解決。間島在圖門江中，清設延吉廳，日俄戰後，日本派兵佔領，屢經交涉，於一九〇九年解決，雙方同

意，中韓界線仍以圖門江爲界，允許韓人在江北墾地，與中國人民一律待遇。撫順煤礦距瀋陽城東六十里，日本認爲中東鐵路的附屬品，應歸日本；又煙臺煤礦在南滿鐵路沿綫，日本也要求開採；一九〇九年依日本意見，把兩處的開採權都讓給日本。新法鐵路是由新民屯到法庫門的鐵路，清廷想向英國借款建築，但日本反對，一九〇九年雙方談判結果，依日本意見，允許先與日本商議。營口支綫本來是建築中東鐵路時運輸材料的臨時支綫，日本要求與南滿鐵路期限滿了時同時交還，經滿清政府於一九〇九年正式承認。

(注二) 黎元洪於出任都督的第九天寫信給海軍提督薩鎮冰說：『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砲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祇得權爲應允。』這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實際情形。

(注三) 當時商定『優待清皇室條件』八款，『待遇清皇室條件』四款，『待遇滿蒙回藏各族條件』七款，其大要爲：(一) 清帝退位後，仍存尊號，中華民國以待遇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二) 清帝退位後，由中華民國發優待費用每年四百萬兩。(三) 清皇族與滿蒙回藏各族王公世爵概仍其舊。(四) 滿蒙回藏原有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 (注四) 臨時約法最重要之點爲：(一)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約法第一條)。
- (二) 人民得享左列各項之自由權：一，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五，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約法第六條)。

第六章 袁世凱與北洋軍閥

第一節 政黨的演化與內閣的更迭

臨時約法規定了責任內閣制，當時革命黨人以爲可以借此分散袁世凱的權力；而要造成責任內閣制，須先造成擁護內閣的政黨。又當時流行一種口號：「革命成功，革命黨消」。同盟會中的大部分人認爲革命已經成功，今後不要革命黨，只要歐美那樣的政黨就成了。因此，黃興宋教仁等一意和袁世凱妥協，放棄了革命的鬥爭方法，企圖運用政黨的議會鬥爭，爭取議會中的多數議席。結果是同盟會和一些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譚延闓等）及一些舊官僚（如唐紹儀等）結合起來，於民國元年八月改組成國民黨。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張謇湯化龍等）及一些舊官僚、武人（如程德全黎元洪等）又和同盟會的另一部分人（如章炳麟張伯烈等）結合起來，於民國元年五月組成共和黨。這是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並立的兩大黨：前者是在野黨，後者是政府黨。

不久章炳麟從共和黨裏分裂出來，維持原來的統一黨（章炳麟於辛亥起義後就與同盟會分離，另組中華民國聯合會，後來又和張謇等，以江浙人士爲中心，聯合組織成統一黨）。而參加共和黨的一些君主立憲派（如湯化龍林長民等）和另一部分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孫洪伊等），又以梁啓超爲首，另行成立民主黨，打算操縱於參議院上述兩大黨之間。

同盟會自經改組爲國民黨後，孫中山名義上雖仍被推舉爲理事長，但他已被認爲「不能實行」的「理想派」，處於失勢的地位了。在國民黨的政綱中，同盟會時代反映小資產階級的急進綱領如「主張土地國有」已被拋棄，而換上一條毫無內容的極端抽象的所謂「注重民生政策」了；同盟會公開時的政綱中有「主張男女平權」及「力謀國際平等」，現在被拋棄或修改了。這樣一個溫和的政黨，那些官僚政客自然都可以加入。黃興宋教仁等還有一種天真的想頭，以爲祇要拉攏那些官僚政客，要他們填寫一張入黨志願書，就變成忠實的國民黨黨員；只要國民黨在國會中獲得多數議席，由國民黨來組織政黨內閣，袁世凱的權力一分散，他就不敢跋扈了。所以黃興一方面自動解散他的武裝部隊，表示擁護中央，並於民元八月間繼孫中山之後到了北京，竭力

勸說人家加入國民黨。他曾勸過楊度，勸過范源灝，勸過民主黨的領袖們，甚至於還勸過袁世凱，要袁世凱也來作國民黨的領袖。他以為『如此政府方有後援，政局才能安定』。國民黨合併其他黨派與黃興竭力勸說的結果，在臨時參議院中居然得到了三分之二的議席。

臨時約法規定了責任內閣制，內閣總理的人選自然是很關重要的了。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臨時大總統職以後，就提出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唐紹儀本在袁世凱下面做事的，他南下議和時，同情革命黨，加入了同盟會，因此袁世凱和革命黨認為他任內閣總理是很適當的，參議院也同意了。但唐內閣的閣員是新舊雜糅的（內務、陸軍、海軍三部為袁黨，財政部為共和黨，同盟會得農林、司法、教育、工商四部，當時任農林總長的是宋教仁）。成立不到三個月，最初受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的壓迫，財政發生困難；後來為了王芝祥督直問題，又和袁世凱發生齟齬。原來唐紹儀主張以王芝祥做直隸都督，袁世凱已經答應了，但一面嫉使他的部下，用什麼直隸五路軍界名義，發出反對王芝祥的通電，他便藉口軍界反對，派王芝祥到南京去遣散軍隊。依法，王的委狀應由國防總理副署，唐便拒絕副署，但袁世凱那裏把臨時約法放在眼裏，竟將

不副署的委狀交給王芝祥，因此唐不得不辭職，同盟會的四個閣員也聯袂去職了。

袁世凱這一個舉動，明明是違反臨時約法的，同盟會即不聲罪致討，也應該據理力爭，但同盟會竟不看重這一點，祇在那裏談什麼政黨內閣，爭繼任內閣的人選。而當時的共和黨，明知自己沒有組閣的希望，怕內閣被同盟會奪去了，就主張超然內閣。袁世凱聽了，自然很高興，他就提出一個陸徵祥來。陸徵祥原在唐內閣中任外交總長，我們不妨加一段插話，談談當時的所謂外交和陸徵祥這個人。清末辦外交的是李鴻章。李鴻章一手簽訂了好多不平等條約，但他有時也居然自傲自大，擺一點「天朝上國」的臭架子，他還有一套「以夷制夷」的理論，無論他怎樣富有阿Q氣，怎樣荒謬可笑，在所謂列強面前，還不至於卑微到像一隻哈叭狗。自從八國聯軍之役以後，中國的當局者變排外而為媚外，一班外交官祇要懂得外交禮節就成了，根本無所謂外交國策，陸徵祥就是這一類外交官的典型。他能說流利的洋話，懂得怎樣握手，怎樣跳舞，說話時應如何和緩婉轉，喫飯時應如何不使刀叉碰着杯盤出聲；早上見面說「古貌林」，晚上見面說「古伊佛林」等等，對於國際大勢，列強實情，都茫無所知。然而他在當時居然被人看作了不起的外交家！袁世凱曾經向滿清政府保薦過

他，說他「通曉時務，慮事精詳」。其證據是他曾以專使資格，出席海牙保和會第二次會議，「凡國體有關事項，據理力爭，曾不少屈，尤能洞察列強情勢，剴切敷陳，確有見地」。其實他在保和會所爭得的，不過是依羅馬字母的次序排列國家的名次，中國得排在第三位，就飄飄然以為替國家爭得面子了。像這樣一個人物，要他做國務總理，同盟會當然反對，但在做袁世凱的傀儡這一點上是很適宜的。因此參議院投票時，共和黨都投了同意票，還有一個統一共和黨（該黨重要人物有谷鍾秀吳景濂等，後來與同盟會合併而為國民黨，但此時尚未合併，在參議院中是一個第三黨）也投了同意票，多數，通過了。不久陸徵祥秉承袁世凱意志，向參議院提出六個國務員，請求同意（唐內閣閣員祇有六個人辭職，所以補充六個人），並親自到院宣佈政見。可憐他有什麼「政見」可宣佈呢！結果說了一些什麼「開榮單」「作生日」等等蠢俗不堪的話，沒有一句涉及政務，連投過同意票的統一共和黨的議員們也大喊「倒楣」了。因此，參議院把他所提出的六個國務員一律否決，作為不信任的表示。但是，這樣一來，袁世凱可不答應了。剛好那時候日俄同盟及英國在西藏自由行動的宣言在各報露佈，袁世凱便以外交形勢險惡，國家危急為口實，唆使他部下的軍官、特務一齊

出動，向參議員們痛罵，恐嚇，無所不至：有所謂「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的通電，有署「軍界公啓」的聲討議員們罪狀的露佈，有懸賞購議長頭顱的匿名傳單，還有袁世凱的特務頭子陸建章（時任執法處總辦）的對議員們的公開威嚇。於是袁世凱第二次所提出的國務員，在參議院裏通過了。但議員們總有點不服氣，接着又提了彈劾陸總理失職案，陸就稱病請假不到院，由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其實那時候的國務院，事實上已成爲總統府的秘書處，國務總理之有無，原無關重要，但袁世凱沒有做正式大總統，沒有公開撕毀臨時約法，還需要這樣一個裝飾品，又向參議院提出正式任命趙秉鈞爲國務總理，要求通過。

袁世凱提出任趙秉鈞爲國務總理在九月下旬，此時同盟會已改組爲國民黨，孫中山和黃興都到了北京，和袁世凱黎元洪訂定了「八大政綱」，高唱「新舊合作」或「朝野合作」，孫中山願以在野之身致力於他所空想的二十萬里鐵道政策，宋教仁則竭力主張政黨內閣。趙秉鈞本來也是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可是估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議席的國民黨，因爲要和袁世凱合作之故，竟同意他做國務總理，一面則拉些閣員參加國民黨。趙內閣的國務員，除了周學熙范源濂及陸海軍兩總長外，都填寫了入黨志願

書，黃興宋教仁等大爲滿意，以爲這個內閣可以算是國民黨的內閣了。同時正式國會組織法及兩院議員選舉法都已頒佈，國民黨又忙着預備作選舉的競爭了。

所謂「選舉」，原是和人民沒有什麼關係的。初選的時候，各地方的所謂「候選人」（大部分屬於官僚政客和地主豪紳一類），任意造選舉名冊，僱人寫好了選舉票，用種種舞弊的方法投入票匭。初選當選了，在複選的時候又用買賣的方式，選出了一批所謂「國會議員」。當時國民黨還有六七省地盤，利用了辛亥革命的影響，吸收許多投機政客，出全力來競選，居然在參衆兩院中得到絕對多數的議席。宋教仁大爲高興，以爲可以實現他的「政黨內閣」的理想了，在湘鄂皖及滬寧一帶，到處演說，宣言大總統「非袁莫屬」（這是民元以來流行的一句話），內閣則必須由在國會中佔有多數議席的政黨來組織。他自己當仁不讓，以組織政黨內閣的候補者自居。

袁世凱本來滿腦子專制皇帝的思想，開頭他不屑注意所謂「選舉」這一類把戲，現在看看形勢和他不利，纔感覺到以前忽視選舉的失策，他要想方法來補救了。

第二節 宋案、大借款及討袁軍的失敗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午後十時，宋教仁擬乘滬寧車北上，在滬寧車站被刺受傷，延至二十二日傷重不治逝世。袁世凱在北京得到這個消息，表示大爲震怒，立刻電令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閔「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可是在上海方面已先後捕獲行兇犯武士英（即吳銘福）及謀殺犯應夔丞（即應桂馨），並在應宅搜得謀殺證據多件，很確鑿的證明了袁世凱所要「窮究」的主名，正是他自己，而經理這樁事件的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直接組織行動的是在上海替袁世凱做特工的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應夔丞！當宋案證據一一在上海暴露的時候，袁世凱大窘，在北京製造一種暗殺的謠言，一面濫施搜捕，據說搜出了什麼「血光團」的名冊，並賄買周予傲自首爲血光團團員，供詞拉扯黃興，又逮捕了國民黨議員謝持。等到上海法院票傳趙秉鈞，北京就以票傳黃興爲抵制，因此宋案的審理得不到結果。但是，與宋案有關的人，事實上都是有了結果的：兇手武士英被捕後即被毒死；經過剖腹檢驗。應夔丞關在牢裏，後乘上海之亂（陳其美攻製造局事，詳後）逃出，於民國三年在京津火車中被刺身死（兇手當然是袁世凱指使的，爲了滅口）。那時候趙秉鈞在做直隸都督，曾通電各處嚴緝刺應兇犯，並打電話給袁世凱，說「這樣，以後誰肯

替總統作事』，沒有幾天，趙七孔流血而死。洪述祖安然避居青島，幾年後被宋教仁的兒子拿獲，由法院判決死刑，執行絞決。至於主犯袁世凱的結局，那我們在後面更詳細敘述的。

宋案的全部證據，由程德全應德閔於四月二十六日電呈袁世凱，同時對全國公開宣佈。就在宣佈宋案全部證據的同一天，袁世凱向五國銀行團接洽的所謂「善後大借款」的合同簽字了。

先是英、美、法、德組織四國銀行團，預備以鉅款借給袁世凱，後來日俄兩國加入，四國變為六國。袁世凱政府屢次向六國銀行團交涉借款，因為條件苛刻，沒有談妥。宋案發生時，美國退出銀行團，六國又變為五國。當時袁世凱決意用武力打倒國民黨，急於獲得借款；而銀行團方面疑心美國將單獨行動，又因預備借款給中國，收進現銀頗多，希望大借款早日成立，於是雙方於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簽約。借款的總數為二千五百萬鎊，利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把鹽稅收入除作擔保以前外債的一部分外，全部作這一次大借款的擔保。將來海關收入的餘款，也儘數作為這一次借款的擔保。在北京設立鹽務署，內設稽核所，以中國人為練辦，洋人為會辦；並於產鹽之區設立

稽核所，以中國人爲經理，以洋人爲協理。鹽稅存入銀行，非由總會辦會同簽字，不能提用。本利拖欠過了『展緩近情』的日期後，即將鹽政事宜歸入海關管理。更於審計處設立稽核外債室，任用華洋稽核員，以稽核鹽稅用途。

大借款宣佈後，全國譁然。那時候國會已正式開幕（四月八日），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尤爲激昂，就是擁護袁世凱的議員，也不得不承認借款簽約手續不合，因爲事前未經交議。各省都督也有通電責問政府借款違法的。孫中山自宋案真相暴露後，就從日本回上海，他認爲『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毫不猶豫地主張立即興兵討袁，反對大借款，忠告五國銀行團停止付款。但國民黨分子既複雜，意見更紛歧，有和平激烈之分，急進緩進之別。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大都屬於和平或緩進派，他們曾向袁世凱提出過妥協條件：第一，請勿發動內戰；第二，大借款案必須咨回政府，請政府再行交議，國民黨擔保通過，不過關於借款用途的附件，必須略加改動；第三，內閣必須改組，如新內閣由進步黨來組織，提出借款案時可以保證通過，連附件都可不必更改。因爲那時候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在袁世凱的策劃之下，已合併爲進步黨，和國民黨對抗，國民黨企圖以「法律」來制服袁世凱，同時企圖乘進

步黨基礎尙未穩固的時候，用「組閣」來引誘他們，使他們和國民黨提攜，共同制服袁世凱。

國民黨的議員們又是天真得太可以了。袁世凱早已把國會玩弄在他手掌之中，他會來理睬你們這些條件嗎？他會怕什麼法律制裁嗎？他現在已經得到外國強有力的撐腰，肯中止早已準備好了的剷除異己的大內戰的發動嗎？當時岑春煊託人向袁世凱勸說調和南北，袁回答說：「今日並非調和南北問題，乃係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問題。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議會（按：當時袁世凱認爲借款已在臨時參議院裏通過過了），我與岑君等皆不能說話。至李烈鈞等爲地方長官，於行政之系統上，中央不能不求統一之法。」袁又發表談話，說：「我現已決心。現在看透孫（文）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生命財產、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外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好，大獨裁者的兇惡面目完全暴露了。過去國民黨的一切讓步，妥協，只是引起袁世凱對他們的卑視，增長袁世凱剷除異己的野心。

六月九日袁世凱下令免江西都督李烈鈞職，十四日免廣東都督胡漢民職，三十日免柏文蔚職。李柏胡三都督均遵令解職，但袁世凱還是不放心，一定要派北洋軍隊佔領各省，先向江西進發，於七月十二日任命李純爲九江鎮守使。於是李烈鈞佔領湖口起兵，稱爲「討袁軍」；黃興則於十四日入南京，迫蘇督程德全宣佈獨立，安徽、湖南、福建、廣東也先後響應。袁世凱早已豫備妥當，他看準李烈鈞態度最強硬，軍隊也比較有實力，其次是黃興，只要把贛寧解決了，此外皖、湘、粵、閩等省可傳檄而定。就以段芝貴爲第一軍軍長，對付贛方，而以李純爲前驅；以馮國璋爲第二軍軍長，對付寧方，雙方正式開戰了。

當戰事初起的時候，在京的國民黨要人曾與進步黨要人密議，一面請袁退位，一面令兩方停戰，說這是最好的和平辦法。進步黨人說：「那太不近情理了！」又有一個超黨派的蔣智由，發起「弭禍公會」，主張袁世凱辭去總統，消弭兵禍。蔡元培發表告全國同胞文，他說：「一年以來，政府失德，雖吾儕摯愛之者，決不能爲之諱。至於恣行暗殺，擅借外款，不復留吾儕以承認政府之餘地。吾儕中的一部分所謂民黨也者，攻擊政府爲激烈之主張，何嘗不公認爲不得已之舉，徒以兵亂初起，瘡痍

未復，苟於和平解決一方面尙有幾希之望，則終告誡民黨而強抑制之。雖然，政府之播照也，乃變本而加厲，且以是爲鋤除民黨之機會，而日日與之挑戰。於斯時也，吾儕而稍稍移其注視民黨之目光而靜觀政府，得民黨之所以不能不激昂之故，糾政府而去其疾，未嘗不可達保持和平之希望。不幸吾儕大多數見未及此，徒日日監視民黨，責以不許妄動，而轉使政府益放其縱惡挑戰之手段。既民黨忍無可忍，而爲武力解決之宣告，反之於吾儕往日希望和平之美意，誠不能不謂之失望。……今者戰端開矣，猶未達全國糜爛之境也。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吾儕而坐視其孰勝孰負，若秦越人之視肥瘠，則亦已耳。若惕於戰禍之延長，而爲迅速恢復和平之計劃，則不可不洞見窳要而批導之。時局之窳要何在？曰：民軍之起也，號曰討袁，袁去而民軍之目的達，戰禍熄矣。』他們都反對內戰，蘄求和平，以爲只要袁世凱一辭職，就天下太平，一切都可用政治方法來解決了。殊不知袁世凱用武力來打倒國民黨滿有把握，他如何肯『去』！而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和一般大地主、大買辦、大金融家乃至大企業家，都正需要袁世凱以軍事力量來穩定他們的『秩序』，袁世凱早已看準了情勢，他如何肯放手！至於那時候的國民黨，也是代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不過它側重於新興的地

主和大資產階級，所以仍然被稱爲『急進』，或被稱爲『搗亂派』，但它早已放棄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綱領，把自己從民衆方面孤立起來了。袁世凱擁有強大的陸軍，且有帝國主義者作後盾，國民黨如果不能做到『武力與民衆結合，武力成爲民衆的武力』，就無法和袁世凱爭勝。實際上當時國民黨的武力，談不上和民衆結合，更談不上什麼民衆的武力（孫中山要在十多年以後纔提出這個口號），在軍事上當然要失敗的。結果是：北洋軍隊水陸並進，於七月二十五日攻破湖口。黃興因北軍抵浦口，於七月二十九日潛離南京，程德全就宣告取消獨立。至八月八日，忽有革命黨何海鳴到南京，自爲總司令，和袁軍抵抗，直至九月一日，南京才爲張勳所奪取（何海鳴原是一個黑幕派文人，時常在民權報與戴天仇等同寫社評。他在抗戰以前已做了漢奸）。以後李純攻入南昌，倪嗣沖取安慶，李烈鈞柏文蔚均逃走。陳其美於黃興尙在南京時，發動攻上海製造局，亦失敗。福建湖南旋即自行取消獨立。廣東被龍濟光所平定。不到兩個月，討袁軍完全失敗了。這次戰爭，稱爲『二次革命』。又因爲祇有江西和南京兩處的戰事比較久一點，所以又稱爲『贛寧之役』。從此東南各省完全入於北洋軍閥的勢力範圍。袁世凱的得意，是想像得到的。他環顧宇內，躊躇滿志地說：『莫予毒也』

矣！」

第三節 從正式大總統到洪憲皇帝

自宋教仁被刺後，國民黨的議員受袁世凱威逼利誘，分裂成好多小團體，有什麼相友會、政友會、癸丑同志會、超然社、集益社等。總之，國民黨在國會中已不起什麼作用，進步黨遂獨佔優勢。那時候的國會，實際上等於「告朔餼羊」，袁世凱爲要利用它來選舉正式大總統，不能不暫時保存它，更不能不借重進步黨，而爲借重進步黨之故，進步黨的熊希齡就由袁世凱提出，任命他做國務總理。熊氏正式受任組閣在八月終，南方討袁軍已全部垮臺，他的內閣裏當然不會有國民黨人，但立憲派亦即進步黨的領袖人物梁啓超張謇都入了閣，他們都被認爲第一流人才，所以熊內閣被稱爲「第一流內閣」。這是立憲派的得意時代。梁啓超他們完全忘記了戊戌政變時他們的同志譚嗣同等因被袁世凱出賣而喋血西市，現在反而來擁護袁世凱，希望在袁世凱下面來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立憲」。他們希望制定一種他們所認爲滿意的憲法，引導北洋軍閥走上憲政軌道。至於選舉袁世凱做正式大總統，當然沒有問題。他們最初主張

先制憲，後選大總統，國民黨議員也贊成。可是那『六十老翁』的袁世凱，如何等得及！便嫉使他的私黨，藉口沒有正式大總統，中華民國不被各國承認，就不能取得國際地位，主張先舉總統後定憲法。進步黨爲要確定袁世凱的地位，又怕遷延時日，夜長夢多，國民黨議員會生出什麼枝節來，也就贊成先選總統，後定憲法。於是國會中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把憲法中的總統選舉法起草成功，交由國會通過，並定於十月六日由兩院議員組織選舉會，舉行投票選舉。到了選舉的那一天，袁世凱預先組織好了的幾千打手（包括便衣軍警），稱爲『公民團』，把議場包圍起來，聲言『非將公民所屬望的總統於今日選出，不許選舉人出議院一步』。可憐那些議員們從上午八時起到下午十時，才算把這一齣『活劇』扮演完畢。公民團聽到報告袁世凱當選大總統，大呼『袁大總統萬歲』，振旅而返。第二天，又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十月十日袁世凱正式就職。歐美及日本各國先後承認，中華民國算是正式取得『國際地位』了。袁世凱於就職的那一天，發表所謂就職宣言，大談其『共和』的道理。據他說，共和是以『道德爲體，而法律爲用』，歸納起來，則『仍不外道德二字』，『約言之，則忠信篤敬而已』。忠是『忠於一國，非忠於一人也。人人以一國爲本位，勿以一身一

家爲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羣，……不以一己之權利，妨害國家之大局」。他又引孔子「民無信不立」的話，說「文明各國有以詐欺行爲誦人者，其受辱若撻之於市朝」。又引了曾國藩的話，說「立身以不妄語爲本」。這裏表示了他是大忠大信，爲國爲民的，他是道德的維護者，他所敬佩的是曾國藩一類人。大抵大奸大詐的人，一定要裝作大忠大信，俗語所謂「滿口嘴仁義道德，滿肚皮男盜女娼」是也。

袁世凱做了正式大總統，國會變成礙手礙腳的東西，當然不要了。但如果制憲會議能順着袁的意旨，制出一部大總統的權力大到等於皇帝一樣的憲法來，國會也許還能苟延殘喘。無如制憲諸公太不識相，居然不問問「大總統」的意見，儘在那兒起什麼憲草，開什麼讀會。袁世凱便教他的秘書長兼交通銀行總理梁士詒，引誘一小部分議員，組織了一個公民黨，凡在梁士詒勢力範圍內的所謂「交通系」的部屬，都教他們加入公民黨。公民黨的第一樁任務是佈置總統選舉，第二樁任務就是監視制憲。他們常常向他們的主子報告，憲草的某條某條不利於大總統。袁世凱在做穩了正式大總統以後，就和憲法會議爭憲法公佈權，接着又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派了八個委員，列席憲草委員會，陳述意見。委員會因爲會章無此規定，加以拒絕。這樣一來，

袁世凱可不答應了。他立刻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說那些起草憲法的「國民黨人」，「始則託名政黨，爲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聞其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簡直是「國會專制」！「值此建設時代，內亂外患，險象環生，各行政官力負責任，急起直追，猶虞不及，若反消滅行政一部獨立之權，勢非亡國滅種不止」。『各該文武長官，同爲國民一分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大法，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言』。於是那些「各該文武長官」如應聲蟲般都來說話了，大都主張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議員，解散憲法起草委員會，措辭慷慨激昂之至。一部分進步黨議員，自公民黨活動以來，已看出大局一定日趨惡化，就和一部分國民黨議員結合起來，組織了一個民憲黨，於十月二十一日開成立大會，國民黨以張耀曾、谷鍾秀、楊永泰、沈鈞儒等，進步黨以丁世暉、劉崇佑、李國珍、藍公武等爲主要人物，宣言不爲金錢勢力所屈服，以貫徹民主精神，擁護憲法爲職志。但是，大局已經無法挽救了。十一月四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追繳四百三十八人的議員證書徽章，說他們「但知構亂，以便其私，早證國家危亡國民痛苦於度外，亂國殘民，於斯爲極」，說他們「顯以民國政府爲敵國」，「顯以民國國軍爲敵

兵」，「顯欲破壞民國之統一而不恤」，「顯欲引起列強之干涉而後快」。從此國會以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了。先是袁世凱以討論改革省制爲由，召集一個所謂「行政會議」，國會開不成會的時候，就把行政會議改組爲「政治會議」，其中人物，有由總統府及國務院各部派遣的，有各省及各特別區派遣的，以李經羲爲議長，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開會。其時各省都督民政長等又聯電呈請遣散國會殘餘議員，袁世凱交政治會議討論，直至民國三年一月十日議復，認爲各省長官所呈請的理由很「正當」，於是袁世凱就以命令宣佈停止兩院現有議員的職務。到了二月間，又下令解散各省省議會，停止各地方各級自治。上述的種種命令，都由國務總理熊希齡副署的。國民黨議員被追繳證書以後，政府黨議員也大感掃興，曾向熊內閣責問，熊內閣的回答是：「大總統於存亡危急之秋，爲拯溺救焚之計，是非心跡，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當例以繩！」這個以熊希齡爲首的「第一流內閣」，對於「袁大總統」可謂盡幫忙之能事了，然而當他副署了上述的種種命令以後，功德圓滿，就被袁世凱一脚踢開，不得不聯袂和閣員們辭職了。這也表現了地主資產階級（包括一部分的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與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分）的獨裁派之間

還是有矛盾的。

袁世凱已經有了一個御用機關「政治會議」，本想利用這個機關來改造約法，可是政治會議裏的人自己覺得太不够資格，向袁世凱獻計，另行組織一個造法機關，經袁同意，由政治會議議決定名為「約法會議」，並通過了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約法會議於民國三年二月十八日舉行開會式，經過相當時間，制定了新約法，五月一日由大總統公佈。新約法的內容，把大總統的權力規定得和專制皇帝的權力一樣。責任內閣制當然改爲總統制，但這個總統制又和美國式的總統制不同，連立法部都受總統的宰制。約法會議的議員們很能體會袁世凱意旨，把所謂「大總統」下面的國務長官，稱之爲「國務卿」，規定「行政以大總統爲首長，置國務卿一人贊襄之」，又在新約法中給與總統一種頒賜爵位的權。原來我國從前的所謂「卿」，是與天子諸侯爲姻緣的，現在總統下面有「卿」，還有「五等爵」，這不是等於皇帝了嗎？袁世凱依照新約法任命徐世昌爲國務卿，廢止國務院，設政事堂於總統府。政事堂以國務卿爲首腦，下置左右兩丞。這個政事堂彷彿前清的「軍機處」，國務卿好像前清的「軍機大臣」。新約法中立法機關採一院制，稱爲「立法院」；又規定設一個「參政院」，做總統

的諮詢機關，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袁世凱「依法」成立參政院，把原來的政治會議取消，並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立法院始終沒有成立）。參政院迎合袁的意旨，修改總統選舉法，定總統任期為十年，連任無限制；並且總統繼任人須由現任推薦。這樣，總統不僅成爲終身，又有世襲的可能。論情理，袁世凱也可以躊躇滿志了，但他非做皇帝不可！他於九月間發佈了「祀孔令」，預備到了冬間還要祀天，因爲祀天與祭孔是中國歷代專制皇帝照例舉行的大典。總之，袁世凱的一切作爲，都表示他要做皇帝了。這樣就引起了清朝遺老的不平，以爲袁世凱本是清朝的臣子，要恢復帝制就應該請出宣統皇帝來。他們就乘機進行「復辟」運動。袁世凱板起面孔來了，他逮捕了復辟派宋育仁，並且下令說：「須知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國有常刑！」

那年歐洲發生大戰，日本乘機把山東的青島從德國人手裏奪了去。袁世凱眼看到列強無暇東顧，只要給日本一點好處，得到了日本的幫助，他就可以做成皇帝了。日本帝國主義也早看出了袁世凱的心事，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由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的內容分爲五個部分，完全是滅亡中國

的條件（注二）。二十一條的提出方式，也打破國際慣例，不經過外交部，而是由日置益面見袁世凱時手遞的。日置益還對袁說：『恭賀大總統高陞。』後來日置益對曹交涉之衝的曹汝霖也說：『敵國向以萬世一系爲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爲君主，則敵國必然贊成。』二十一條提出後，最初雙方秘密交涉，不久外國報紙將條文披露了，中國報紙纔翻譯出來，一時輿論大譁，全國騷然。袁世凱對於人民愛國運動採取高壓手段，禁止言論激烈的刊物，制止抵制日貨的運動。當時除上海租界一隅外，自北京以至各大都市的茶館酒肆及其他公共場所，都貼上『莫談國事』的字條。但究竟因爲是亡國條件，不敢一下子隨便接受，雙方會議達二十餘次，到五月七日，日本竟向袁提出『最後通牒』，袁世凱卻說日本已有讓步之處，於五月九日正式給日本覆文，表示接受。事後袁黨還大事鼓吹，竟說什麼『外交勝利』，直到十年以後，還有人替袁辯護，說他『捷才機智』，在這一次交涉中『政策頗爲正確』（王芸生的話，見他所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袁世凱承認了亡國條件以後，以爲有日本撐腰，帝制運動可以積極進行了。到了八月上旬，有一個外國政治流氓而做袁世凱的顧問的美國人古德諾（E. J. Goodnow）在

北京各報發表了一篇共和與君主的論文，認爲中國不適宜於共和，祇適宜於君主。過了幾天，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列名發起組織什麼籌安會，說要從學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國孰爲相宜。這六個人就是所謂「籌安會六君子」。其中楊度、嚴復本是君主立憲派；孫毓筠、胡瑛、李燮和是同盟會和國民黨的人物；劉師培本是同盟會會員，而因爲會向清廷告密之故，早被他的同志們摒棄了的（但嚴復和劉師培同時又都是學者！）。籌安會成立後，居然有人因爲他們反對民國，太不成話，呈請嚴辦或解散的（其中包含有肅政使。所謂肅政使者，就是專制時代的御史，也彷彿國民黨時代的監察使）。袁世凱的回答是：「如不任令學者自由研究，則一部分主張頗力（指主張君主者），恐以武力搖撼國體，不如以此緩和其氣。」在這裏袁世凱也懂得學術研究自由了！不過袁世凱是給在共和國內鼓吹專制者以自由，反對民國和民主者以自由，對於鼓吹民主，擁護民國的人，就不給予自由！

當籌安會宣佈成立之初，即通電各省文武長官，請派代表到京，並附寄古德諾的論文及入會願書和投票紙，請他們書明贊成與否並代募會員。各省的文武官員當然無不贊成，紛紛派代表晉京。籌安會的初意，原擬候各省代表到齊，開會決定後，即是

請變重國體。後來覺得自己是一個研究機關，還是經過代行立法職權的參政院，較爲名正言順，但參政院定九月一日開會，各省代表未能立即到京，就運用各省旅京人士分頭組織各種名目的『公民請願團』，所有請願書，一律由籌安會代辦，分頭向參政院投遞。參政院接到這些請願書後，於九月二十日議決『請政府於年內召集國民會議，爲根本上之解決；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新約法規定民國憲法應由參政院起草，經審定後由國民會議複決，所以約法會議會議定國民會議組織法，於四年三月公佈）。袁世凱於二十五日咨復，採用提前召開國民會議辦法。但事實上袁世凱是等不及的，所以又由梁士詒出來主使，組織所謂『請願聯合會』，把以前成立的請願團體和新組織的請願團體，一齊聯合起來，再向參政院請願，說國民會議是決定憲法的機關，不能代決國體問題，應請立即議定召集徵求民意機關的辦法。參政院又議決了一種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袁世凱就於十月八日將此項組織法公佈。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選舉，二十八日以後各省區就舉行所謂國體投票了，十一月二十日前，全國各區投票完畢，總共一千九百十三票，完全主張君主。尤爲希奇的，各省國民代表大會在國體投票時竟連皇帝都推戴定了。推戴書的文字各省一律，共計四十五個字，其文曰：

「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各省國民代表大會又委託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的總代表，向袁恭上推戴書。參政院於十二月十一日開會，即於是日草定一篇總推戴書，連同各處來的推戴書一併呈上，袁世凱即於當天咨復該院，表示謙讓，該院於當天又呈上第二次的推戴書，袁於次日咨復該院，承認帝位，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何不稱朕？）之愛國，詎在人後？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十三日袁世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並冊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一面設立「大典籌備處」，準備於明年元旦登皇帝位；並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爲「洪憲」元年元旦。袁世凱這一幕受國民「推戴」的戲演得太匆促，所以演出的「效果」很壞，後來被梁啓超譏笑，說：「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又說袁世凱「右手挾利刃，左手挾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由一人在幕內牽線，而其左右十數藝人蠕蠕而動；此十數藝人者復牽第二線，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蠕蠕而動；

彼長官等復牽第三線，而千數百餘不識廉恥之輩冒稱國民代表者蠕蠕而動」。

第四節 雲南起義與帝制撤消

當袁世凱積極準備做皇帝的時候，反帝制運動也在醞釀，並且反帝制的各派很快的形成了聯合戰線。

首先是民黨方面。孫中山自討袁軍失敗後，集合舊同志，謀恢復同盟會的革命精神，於民國三年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但孫中山這時還不能提出鮮明的革命主張和合於現實需要的革命綱領，在這綱領基礎上號召羣衆，成立革命政黨。他只是受了國黨在辛亥革命後廣泛吸收黨員而失敗的教訓，想把新成立的中華革命黨成爲一個組織極嚴密的政黨，所以對於入黨宣誓等的手續定得非常繁複。殊不知僅僅靠組織嚴密而沒有明確完整的革命綱領，是建立不起一個真正健全的革命政黨來的。到了四年冬天，袁氏之圖謀稱帝，真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中華革命黨因爲沒有羣衆基礎，所佈置的反袁行動也就只能是單純的軍事冒險行動，並不能起廣大的政治作用。例如中華革命黨人在陳其美的指示策劃之下，結合了一些流氓勢力，刺死了上

海鎮守使鄭汝成（四年十一月十日），後又襲取肇和兵艦（十二月五日），企圖佔領上海。這種片面的軍事冒險行動自然得不到成功。至於國民黨，自被袁世凱破壞後，有一部分黨員散在國外，黃興到了美國，留在日本的也沒有什麼黨的組織（他們大都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當日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時候，他們曾發出停止革命行動一致對外的呼籲通電，列名的有李根源、鈕永建、程潛、陳炯明、章士釗等二十餘人。他們又組織歐事研究會，借此聯絡同志。等到袁世凱承認日本要求，帝制運動積極進行的時候，歐事研究會的活動漸漸及於國內，纔和國內的國民黨同志籌畫反帝制的組織和行動。但是國民黨既早已成爲一個無原則的政治集團，不能起號召羣衆的作用，因此，反袁運動的領導權反而落到了進步黨的手裏。

進步黨原是一些君主立憲派人組織起來的，現在去了滿清的君主，換來一個洪憲皇帝，在他們看來，原算不得什麼大逆不道的事。但爲什麼要反對呢？他們認爲袁世凱在這時候很性地要做皇帝，一定引起普遍的反對浪潮，勢將破壞業已由袁世凱建立起來的秩序，而發生人民革命的危險。所以不能不一變過去的『擁袁』而爲『反袁』。梁啓超曾向袁世凱進過『最後之忠言』，說：『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

衆矢之的；舍盤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堅菡萏之志？」袁世凱不聽他的話，他纔堅決起來反對，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進步黨的反對袁世凱並不是反對袁世凱所代表的整個社會勢力，恰恰相反，他們只是害怕封建的統治勢力因爲袁世凱個人的野心而受到損害，所以起來反對他。梁啓超等人之搶先把反袁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正是這個用心。但進步黨是被認爲「穩健派」的，現在穩健派也反對帝制了，這影響可就不小。梁啓超那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報章競先登載，一般知識分子用了最熱烈的心情去讀它。

前雲南都督蔡鐔（字松坡，湖南寶慶人），以前是統一共和黨的總幹事，當然就是進步黨的人物，又是梁啓超的學生，那時候在北京任將軍府將軍，這是一個閒職。他在籌安會產生的第二天，就到天津去看梁啓超，共商大計。後來秘密離開北京，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到達雲南。其時滇軍中的高級軍官，對於袁世凱的帝制自爲，異常憤慨，已有反袁的準備，蔡鐔到後，就於二十三日由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及巡按使任可澄（袁世凱把各省都督改稱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聯名發出通電，請袁世凱取消帝制，懸解禍首，限於二十五日午前十時答覆。到了二十五日袁世

凱沒有答覆，雲南就宣告獨立。五年一月一日，雲南都督府成立，廢除將軍、巡按使名義，公舉唐繼堯爲都督，以戴戡（前貴州巡按使）、任可澄爲參贊，組織「護國軍」。以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第三軍總司令。一二兩軍分三路出兵，三軍留守雲南。並通電各省，請一致討袁。

雲南起義後，袁世凱還是架子十足，居然下令討伐，因爲他手裏有軍隊，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做靠山。他在「討伐令」中說：「主張君憲，正爲我國人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人民投票之時，概聽人民自由，並無絲毫限制。」又說：「今日名分已定，天澤凜然，正宜嚴君臣上下之分，生亂臣賊子之懼。」他令曹錕、張敬堯率大軍由川攻滇，令馬繼增所部由湘入黔，一面令龍觀先（粵督龍濟光的弟弟）率粵軍與廣西聯合，由廣西的百色進攻滇南。無如貴州省於一月二十四日宣告獨立，到了二月下半月，川湘方面的情勢愈益緊急。於是大典籌備處奉令停辦，並有人倡議先行取消「洪憲」年號，解散參政院了。二月二十八日袁世凱申令提前於五月一日召集立法院，並分電各省長官及駐外公使徵求對於帝制之意見。這種舉措，完全是「看風使舵」的方法，如果戰事勝利，帝制仍可進行，否則由所謂「立法院」來宣告取消。三月初旬，

前線傳來幾次捷報，袁黨大爲高興，不料廣西方面忽又宣告獨立（三月十五日），給袁世凱一個很大的打擊。而最大的打擊還是他的主子日本帝國主義者也表示不贊成帝制了。原來袁世凱向他的主子誇過口，說『如有意外變亂，中政府自信無論何時都有把握鎮壓下去』。但自雲南起義以來，戰亂日益蔓延，袁政府束手無策，日本帝國主義者又決心要拆袁氏的臺，以便扶植另一個新傀儡，就向袁世凱提出警告（此事在一月下旬）。袁世凱驟然失去了這樣一個强有力的撐腰者，一方面軍費又在壓迫着他，外債無處可借（當時美國的資本家有願意借的，但遭受日本的從中破壞，而且『中華帝國』的對外信用也不够）。他的兩個『臺柱』馮國璋和段祺瑞，自從他決定要做皇帝以來，覺得太違反時代潮流，怕他一下子從寶座上跌下來，連累了自己；同時他們原來也有他們的野心，想繼任袁的大總統位置，如果實現世襲的君主制，豈不和他們的利害有了衝突？因此段氏早已辭去職務，表示消極；馮國璋則自雲南發難以來，態度『陰陽怪氣』，徙倚於袁皇帝與反袁派之間，想做成一個『中間勢力』。到這時候，袁世凱已處於『衆叛親離』的境地，但他還想作最後的掙扎，於三月二十二日下令撤消帝制；又特任徐世昌爲國務卿。次日又特任段祺瑞爲參謀總長，並明令廢止

『洪憲』年號，仍以本年爲中華民國五年。

帝制撤消後，袁世凱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義，發電向蔡鍔等要求停戰，商議善後辦法。徐世昌就任後，懇請第三方面如康有爲（他那時候是復辟派）、伍廷芳、唐紹儀等出任調停。但蔡鍔的回答說：『凜已往之玄黃乍變，慮日後之覆雨翻雲。已失之人心難復，既墜之威信難挽。』獨立各省的會銜覆電，措辭更爲嚴厲，說：『項城違反約法，自召兵戎，若僅削除帝號，復稱總統，廉恥喪盡，威信全失……請轉告項城，速行宣告退位。』而那時候廣東（四月六日）浙江（四月十二日）又相繼宣佈獨立。於是袁世凱拿出最後的『法寶』來了，那就是『自動改組政府』。他於四月二十一日發出申令，略謂：『曩以庶政待理，本大總統總攬政權，置國務卿以資襄贊，兩年以來，成效未著，揆厥原因，皆由內閣未立，責任不明，允宜幡然變計。茲依約法制定政府組織令，委任國務卿總理國務，組織政府，樹責任內閣之先聲，爲改良政府之初步。』下一天就特准徐世昌辭職，改任段祺瑞爲國務卿，兼陸軍總長，組織內閣。這樣的改組政府，護國軍方面當然不承認的，於是兩廣方面於五月一日成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公推岑春煊爲兩廣護國軍都司令，梁啟超爲都參

謀，李根源爲副都參謀。五月八日護國軍方面又成立了一個總機構，名叫「軍務院」，以唐繼堯（雲南）、劉顯世（貴州）、陸榮廷（廣西）、龍濟光（廣東）、呂公望（浙江）及岑春煊、蔡鍔、李烈鈞、陳炳焜、戴戡、羅佩金等爲撫軍，並互選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副撫軍長，梁啓超領政務委員長。一天，陝西的陝北鎮守使陳樹藩也爲取得陝西地盤而宣告獨立（他於袁世凱死後，即取消獨立）。南京的馮國璋則以調人的姿態，召開南京會議（獨立各省未參加），但並無什麼結果。而在南京會議的中間，四川的陳宦又通電宣佈獨立了（五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九日袁世凱宣佈帝制案始末，推卸自己的叛國責任，準備繼續用兵（那時候張勳、倪嗣沖等極力主戰）。可是正在這一天，湖南的湯薌銘也宣佈獨立了。陳宦和湯薌銘素來是袁世凱的忠實部下，現在也站到護國軍方面去了，袁世凱這一氣非動小可，就此生起病來，到了六月六日，這一代奸雄，在憤怒、懊悔、慚愧的心情之下與世長逝了。

第五節 黎段的鬥爭與張勳的復辟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出任大總統。但有一個問題須立刻解決：黎的出任大總統，

是根據舊約法的呢？還是根據袁世凱的新約法呢？如果根據舊約法，那麼，大總統缺位，副總統繼任，他的任期應該到民國七年十月爲止；如果根據新約法，那應該在三天之內組織大總統選舉會，投票選舉新總統。但黎元洪含含糊糊只說「遵依約法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而段祺瑞用國務院名義通電全國，竟說黎元洪是經袁世凱遺命遵依新約法代行大總統職權。因爲段祺瑞怕臨時約法恢復了，諸事要受國會的牽制，他不能大權獨攬，所以想趁此把臨時約法根本扯掉。但獨立各省和國會議員們則絕對不許如此含糊過去。兩方函電紛馳，正在爭執不決之時，海軍受中華革命黨人的運動，由李鼎新用海軍總司令名義宣告獨立，於是段祺瑞不得不屈服了。六月二十九日大總統下令恢復臨時約法，續行召集國會。同時下令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南方的軍務院也宣告撤消了。

國會恢復後，通過段祺瑞爲內閣總理，選舉馮國璋爲副總統。那時候國會中的黨派形勢，已和民國二年不同了，並無公開的政黨，祇有些派系。原來的進步黨人，分化爲兩個團體，一爲憲法討論會，一爲憲法研究會，但不久又歸併起來，祇剩一個憲法研究會了，所以這一派後來被稱爲「研究系」。民黨方面則由張繼等組織了一

個憲政商榷會，其中包含了張繼、王正廷、吳景濂、谷鍾秀、張耀曾等爲主要人物的客廬派，以林森、居正等爲主要人物的丙辰俱樂部派，以舊進步黨人孫洪伊、丁世嶸等爲主要人物的鞏園派。後來又分爲四派：谷鍾秀、張耀曾等另組政學會（這是「政學系」這名稱之所由來），爲一派；商榷會改爲益友社，爲一派；丙辰俱樂部與鞏園合組民友社，爲一派；王正廷、褚輔成等又由益友社中分出，另組政餘俱樂部，爲一派。

帝制撤消，國會重開，但「民國」依然是一塊空招牌，武裝還是軍閥的武裝，政權還是軍閥的政權。護國軍起義的結果，除了滇黔粵桂四省外，祇有四川和湖南脫離了北洋軍閥的宰制（其時浙江的呂公望已被逐，段祺瑞派楊善德督浙）。然而西南六省雖不在北洋系之內，形勢却很散漫，倒是北洋軍閥有一種團體的結合。先是張勳乘馮國璋召集南京會議的時機，派人邀請北方各省代表赴徐州開會，商議團結聯絡的方法。國會復會後，各省區又派代表在徐州集會，成立了一個「省區聯合會」，最初參加的有九省，後來增至十二省，公推張勳爲領袖。

那時候北洋軍閥中已分爲皖直兩系，皖系以段祺瑞爲領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

狗；直系以馮國璋爲領袖，受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由於段祺瑞直接繼承了袁世凱的衣鉢，而日本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的比較急進，再加上馮的才識手腕均不如段，所以政權操在段派手裏。大總統黎元洪無所憑藉，但很憤慨於段的事擅，就利用民黨來抵制段派。國務院的秘書長徐樹錚是段的門人，異常驕橫；而內務總長孫洪伊和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都屬於所謂『韜園派』，早從進步黨分裂出來，傾向於民黨了。孫洪伊、也是一個激烈派，剛好和徐樹錚旗鼓相當。丁世嶧是爲了要幫助黎元洪抵抗北洋派的挾制，才來做府秘書長的。孫在國務院裏既和徐常常發生齟齬，丁在總統府裏遇事也不肯隨便畫諾。因此由孫丁與徐的鬥爭擴大而爲府院的鬥爭，亦即黎段的鬥爭。後經徐世昌調解，由黎總統免孫洪伊職，而使徐辭院秘書長，孫徐之爭，形式上雖告一段落，但黎段感情總是不融洽了。在國會方面，也有擁段與倒段兩派，大抵研究系全部擁段，憲政商榷會中的右派，也主張維持段內閣，而左派則認爲北洋軍閥太跋扈，非倒段不可。關於憲法，研究系主張修改草案的兩院制爲一院制，憲法中不規定省制。反對省長民選；而商榷會的大多數則堅決維持兩院制，主張在憲法上規定省制大綱，並且主張省長民選。因此在憲法審議會中，爲了省制入憲的問題，發生過一場嚴

門（十二月八日），事後研究議員竟通電各省督軍（袁世凱失敗後，各省的將軍改稱督軍，巡按使改稱省長），攻擊民黨議員（當然含有要求援助之意），因此引起督軍干涉憲法的舉動。到十二月下旬，北京就發現了什麼「憲法促成會」，完全是北洋軍閥在暗中指示，用來對付國會的。又有所謂二十二省軍民長官忠告總統、總理、國會的聯名通電。大意說，「大總統應信任國務總理，總理秉持大政，國會宜早定憲法，勿干涉行政」云云（該電由馮國璋領銜，可知北洋軍閥雖有皖系與直系之分，但對付總統和國會的時候，還是站在一條戰綫上的）。六年一月九日，張勳、倪嗣冲、徐樹錚等又在徐州開什麼「省區聯合會」，商量對付總統和國會的辦法。到了二月初旬，對德參戰問題發生，黎段之間便引起軒然大波了。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德國照會各國，聲稱將於二月一日起採用無限制潛艇攻擊，美國就向德國宣佈絕交，同時照會中國，中國外交部於二月九日向德使提出抗議，並咨復美國，說願與美國取一致態度。對德抗議提出後，協約國駐京公使都慫恿中國參戰，尤以日本帝國主義慫恿最力。段祺瑞正想倚仗日本的金錢和軍械，以鞏固實力，制服國內反對黨，梁啓超更從而附和之，說參戰以後，可以改善中國的國際地

位。但黎元洪、馮國璋及大部分督軍都表示反對，國務員中也有懷疑的，在野名流如孫中山、唐紹儀及各商民團體，都表示反對。在國會中，研究系當然贊成，益友社派（以張繼爲中堅）及政學系也贊成，丙辰俱樂部派則極端反對。但無論反對或贊成，大都還沒有知道段祺瑞和日本的秘密勾結，大家還是在國家的利害上打算，所以等到段祺瑞的第二步手續——對德絕交案向參衆兩院提出時（三月十日），兩院都表決通過了。三月十四日就正式宣佈與德絕交。在未宣佈對德絕交以前，黎元洪和段祺瑞又起過一場衝突。原因爲段祺瑞將擬好的訓令駐日公使章宗祥的電稿，要黎元洪簽印拍發，其內容是告訴日本，中國已決定對德絕交，附有希望條件三項（撤消德奧庚子賠款及改訂進口稅，解除辛丑條約一部分之束縛），請求日本政府協助。黎以茲事體大，未得國會同意，主張緩發，段即一怒而赴天津。後經馮國璋調解，允許總統不干涉對德外交，並將府秘書長免職，段纔返京。

對德絕交了，但參戰與否還是一個爭論不決的問題。段祺瑞爲壓迫國會計，召集各省督軍來京，舉行軍事會議（當時人稱之爲「督軍團」）。會議於四月二十五日開幕，段自爲主席。結果都贊成參戰，並且由督軍團公宴議員，替段氏疏通。五月七日

參戰案提出國會，八日衆議院開秘密會，表決交付審查。到十日衆議院開會時，忽有自稱什麼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北京市民主戰請願團、軍政商界請願團等共約三千餘人，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包圍衆議員，並毆辱議員，揚言非俟參戰案通過不解散，衆議院因此停止開會。段內閣的閣員都相率辭職，內閣只剩一個光桿總理；而北洋軍閥與日本軍閥勾結的秘密，又被北京英文報揭露了，一時輿論譁然。國會方面表示，參戰案應俟內閣改組後再議。督軍團知道國會方面已無可挽回，決意破壞國會，而研究系又從旁煽動，遂假憲法草案議決的條文不適國情爲口實，呈請政府解散國會。黎元洪看情勢不佳，爲先發制人計，於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免段祺瑞職，以五廷芳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被免職後，發出了一個教唆督軍團叛變的通電。到二十九日，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宣告脫離中央關係，接着奉天、山東、福建、河南、浙江、陝西、直隸等省也宣告獨立。而張勳（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則另用「十三省省區聯合會」的名義，電請黎元洪退職；但他又托人向黎表示，如請他入京，他願意甘面作調人。黎元洪因張勳不是段派的真正同志，也反對參戰，又沒有通電與中央脫離關係，並且他是省區聯合會的領袖，出來調解，一定有效，便召他入京。張勳於六月八

日帶了軍隊到天津，電請解散國會。黎元洪被逼，於六月十三日下了解散國會的命令。這個命令因為伍廷芳不肯副署，竟用步軍統領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的名義副署發佈。張勳於十四日進京，通電各省，說國會已經解散，請取消與中央脫離關係的直言，各省一致聽命。

可是張勳這次進京，並非真正來作調人，他另有一套計劃要實現。張勳是一個頑固的武人，一向主張清廢帝宣統復辟，他自己和他的士兵都還拖着辮子。袁世凱死後，他一直在圖謀復辟，開過好多次秘密會議。他這次赴京經過天津的時候，會把他的意見徵段派軍人的同意。段祺瑞告訴他，只要國會解散，總統推翻後，復辟是可以商量的。因此他到了北京就積極進行，把康有為秘密請到了北京，供在他的公館裏。自己幾次到清宮裏去，對他的「皇帝」溥儀碰響頭，並且和清室遺老們秘密協商。商議成熟後，便派梁鼎芬（前清遺老）、王士珍（那時候由李經羲組織內閣，王任陸軍總長）、江朝宗（步軍統領）去見黎元洪，說明復辟的必要，請他奉還大政。黎氏表示斷然拒絕，但也無法抵抗。七月一日，張勳假馮國璋陸榮廷的名義，向清室奏請黎元洪奉還大政，便把已廢的「宣統皇帝」再擁上寶座，宣告復辟，頒佈了好多道所謂

「上諭」，改「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爲「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封黎元洪爲一等公爵，命馮國璋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勳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陸榮廷爲兩廣總督，各省督軍皆改爲巡撫，徐世昌爲弼德院院長，王士珍爲參謀部大臣。黎元洪倉皇逃入日本使館，派丁槐秘密南下，將大小印信送交副總統馮國璋。各省督軍及各要人得到復辟的消息，一致表示憤慨，通電聲討。段祺瑞看到張勳已替自己打倒了政敵，便翻起臉來，組織「討逆軍」，自任總司令，於五日親往馬廠督師。十二日討逆軍進逼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一幕復辟喜劇，就此閉幕。

這一次的復辟，在張勳實在是受了段祺瑞和段派軍人的騙，替段祺瑞造成恢復政權的機會。而最可笑的是那康有爲。他曾預先擬好了好多道詔書，有所謂「復辟登極詔」「開國民大會以議憲法詔」「召集國會詔」及「保護各教詔」「免拜跪詔」「免避諱詔」「合新舊詔」「親貴不許干政詔」等，但一篇都沒有被採用。他的「入室弟子」梁啓超，則在段祺瑞馬廠督師的時候已入段氏的幕府了。「入吾室而操吾戈」，康有爲能不痛心嗎？但是時代究竟前進了，康有爲出了這次大醜態以後，就完全變成博物院裏的古董，梁啓超從此也被人看穿，原來不過是奔走趨奉於北洋軍閥門下的一個反

動政客而已。

第六節 西南護法與北洋軍閥的分裂

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到北京，自爲國務總理（注二），並發表閣員名單，段自兼陸軍總長，汪大燮長外交，湯化龍長內務，梁啓超長財政，曹汝霖長交通（其餘不備記），成爲段派軍閥與研究系、新交通系（袁世凱失敗後，梁士詒被通緝，曹汝霖變爲交通系的首領，時人稱之爲新交通系）的聯合內閣。馮國璋早在南京就代理大總統職。黎元洪通電，此後不再與聞政事，推馮繼任大總統。馮於八月初到京就職，並發表李純爲江蘇督軍，陳光遠爲江西督軍，與湖北的王占元聯成一氣，成爲直系的基本勢力。這樣，北洋軍閥的兩首領，以及依附北洋軍閥的研究系諸領袖們，各得其所，躊躇滿志了。

但段祺瑞有兩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國會問題，一是參戰問題。他聽從了梁啓超等的建議，決定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再行召集新國會。一方面在國務院組織「戰時國際委員會」，研究宣傳應辦事宜，於八月十四日正式對德奧宣戰。臨

時參議院於十一月十日舉行開會式。十四日互選議長，王揖唐當選。

當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時，兩院議員通電否認。同時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也通電聲明，在國會未恢復以前，軍民政務暫行自主。復辟之亂平定後，陸榮廷和陳炳焜等再三電詢馮國璋，對於國會問題如何解決。等到段祺瑞決定要召集什麼臨時參議院，西南各省就一致起來反對了。孫中山於七月二十日乘海琛軍艦赴粵，宣示招集艦隊來粵，以粵省爲海軍根據地，然後請國會議員來粵集會，並請黎總統南下，在粵組織政府。當時孫中山的口號是反對段祺瑞破壞民元的臨時約法，和根據這約法而成立的國會，所以叫做「護法運動」。二十一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及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通電宣言護法，次日即自吳淞率領全部艦隊開赴廣東。八月下旬，國會發表宣言，決定在粵開非常會議，並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依法選舉孫中山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元帥（因黎元洪不願南下，故改設大元帥）。孫中山於十日就職，依組織大綱任命唐紹儀爲財政總長，伍廷芳爲外交總長，孫洪伊爲內務總長，張開儒爲陸軍總長，程璧光爲海軍總長，胡漢民爲交通總長。西南軍政府正式成立，南北就分立了。

段祺瑞借了參戰的名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他有軍隊，又有日本帝國主義做後台老闆，自以為制服西南，滿有把握。他抱定一個「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宜」的宗旨。他派傅良佐為湖南督軍，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並派北洋軍隊入湖南四川，企圖以湖南為基礎，制服兩廣，以四川為基礎，制服滇黔。無如入湘軍隊，在湘南戰敗，傅良佐棄長沙逃走。入四川的北軍，被熊克武包圍繳械，四川亦被熊克武佔據。十一月十七日，直督曹錕、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聯名通電，主張與西南和平解決，段祺瑞遂不得不提出辭職。二十二日馮國璋下令准段辭職，以汪大燮暫代國務總理。研究系閣員梁啟超、湯化龍、范源濂、林長民也聯袂去職。段祺瑞於去職後曾發一密電給所謂「北洋同袍」，說「我北方軍人分裂，即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方實力消亡，即中國消亡之朕兆」（這當然是鬼話），他之去職，為不忍使「同室操戈，嫌怨日積」之故，他希望以後北洋軍人「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為念，團結堅固，勿墮彼輩陰謀之中」。原來北洋軍閥中直皖兩系，此時裂痕已深。段對西南主戰，馮國璋主和，意見原已不合，加以兩系軍人為地盤之爭（例如馮國璋部下的王汝賢想做湖南督軍，而段偏派傅良佐，因之王率所部入湘後不

肯出力打仗)及其他種種權利之爭，已無法「團結堅固」。段之去職，就是馮段暗鬥的結果。

段祺瑞被免職後，馮國璋任命王士珍爲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並發表弭戰文告，表示願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南問題。但是，馮國璋並沒有主持和平的能力。那時候，段派督軍倪嗣沖、張懷芝等在天津開會，高喊武力解決，氣餒盛得很。奉天的張作霖也附和段派（張作霖在清朝末年，是東北舊巡防營的一個統領。民元秋間改巡防營爲二十七、八兩師，張作霖升爲二十七師師長。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時候，特派其心腹段芝貴督奉，其時張所能指揮的軍隊已有萬數千人，漸形跋扈，不但受段芝貴的節制，並且要驅逐他出奉天。袁世凱沒有辦法，祇得任命張爲盛武將軍，督奉，兼署巡按使。張作霖乘帝制戰爭的機會，攪得了奉省的地盤，漸漸形成所謂「奉系軍閥」，可以說是北洋軍閥的別支）。馮國璋爲敷衍段派，特任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又把陸軍總長一席讓給段芝貴。因此，北京政府的重權，還是操在段派手裏。西南方面看到這種情形，知道跟北京政府無和平妥協的希望，便一面聯合自立各省，一面實行進攻。石星川、黎天才於六年十二月中已在湖北荆襄一帶宣告獨立，到七年一月下旬，桂湘聯軍

又把岳州攻下了，鄂督王占元大起恐慌（時陝軍胡景翼部也在三原宣告獨立，後推于右任主持，加入護法軍，聲勢甚盛）。於是段派軍人藉口南方無和平誠意，鼓吹武力解決。馮國璋一時進退失據，大受段派的壓迫，便命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率兵入鄂。到二月中旬，徐樹錚又把奉軍招進關內，一方爲段派聲援，一方威脅馮國璋。馮無可如何，於三月二十三日下令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

段祺瑞就任國務總理以前，北軍已奪回岳州。四月初，曹錕的部下吳佩孚在湖南大打勝仗，攻入長沙，後又攻克衡山，於是段祺瑞的氣餒大張，一意要武力統一了。可是北洋軍閥內部的矛盾終無法剋服：吳佩孚自以爲奪回湖南有大功，而湘督一席反被張敬堯得去，心裏老不高興，從此不再前進（事實上吳佩孚的士兵已很疲敝，不能進攻粵桂了）；張懷芝的軍隊由湘東出江西失敗，蘇額兩督橫互在當中，不肯出力。到八月下旬，吳佩孚竟公然通電反對內戰。段祺瑞的武力政策，全成泡影。

段祺瑞武力統一的迷夢雖然幻滅了，然而他有日本帝國主義撐腰，新編了參戰軍，又製造一個新國會，氣勢還是大得很。段祺瑞自三月下旬就任國務總理以來，半年以內，先後向日本取得鉅額借款。這些借款，除一部分用作內戰經費外，大部分用

來編練所謂參戰軍，還有一部分用來製造新國會。參戰軍計有三師四混成旅，以「共同防敵」的名義，和日本訂立軍事協定，由日本軍官訓練，用日本的裝備，其目的在用以掃除一切反對勢力，包括直系軍閥在內。所謂新國會，完全是由安福系操縱的。先是徐樹錚發起組織所謂安福俱樂部，以王揖唐、劉恩格、曾毓雋等爲領袖，自己做後台老闆。七年二月中旬，所謂國會組織法選舉法修正公佈，到八月中旬新國會就開幕了。新國會中安福系議員佔絕大多數，其次是新舊交通系，研究系議員不過二十多人（研究系過去幫助段祺瑞，現在則被安福系起而代之，完全失勢了），完全在安福系的操縱之下。段祺瑞有軍隊，還有一個御用的國會，假使他再在內戰中得了勝利，真是何求不得！可是他內戰既不得逞，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出賣祖國種種行爲，又遭受人民的反對。首先由留日學生發動，於五月中罷課回國，組織救國團，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接着北京大學及各專校學生全體至總統府請願廢止中日共同防敵協定。而全國的法團（主要是商會）紛紛開會通電，攻擊段祺瑞，反對內戰。一面舊交通系因爲分潤不到賣國借款的利益，也站在倒段的方面，與馮系軍閥通聲氣，倡言和平。段祺瑞在這種情勢之下，無法戀棧，到九月間新國會選舉大總統（袁世凱於二年十月就

任正式總統，法定期限五年，袁死黎繼，黎去馮繼，至七年十月適滿法定期限，故於九月中改選），徐世昌當選（段祺瑞自知當選總統，必遭反對，所以擡出徐世昌作傀儡。又當時沒有選副總統，是預備把副總統一席讓給西南方面之故），馮國璋退職，段祺瑞也辭去國務總理。馮段之爭至此告一段落。但段祺瑞還是在做參戰督辦；而皖直兩系之爭，因直系受西方帝國主義之支持，正在發展着。以後皖直戰爭，直奉戰爭，逐一發生，整個北洋軍閥，要等國民革命軍起來，才告消滅。

至於西南方面，自借『護法』爲名，與北京政府對立以來，也長在軍閥的控制之下。孫中山自就任大元帥以來，就堅決不承認北方政府爲合法政府；但名義上也是元帥的陸榮廷、唐繼堯（他們並未正式宣言就職）祇不承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對於馮國璋的繼任大總統則表示承認，並且有與馮系軍閥妥協的意圖。而在非常國會中屬於研究系的議員，本來沒有南下，南下的大都是屬於舊國民黨的。舊國民黨中早分政學會、益友社、政餘俱樂部、民友社等四派。政學系則因種種關係，有和滇桂軍閥聯合一致的趨勢。孫中山除了海軍以外，沒有軍隊，所以他無法控制滇桂軍閥。他想編練一支政府軍，因此和桂系軍閥發生過許多鬥爭。結果歡迎孫中山來粵的廣東省長朱慶

瀾，被排擠去粵。朱有軍隊二十營，經過好多波折，總算交給了陳炯明，但叫他帶去援閩，稱爲「援閩粵軍」，陳爲總司令，軍政府雖然有此軍隊，等於沒有。陸榮廷爲敷衍孫中山起見，把廣東督軍陳炳焜調開，以莫榮新繼任。但莫榮新也是一個跋扈軍人，他曾擅捕孫中山的衛隊，加以土匪的罪名而予以槍決，使孫中山於憤怒之餘，用海軍軍艦的砲轟擊督署，算是給他教訓。不久，程璧光在海珠對岸被刺，孫中山失去了一只臂膀。那時候，有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出現，西南各省實力派的聯絡已告成功，而非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又已拉攏了益友系，提議改組軍政府。所謂改組軍政府，就是把大元帥的首領制取消，改爲七總裁的合議制，由七總裁中公推一人爲主席總裁。於是孫中山於七年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他在辭職通電中很沈痛地說：「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邱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故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即對於非常會議，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五月二十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七人爲軍政府總裁；七月五日，始由陸唐等通告成立；八月二十一日推定岑春煊爲主席總裁。到這時候，政學系總算大告成功。

了。不久孫中山因被排擠得無以立足，離粵赴滬。從此以後，西南軍政府遵議法的一點意義也失掉了。

西南軍政府自改爲總裁制後，雖聲明反對徐世昌爲大總統，然因內部的傾軋，毫無向北發展的能力。徐世昌本以文治派自命，又值歐戰告終，段祺瑞及其安福系主戰人物也未便堅持繼續內戰。徐世昌遂於十一月十六日發佈停戰命令，西南軍政府也於二十三日下令停戰。此後南北會開和平會議，但經過好多時日，沒有什麼結果，不但南北不能統一，就是南北的內部也不能統一。當時王壬秋曾做過一副遊戲的對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雖然文字遊戲，却很能反映出當時人對於南北政府的觀感。

第七節 綜論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

袁世凱，這個北洋軍閥的首領，攘竊革命果實，從而絞殺中國革命的一代奸雄，有人以王莽、曹操相比，其實是擬不於倫的。他並不是一個舊式的政治人物，他是近代中國的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最有力量的首領，他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的政治結晶。由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軍閥，割據稱雄，此起彼仆，造成中國分裂的局面，有人以東晉的荆揚兩系軍閥和唐朝的藩鎮相比，其實也是擬不於倫的。他們不單是封建餘孽，而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產物。袁世凱和其他北洋軍閥，不單是代表着最反動的大地主階級，同時還代表着最反動的大買辦階級。因爲如此，所以他們都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面撐腰。袁世凱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教唆，他還不至一意孤行地要從總統爬到皇帝的寶座。同樣的，如果不是帝國主義者相互間有着種種衝突和牽制，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中途畏難退却，不敢對袁世凱的冒險行動支撐到底，那袁世凱也不會一下子從寶座上跌下來。段祺瑞靠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不但下了打內戰的決心，並且追隨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參與了干涉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所謂中日共同防敵，即共同防俄，亦即所謂共同防共）。如果沒有英美帝國主義者爲圖削弱日本在華勢力而支持直系軍閥的話，那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迷夢，說不定會實現，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以後的軍閥混戰，更完全出於帝國主義者的導演。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於這一時期的局勢，分析得很清楚：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

自爲刀俎，而以人民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非投降帝國主義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中國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試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後，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爲游氓，流爲盜匪。農民無力經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讓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頻絕境乎？」

現狀雖然如此，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剷除障礙發展民族工業的封建勢力，要求把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中解放出來。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舊制度及舊的

政治統治必然要趨於沒落。因此，不僅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和張勳的復辟運動不會有功的希望，就是後來好多北洋軍閥企圖集中權力，建立其專制獨裁的統治，結果也只有一個個倒下去。袁世凱及其政治後裔阻撓中國革命，使中國的革命經過許多曲折，但他們無法把前進的歷史車輪拉住，他們一個個爬到權力的頂點，就一個個被碾碎在歷史車輪下面。

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還太薄弱，沒有能力完成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恩格斯論述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即使是在革命劇最初開演的時候，除非依賴於民衆的和更進步的政黨之援助，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就不能牢守陣地去反對那已擊敗但未被摧毀的封建的和官僚的政黨。」（注三）這幾句話，拿來論述我們民國初年的革命形勢，頗爲適合。那時候，雖然因民族工業的相當發達，使得最富於革命性的工人勢力日益壯大，但他們的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所謂「更進步的政黨」自然還沒有產生。辛亥革命不會發動廣大的民衆力量，使資產階級失去真正力量的依靠，而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後，更失去其進步的意義，遂使已擊敗但未被摧毀的封建勢力，在帝國主義者的羽翼之下重復擡頭。孫中山所發動的

「護法」運動，在那時候固有其一定的「進步」的意義，但他並沒有「依賴民衆」，又沒有進步的政黨（當時中華革命黨的勢力實際上異常微弱）作他的援助，祇依靠毫無實力的海軍和西南小軍閥的武裝，以及大部分由封建的和官僚的政黨所控制着的所謂「非常國會」來和北洋軍閥鬥爭，成功的希望自然很微小；而且即使成功了，西南的小軍閥和北洋軍閥也是一邱之貉，那些什麼系什麼派的官僚政客，有幾個懂得民主政治的真諦？如何能够建立起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來？

民國以來七八年間的歷史，是革命運動失敗史，但多一次失敗就多一番經驗，多一種教訓。不久五四運動起來，工人運動也開始發展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並於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向前推進了一步。在共產黨幫助下，孫中山終於從許多次失敗挫折中找到了革命的新道路。他後來收起「護法」的旗子，改組中國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明白規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綱，使中國走上國民革命的大道，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時代。

（注一）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分五號，其內容如下：

- 一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協定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 二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 三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建造由煙臺接連膠濟路綫之鐵道。
- 四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規定。（以上第一號）
- 五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期並南滿洲安奉兩鐵道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 六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建築工商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的租借權或所有權。
- 七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工商業。
- 八 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商定。
- 九 中國政府應允，關於下列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意，然後辦理：（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道，或爲建造鐵道而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二）將南滿洲

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十 中國政府允諾，如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十一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以上第二號）

十二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十三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之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的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恐於該公司有影響者，必須經該公司同意。（以上第三號）

十四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概不割讓或租借與他國。（第四號）

十五 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的日本人充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

十六 日本在中國內地所設之醫院、寺院、學校等，概許以土地所有權。

十七 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聘日人為警察官，以資鞏固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十八 中國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所需半數以上）之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須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十九 中國政府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的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各鐵路的建築權，許給日本。

二十 福建省內籌辦鐵路贛山及整理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商議。

二十一 中國政府允日本在中國有傳教之權。（以上第五號）

（注二）段祺瑞在誓師討逆的時候曾發一通電，說『本日（七月五日）由國務員參議齊到本月二日大總統令，「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此令，」等因，時危勢迫，義不敢辭，祺瑞遵即就職』。到七月六日又有一道總統的命令，說：『國務總理李經羲呈請辭職，李經羲准免國務總理本職，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此令。』因此，大家懷疑，這是由於段祺瑞和研究系的作偽而來的。否則何以有兩道重複的命令？後來孫中山有通電責問他，說：『總理一職，既無同意，亦無副署，實爲非法任命；果出黃陂（黎元洪）手諭與否，亦未可知。足下當以義師首領自居，豈得以國務總理爲號！以免職與我，而以復職自貴，狐狸狐媚，皆在一人，豈所謂爲國忘身者乎？』

（注三）見恩格斯所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